日據時代
台灣共產黨史
(1928～1932)

盧修一 著

日據時代
台灣共產黨史
(1928～1932)

謹以此書
紀念

鄭南榕　先生

自　　序

《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一九二八～一九三二》能夠出版，我長久以來的一個心願，也總算完成了。

一九七二年初，我在巴黎一個偶然的機會裏，看到了日本人山邊健太郎主編的兩本有關日據時代台灣政治運動的史料集，赫然發現二〇年代的台灣人組織了共產黨，而且在距離今天的六十年之前，就已經提出了台灣獨立、建立台灣共和國的明確主張。這個發現非常有刺激性也非常有意義，因爲那個時候，我的政治理念已經很清楚地指向同樣的目標。當時我的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很想針對台共問題做深入的研究探討，希望能把六十年前的這段台灣歷史，跟現代的台灣人追求自由解放的運動做一個結合；另一方面又擔心這種觸犯政治禁忌的研究，會影響到以後回台灣的工作和安全。

然而，我又深深覺得作爲一個台灣人，爲什麼不能面對台灣的歷史？爲什麼不能夠以台灣人的觀點、以台灣人的立場來詮釋自己的歷史？特別是日據時代的左翼運動，不僅當年遭受到日本統治當局刻意的鎮壓，就是在日本結束殖民後繼之而來的國民黨政府，對這段歷史更是刻意地加以封鎖、扭曲。面對這種不合理的壓制，如果一個知識份子不能勇敢地站出來，對這段歷史從事一個客觀的、公正的研究，那麼知識份子的尊嚴要往那裏擺？經過一番內心的掙扎，我終於決定以《台灣共產黨史》作爲博士論文的題目。這個決定不僅符合我的心情，也符合我的理念。

一九六五年我就讀文化大學時，在黃得時教授指導下，寫了一篇碩士論文——《連雅堂民族思想之研究》。當時我對台灣前途有一種模糊的看法，我把台灣未來的發展與一個不確定的中國設定在一起。《台灣通史》的作者連雅堂先生所代表的漢民族中心論的民族思想，認爲台灣的前途和發展必須和中國的整個命運合在一起。這種論點爲當時的知識份子提供一種模糊、浪漫的中國情結的滿足和發洩。十年之後，在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這種飄渺的、不確定的、不實在的情結已經一掃而空。台灣就是台灣，台灣可以單獨存在，台灣的存在本身是一種意義，也是一種目的。台灣的發展、台灣的未來不需要和中國大陸作這樣強制性的、不必要的結合。台灣人長期在台灣社會生活發展，很明確地已經發展出台灣人的意識。這種台灣人的意識，加上台灣社會本身自然發展的社會經濟的各項條件，台灣足以在自己的範疇裏成爲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就是在這樣的心情和理念之下，我執意地選擇台共做爲博士論文的題目。

一九七三年，研究計畫經過指導教授葉瑪(Jacques Guillermaz)同意後，我就開始搜集資料，進行研究。一九七五，我先返台任教於文化大學，同時繼續搜集資料。四年之後，一九七九年九月我向學校請假，一個人回到巴黎撰寫論文，第二年，一九八〇年的十二月終於通過論文考試，取得巴黎第十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從下定決心、擬定研究計劃、搜集資料進行研究，一直到撰寫論文、通過考試前後經歷了八年的時間，可說備嚐艱辛。然而整個過程當中，我也得到了不少熱心的鼓勵和幫助。我特別要感謝兩位已經逝世的前輩：第一位是王詩琅先生，他對我特別的關愛，無保留地提供了許多珍貴的資料，並將當時他正在翻譯的《台灣警察沿革誌》的部分文稿，給我影印做爲參考之用。第二位是郭松根博士，他退休後在巴黎過著隱居的生活，他精通英文、日文、法文，幫助我翻譯重要的日文文件。此外，我也要感謝在日本的史明先生，由於他的啓發與討論，我才能

對左翼運動有清楚的整體認識。

一九八〇年底回到台北後，我繼續在文化大學任教，並担任日間部政治系及夜間部行政管理系兩個系的系主任。我一直有個心願，想將博士論文翻譯出版，但是在繁忙的教務工作，我始終無法抽出時間來做這件事。一九八三年初，我因爲台獨案被判感化三年，我很想利用坐牢的時間從事翻譯的工作，只是參考資料不在手邊，無法進行，翻完導論之後，其它的就擱下來了。想不到法務部調查局竟然未經我的同意，在我坐牢期間逕行將我的博士論文翻譯出版，令我感到旣憤慨又無奈！一九八六年三月期滿出獄後，我由別人手中輾轉拿到這本翻譯本，發現裏面有不少的錯誤，而且只翻譯了論文的本文部份，論文最重要的註釋和參考文獻都沒有譯出(事實上，調查局無法掌握參考資料，根本無法進行這部份的翻譯)。去年四月，時代雜誌鄭南榕先生到民進黨中央黨部來，談出版中文本的事，並要求馬上簽約。我因爲工作非常繁忙，沒有時間，不敢輕言答應。今年年初我才開始著手翻譯，然而鄭南榕先生却在四月七日爲了台灣獨立的建國理念而自焚，壯烈成仁！鄭南榕的犧牲加速我的工作，決心以這本論文的出版做爲對他最高的紀念！

十年前我在法國撰寫論文時，因爲回台的安全顧慮，儘量偏重於事實的敍述與分析，在觀點議論方面儘可能地自我約束，不敢做太多的發揮。在翻譯的過程當中，本想做部份的改寫，但實際上，時間匆忙不允許這樣做。因此，除了一、二個小地方文字修正外，基本上完全按照原來的法文翻譯。其他的只好留待以後了。

最後，謹以此書獻給所有爲台灣奮鬥犧牲的人!!

盧修一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左翼抗日運動的新探索

陳芳明

——序盧修一著《台灣共產黨史》

左翼的民族解放運動

一九二〇年代至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台灣抗日運動，是以明暗兩股潮流的相互激盪而形成的。在明朗方面的運動，是以台灣議會期成同盟、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衆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爲主調。基本上，這些透明的政治運動，具備右翼的、合法的改良主義色彩。在陰暗方面的活動，則是以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以及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爲中心。以農工群衆爲基礎的左翼政治運動，其終極目標乃是通過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左右政治運動的競爭頡頏，爲近代台灣歷史創造了輝煌的篇章，也爲戰後台灣的思想意識留下無盡的爭議。

左翼思想的崛起，是隨著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灣的展開而發生的。以誘騙、欺罔、壓榨、剝削、掠奪的方式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迫使台灣知識份子必須思考體制改革以外的道路。尤其是一九二〇年以後，台灣總督府昇高土地的收奪，使得農民運動邁入全新階段。左翼留學生，無論是在東京或在上海，都對台灣革命的形勢抱持樂觀的態度。日本殖民者的土地收奪，主要在於配合工業化的來臨。跨過一九二五年以後，日本開始確立對中國與南洋的侵略政策，台灣被迫擔任提供農業、工業產品的角色。日本的對外擴張，刺激了島內資本主義的高度發達。一批新興的、城市的工人階級也儼然成形。對於左翼知識份子來說，這是宣揚社會主義的最佳時機。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行爲，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日本在一九二九年的世界大恐慌之前，就已經在一九二七年發生了昭和大恐慌，軍國主義與白色恐怖同時出現。因此日本社會內部的矛盾也越趨尖銳。爲了減緩階級衝突的惡化，日本統治者遂加緊對殖民地的榨取，並進一步向殖民地以外地區，尋找新的原料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做爲殖民地的台灣，自然就遭受空前未有的經濟掠奪。

一九二九年發生的世界經濟大恐慌，衝擊了全球各地的各個角落。捲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日本，更不能倖免。爲躲避這場巨大的災難，日本軍國不能不更處心積慮要把本國的內部矛盾迫切轉移到海外。一九三一年終於爆發了「支那事變」，日本武裝侵略中國東北，也精心設計出一個傀儡政權——滿洲國。可以理解的，日本統治者的目的，乃在於舒緩其政權所面臨的危機。

台灣左翼的知識份子，當然是樂於見到危機的到來。他們普遍意識到，資本主義體系已經出了問題，整個帝國主義的結構也開始出現動搖的跡象。特別是當時的台灣社會，見識了經濟的蕭條與失業率的節節高昇。這種被當時知識份子稱爲「失工的洪水」的現象，加深了左翼運動者的信念。他們認爲，這是對殖民體制進行反抗革命的時機。一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發生左右路線的分裂，便是台灣抗日陣營內部改良主義集團與革命主張集團爭辯的一個結果，那也是殖民陰影下台灣社會矛盾衝突的一個反映。

台灣抗日陣營的分裂，誠然是近代史上的一個不幸；但是，從整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來看，這樣的分裂似乎又是歷史的一個必然。在殖民地社會裏，當每一個階級都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時，不同階級提出不同的要求，是極其自然的。日據時期的台灣知識份子，基本上是類似俄國革命前夕的 Intelligentsia，使命感極強。知識份子對不同階級的認同，往往會採取不同的政治路線。意識型態的歧異，終究會導政爭論。在日本

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之際，左翼知識份子當然就難以容忍主張體制內的改革的右翼運動者。台灣文化協會之走向分裂，與其說是知識份子之間唯心的意氣之爭，倒不如說是客觀政經條件所醞釀出來的意識之爭。

台灣共產黨就誕生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從政治史與思想史的立場來看，台共的建黨完成確實具有相當深刻的意義。在二十世紀，台共是第一個提出「台灣革命」概念與主張的政治組織，而且是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台灣獨立」理念的政治團體。這兩個主張，又建基於「台灣民族」這個極富現代意義的國家意識之上。較諸當時的任何政治運動組織，台共的政治觀點，可以說非常精確，並且眞正落實在台灣社會的格局。從思想史的立場來看，台共本身的孕育誕生，證明了二〇年代的台灣並未落於世界政治思潮之後。當所有殖民地與次殖民地的知識份子，普遍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展開強烈批判之際，台灣的左翼運動者不僅加入批判行列，而且還組織起來，武裝他們的思想，準備與日本殖民體制對決。在亞洲，中共成立於一九二一年、日共成立於一九二二年，而台共成立於一九二八年，並不能算是遲到的。隨着台共的成立，台灣成爲全世界弱小民族追求命運解放運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荒疎的台共研究

台灣共產黨，一直是以隱晦、秘密的形式存在著。從一九二八年的建黨到一九三一年的瓦解，在台灣社會裏似乎沒有多少人感知他們的活動。這種現象並不令人詫異，因爲，台共本來就不是一個合法的組織，根本不可能以公開的活動來鼓舞風潮。台共的黨員，自始至終，都是採取化整爲零的手法，附存於其他合法的政治團體，這包括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以及散佈各城市的工人組織。從表面上來看，台共並不具任何影響。然而，進一步深入觀察的話，就可發現台共成員在抗日運動中所扮演的積

極角色。自一九二九年以後，台共的地位益形重要。這是因爲右翼運動者，陸續從文化協會退出，集結在台灣民衆黨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組織。這些右翼組織都傾向於體制內的合法改革，對於較爲激進的鬥爭方式，全然摒棄不取。所以，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的責任，自然而然就落在台共的身上。

如果台共的歷史地位是如此重要的話，爲什麼歷來史家很少注意到台共的活動？要解答這個問題，似乎可以從下面三個原因來瞭解：

第一、有關台共的史料，向極缺乏。因爲，台共的終極目標是革命推翻殖民體制，該黨的言論很難在當時的雜誌報紙發表出來。以《台灣新民報》爲例，這是右翼政治運動的喉舌，對於台共的活動，就很少提及。即使台共所主持的雜誌，如《新大衆時報》，在出版後，往往就遭到查禁。在現有的史料中，紀錄最豐富的，只有台灣總督府編的《警察沿革誌》而已。

第二、台共成員所留下來的紀錄，也寥若星辰。這不僅是因爲他們不樂於在戰後暴露自己的身份，而且任何牽涉到台共的文字，都有可能再次啓開台共內部曾經有過的派系紛爭。在戰後，台共成員留下文字的，只有蘇新的《憤怒的台灣》、蕭來福的《台灣解放運動的回顧》，以及楊克煌的《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然而，蘇新與蕭來福僅從左派的觀點來解釋抗日運動史，並沒有爲台共留下第一手的資料。楊克煌的書出版於一九五六年的北京，但是，此書後來變成遭到政治鬥爭的證據之一。這本小書，對於台共的發展與興亡，也是欲言又止。

第三、戰前戰後的台灣社會，從來沒有存在過討論社會主義思想的客觀環境。日本與國民黨的統治，對於思想箝制與言論控制，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戰後國民黨體制教育，僅首肯日據時代右翼的、合法的政治運動，並且視這些體制內的改革爲中華民族運動的一部份。不但如此，國民黨基於反共的立場，對台灣的左翼運動者有一種本能的敵視。由於部份台共領

袖在二二八事件以後投奔中國，接受中共的指揮，因此，國民黨對於台共歷史的評價，始終是偏低的，甚至有意徹底抹消。

這些原因，足夠說明左翼抗日運動的研究爲什麼在台灣是如此蒼白、如此荒涼。戰後首先對台共歷史的重視，並非始於台灣，而是自海外。長期旅居日本的政治運動領袖史明，便是第一位深入剖析台共興亡過程的史家。他突破一般人對於右翼運動的高度評價，而站在社會主義立場肯定台共的歷史地位。在他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裏，史明特闢專章，對台共的政治、思想背景，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內部紛爭，並且對其最後終告覆亡的史實，都有詳細的討論。

在台灣，第一册眞正討論台共的書籍，當推楊碧川的《日據時代台灣人反抗史》。這本書較諸史明的討論還更精練，對於左、右翼運動的勢力消長，提供清晰可辨的脈絡。楊碧川全書的重點，放在台共的存亡史上，是一册典型的左翼史觀專書。

台灣史研究，因爲有史明與楊碧川的出現，一個明確的、屬於左派歷史觀點的解釋才算眞正確立。《台灣人四百年史》出版於一九八〇年，《日據時代台灣人反抗史》問世於一九八八年。這說明八〇年代的台灣史研究路線，也開始呈現多元化，而不再是由國民黨右派史觀繼續壟斷了，並且也不再是以籠統的「台灣意識」來解釋台灣史了。從社會性格與經濟結構的分析，來建立台灣歷史解釋，將是重估台灣史的新途徑。

現在，繼史明、楊碧川之後，一册專注於台共研究的書籍，也已決定在台灣出版，那就是盧修一所寫的《台灣共產黨史》。在撰寫的時間上，此書應該是介於史明與楊碧川的專書之間。但由於政治因素的干擾，這本著作卻是最晚出的。

《台灣共產黨史》，是盧修一在巴黎大學以法文撰寫的博士論文，原來的題目是《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一九二八～一九三二》。這份論文，曾

經由孫亞光譯成漢文，是國民黨法務部調查局授意的，並於一九八四年元月出版，非常諷刺的是，調查局人員在翻譯這部論文時，盧修一正在坐國民黨的監牢。

盧修一是在一九八三年被捕的，主要原因是他曾經與史明有過接觸。事實上，盧修一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在資料與歷史解釋上，獲得史明的協助。因此，盧修一與史明之間的來往，大多是思想與學問的切磋。在戒嚴令當道的時代，任何有關社會主義思想的討論，以及任何觸及台共歷史的研究，都是被視爲「非法」的。盧修一以台共做爲博士論文的題目，足可證明他的史識有過人之處。他也並沒有因爲政治上的白色恐怖，而放棄在學問知識上的追求。盧修一的被捕，與這篇論文的撰寫，有極密切的關係。

朝向結實的台灣史重建

台灣史研究，一向就是受到思想警察的監視；而左派台灣史的探討，更是受到當權者的嫉視。盧修一選擇在政治氣候陰晴不定之際，重新讓這部論文出版，具備兩個意義。第一，要瞭解日據時代的台灣史，不能避開社會主義不談。台灣既然是一個殖民地社會，在此社會內部的每一個階級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壓迫。那麼，要探索這個時期的歷史，就必須進行結構性的分析。做爲抗日運動中重要一環的農工大衆，是推動歷史的主要力量之一。要重建歷史，就不能遺忘農工階級的重要角色。盧修一的著作，正好提供了一個較爲完整的觀點，爲代表農工階級的台灣共產黨定位。第二，在討論台灣前途問題日益熾熱的今天，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必須嚴肅正視的一個主題。台共歷史的探討，正好可以使這個主題得到釐淸的機會。因爲，台共活動期間，始終未能擺脫中共與日共之間的政治干預。這種錯綜複雜的糾纏，正是盧修一論文的主要討論之一。

歷來中國與台灣兩地的官方史觀，都企圖要把中國的抗日運動與台灣的抗日運動聯繫起來。這種歷史解釋的終極目標，便是要擦拭台灣社會的固有性格，並進一步虛構台灣與中國是屬於命運共同體。台灣有一小部份參加統治者「共犯結構」的學者，也殫精竭慮爲台灣的抗日運動命名。有一種方便的說法，便是指出日據時代的台灣政治運動，有所謂的「祖國派」與「台灣派」。這種種唯心的、違背史實的解釋，往往只是爲了滿足個人的政治慾望，爲了成全個人的政治主張。

事實上，只要從政治運動的經濟基礎去分析，就可發現所謂「祖國派」與「台灣派」，只不過是右派與左派的區分而已。極其反諷的是，如果台灣抗日運動存在過「祖國派」的話，這一宗派的成員竟然是支持日本體制內的合法改革者。這些成員，在戰後也是支持國民黨的體制內改革。由於他們被國民黨接受了，所以他們就變成了具有中華民族主義精神的「祖國派」了。這樣的歷史解釋，只不過在證明中華民族主義是多麼廉價，也是多麼容易搖擺。

盧修一專書的重要性，在於超越廉價的民族主義解釋，而落實到台灣社會去觀察台共成立的經濟基礎與歷史背景。最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便是他指出台共與第三國際的聯繫關係。台灣共產黨的成立，固然有台灣本土的政經條件，但是國際思潮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第三國際，在催生台共的任務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第三國際通過日共組織來指導台共的活動。但是，在日共受到日本軍國政權的肅清之後，中共竟利用第三國際的指令來操縱並分化台共。盧修一的論文，對於這段史實有非常仔細的交代。

台灣史觀的建構，將關係到日後台灣史研究的發展方向。沒有落實的史實探討，就難以建立一個屬於台灣人民的健全史觀。盧修一在經歷過坎坷的政治道路之後，決定把這份重要的論文印出。對於現階段的台灣史研

究，必然會產生很大的刺激；而且對於日後台灣史觀的塑造，也一定有正面的貢獻。左翼運動的研究，向來就受到有意的忽視，並且也遭到刻意的曲解。這一片扭曲的空白的領域，將會因爲盧修一專書的出版而得到恰當的補充。台灣史研究的劣勢，從此就要扳回了。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六日　聖荷西

目　次

第二篇　台灣共產黨的演變和毀滅（1928～1932）

第四章　第一次破壞與黨的重建（1928～1930）

第五章　改革同盟與臨時代表大會(1930～1931)

第三篇　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與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關係

第七章　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中共的關係

第八章　台灣共產黨對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影響

導　論

根據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的馬關條約，清廷割讓台灣給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依據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台灣歸還中國。關係台灣命運至深且鉅的這兩次變革中，台灣人民的意志從來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

在五十年又四個月的歲月中，台灣成爲日本的殖民地。猶如亞洲、非洲被殖民奴役的人民一般，台灣人對於外來統治者進行了長期的抵抗。抗日的運動自始至終，持續不斷，儘管抗爭的形式有所改變，但是台灣人追求掙脫殖民枷鎖的目標，却始終堅持不變。台灣人反殖民、反奴役的鬥爭大體區分爲兩大階段：

第一階段（前期）始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台灣民主國」的宣布成立，而止於一九一五年西來庵事件的遭受鎮壓，其特徵是以直接的武裝行動，反抗日本人。

第二階段（後期）起於一九一四年「台灣同化會」的成立，而終於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對華戰爭，其特點爲受到現代自由民主、民族自決思想及馬克思主義啓發的知識分子，普遍覺醒，領導了非武裝的、社會的及政治的各種抗日行動。

隨著民族意識的覺醒和發展，台灣人的抵抗運動不斷在轉變，透過文

化啓蒙和政治活動，終於具有全民參與的特性。一般而言，這種抵抗運動最後也受到來自中國、日本以及外在世界發生的事件的影響，而更增加其複雜性。

基於抗爭目標及所運用策略的不同，第二階段亦卽後期的非武力抗日運動本身，以一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分裂爲界，可以再劃分爲前後兩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卽所謂民族主義運動的「聯合陣線」時期。

第二個時期爲民族主義運動與階級鬥爭運動的對抗時期。

台灣人反抗運動過程中的階級鬥爭，無疑的，乃是受到世界性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特別是一九一九年「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成立之後，促成了亞洲及殖民地國家中共產黨的紛紛創立，其中也包括台灣共產黨的創建。

這本研究論文的撰寫，在於闡明下列三個主題：

㈠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形成與發展；

㈡台灣共產黨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

㈢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對於台灣反抗殖民統治鬥爭的影響。

本論文分爲三大部份，第一部份首先探討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並簡述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這些構成了台灣共產主義發展的網絡。其次，描述在中國、在日本，以及在台灣本島所興起的台灣人共產主義思潮，這些思潮乃是台共建黨的根據。最後，針對台共成立的過程、台共的政治方針及組織狀態，予以分析和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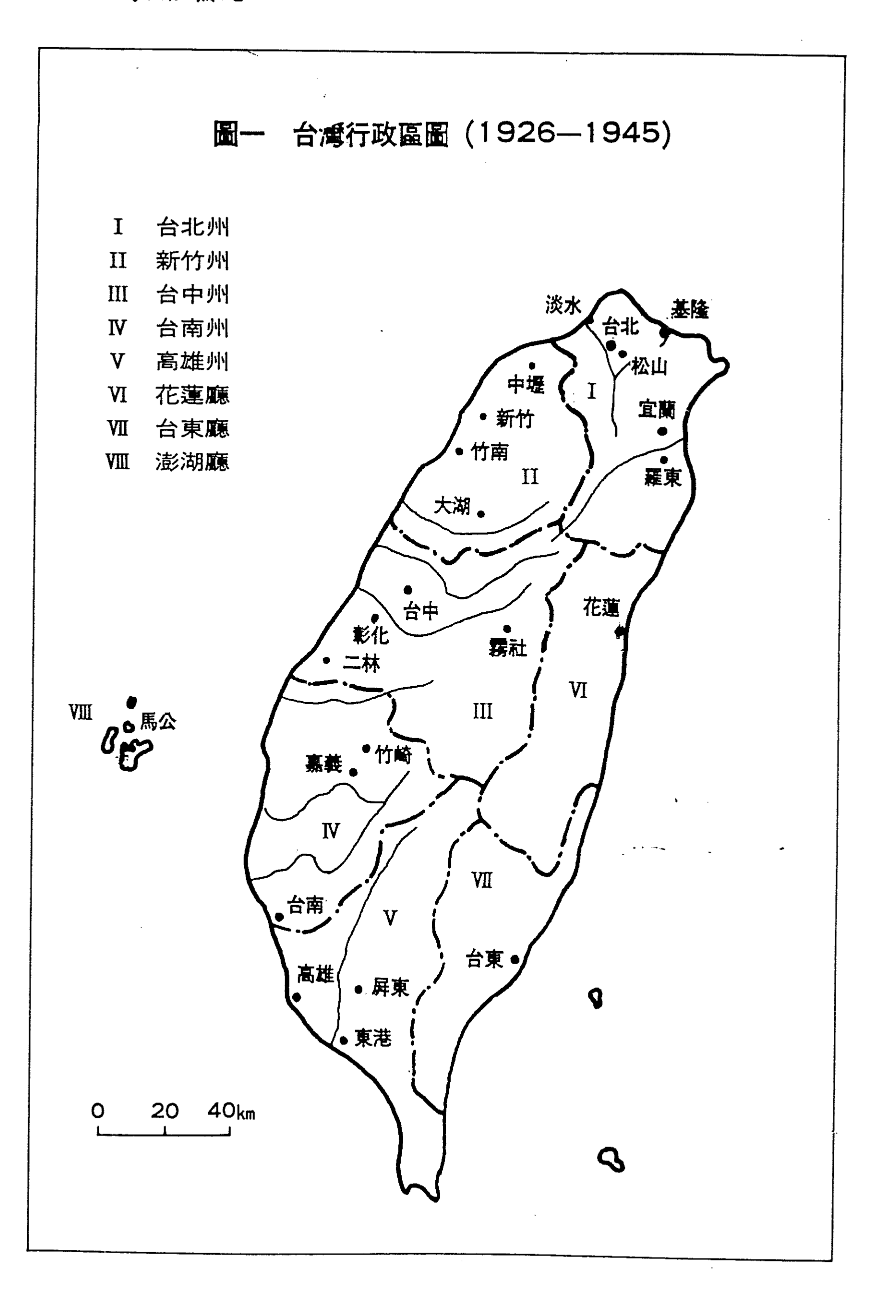
第二部分則在闡述有關台共的演變，包括內部的權力鬥爭、第三國際干預後的重整，一直到台共的徹底毀滅。

第三部份在分析台共與第三國際、日本共產黨，以及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以期在國際共產運動的範疇內為台共定位。最後，說明了在台灣整體政治運動、社會運動中台共所扮演的角色，以確定台共在這個區域活動上的重要性。

由於日本人全面的管制，關於共黨活動的資料，始終諱莫如深。因此，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裡，從事有關上述各部份的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九六九年起，在日本或者在台灣開始出現了足夠的相關文件，才使這種研究得以進行。

不過，由於這些文件的特殊性，自然使得這項研究受到限制。事實上，由日本統治當局所彙編的文件，例如《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儘管資料非常豐富，却必然代表了日本殖民統治的官方觀點。又如與《沿革誌》一樣作為本論文重要的研究材料的《台灣民報》，也同樣有所不足；因為《台灣民報》刊登的文章及報導的消息，在出版之前就已先行自我約制以免遭到取締，而且，在發行之後仍然隨時遭受到日本嚴格的檢查。

這篇研究論文的完成，一方面希望有助於為台灣的抗日運動，提供一個整體性的觀點，另一方面，在面對純粹的民族主義運動時，希望有助於指明共產主義者所持的態度與所演的角色。


圖一 台灣行政區圖（1926—1945）
I 台北州
II 新竹州
III 台中州
IV 台南州
V 高雄州
VI 花蓮廳
VII 台東廳
VIII 澎湖廳
淡水
基隆
台北
松山
中壢
新竹
宜蘭
竹南
羅東
大湖
台中
花蓮
彰化
霧社
二林
馬公
竹崎
嘉義
台南
台東
高雄
屏東
東港
0 20 40km

第一篇

台灣共產黨

成立的根源與建黨經過

第一章
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
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

第一節　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

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台灣的政治方向有所變化。當時，殖民地和日本宗主國的關係是依照典型的殖民地規劃組織成的。也就是說，在政治規劃上，採取控制及壓制；在經濟規劃上，要求資本的臣屬；在文化規劃上，採取歧視態度。這三點充份地表明日本在台灣採取壓制政策的特徵。

(一)　政治上的控制與壓迫

西元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這一天，是日本統治台灣的開始（日本人後來定這一天爲「始政紀念日」並集會慶祝），日本人在台灣連續實施了八個月的軍事統治，直到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十日成立台灣總督府爲止。同時在這一天，日本帝國議會通過了所謂「六三法案」❶。

六三法案給予台灣總督完全的立法權和行政權，使他掌握最高的權力，

可以做任何決定，並以「律令」作爲統治的依據，因此他所下的決定就是法律❷。

該法成爲日本在台專制統治的法律依據，同時也是「台灣一切惡法之所由來」❸。這激起了台灣人發起所謂的「六三法案」撤廢運動。

台灣總督爲了實施他的決策，建立了一個地方行政體系，這個體系在日本統治期間曾有多次改變。這些改變符合中央集權的觀念，但也是爲了加強總督和不同地方行政階層之間的聯繫關係❹。

日本人的控制和影響力遍及所有的村莊，在每個地方階層都由一個日本官員統治，包括廳和州、市和郡、街和庄。這種官僚體系的安排在其他日本殖民地也不多見，譬如朝鮮，即使是在日本人的監視下，朝鮮人仍舊能夠出任地方官員❺。

一九三五年各級議會成立，地方行政的各個階層都設立議會（大部分的議會成員都由行政當局提名），設置的目的是向日本主管提供施政意見。然而這些議會沒有任何權力，決策權仍然屬於前述各行政階層中的日本官員❻。

「保甲」制度❼和警察也同樣進行政治控制。一八九八年，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他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推動警察制度的現代化，這是日本當局一項積極的革新計畫❽。在新的制度下，一般警察在經常性的職務以外負有相當多的新任務。他們控制了戶籍和居所的變更、賦稅以及徵兵等等。依據文獻，我們可以發現日本當局在治安方面比在行政上加倍用心❾。

日警對待台灣人相當嚴厲，但是日警極爲有效的控制力的確強化了殖民統治，我們可以說日警是日本統治力量的脊柱❿。這種警察制度延續到一九二〇年秋季，才在第一個文人總督田健治郎任內獲得修正。但是警察的活動仍然遠超過法律的限制範圍，直到日本統治結束，情形始終如此。

在台灣人的眼中看來，日警就是所謂的「地下的總督府」⓫。

日本政府於一九二二年在台灣施行治安警察法，於一九二五年施行治安維持法，一九二八年並設立高等警察課增強警團力量，這些作爲一方面顯示日本當局極力想要控制台灣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左翼運動的發展；另一方面顯示殖民社會正面臨着變化⓬。

(二) 經濟上的壟斷

就整體而言，台灣的殖民經濟包括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兩大類。如果我們以數量化的百分比來表示重要性，則農業部門大約占百分之七十，只有百分之三十屬於不依靠農業而存在的其他部門⓭。因此，我們可以說農業構成了就業和生產的主要來源，較具特徵和較爲重要的變化都發生在農業部門之內。台灣的工業除了食品方面稍有發展（大部分反映在製糖工業的現代化上）以外，其他方面都不如農業的變化，仍然停留在一種低度發展的狀態⓮。

日本的殖民策略目的在使台灣成爲日本的後勤基地，因此重點放在使這兩個地區的經濟能夠互相整合。換句話說，台灣經濟必須成爲日本的附屬經濟，以幫助日本養育逐漸成長的工業人口。

台灣對日本輸出米和糖，相反地，日本將工業產品輸往台灣，而且由於形勢使然，台灣的農業部門必須購買日本的工業產品以及附隨的各種服務。在殖民化的前十年，只有百分之一的台灣輸入品來自日本，而輸出品近百分之十則送往日本。但是一旦殖民化之後，因爲資本的投入和先進技術的引進，農業的生產有大幅度的成長。農業生產量的增加很明顯地是由於日本農產品缺乏的緣故，這同時也增加了台灣的輸出數量⓯。台灣和日本之間經濟的快速躍進，我們可以從台灣經濟中兩種重要產品輸出量的變

化獲得證明：這兩種產品是米和糖。事實上，這兩種產品估計占台灣農業輸出量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每年台灣有百分之九十的糖向外輸出，而實際上台灣所有米和糖的輸出幾乎都是銷往日本⑯。即使從台灣輸出後的剩餘產品最後還是輸往日本，因爲台灣產品的分配銷售都控制在日本人手中。

台灣人當時的收入及消費量都維持得很低，輸入的日常消費用品也很少。在收支相互抵償之後能獲得相當可觀的利潤，一部分的利潤仍舊投資於台灣身上，然而其中重要的部分大都進了日本人手中。台灣這個殖民地，當時經濟上的成功大部分是殖民地政府的成就，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日本殖民時代經濟上的成長是由於總督府的決策及其支持所致⑰。殖民地政府當時有兩個主要的經濟目標：一方面提升米糖的生產量和輸出量，另一方面則維持日本在台的經濟統治權，使台灣成爲日本的附屬經濟，並從中獲取利益。事實上，殖民地政府在台灣的一切作爲，都可以從這兩個目標中獲得解釋⑱。

殖民地政府將稅收所得投入經濟發展所需的社會經濟建設中⑲。爲此，它維持修護全島道路及鐵路網、發展灌溉系統、建造高雄基隆南北兩個重要港口，這些都是爲了促進農業的商業化，並使台灣和日本產生更進一步的聯結關係。

由於商業交易數量不斷的增加，現代化的銀行體系和新的財政機構也分別設立起來，以爲生產活動提供服務。

爲了將台灣的經濟剩餘生產置於日本控制下，日本資本主義者使用各種手段極力防止台灣金融企業階級的崛起⑳。殖民地政府允許台灣經濟權集中於幾個與政府關係密切的三井、三菱等日本資本家手中，藉此增加它操縱全島經濟發展的能力㉑。

假如我們考慮到殖民地政府設定的目標和運作的方式，我們可以說，台灣的殖民地經驗和其他的許多殖民地大體相似。

爲了使日本資本主義能夠在台灣發展，殖民地政府重組了土地所有權制度：首先以發放國家債權的方式對「大租戶」（最原始的、第一級的土地所有權人）有所補償，它所以要消滅「大租戶」，爲的是想確立古老的「小租戶」（第二級的土地所有權人）爲土地的唯一所有者，而佃農們仍然維持他們傳統的租佃地位。如此一來，原先同一塊土地上所存在的雙重所有權關係被取消了，而簡化爲單一的所有權關係，因此，傳統的封建關係廢除了，一個現代化的所有權制度逐漸形成㉒。

同時一項對森林和土地的調查工作也已經展開，以便對不動產建立所有權。依據無主土地「國有化」的原則，無法提出所有權狀的台灣人土地均被沒收。殖民地政府再將這些土地出售給退休的政府官員及日本公司，此種作法激起了衝突事件，也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間農民運動紛起的根源㉓。

總督府對台灣製糖工業的發展予以投資，並採取保護政策來照顧這項工業。這種對糖廠的數量加以限制以避免競爭，以及設置糖業生產保留區的作法亦造成了衝突，後來也成爲農民運動的根源㉔。

這些事件都證明了：台灣下層結構的變化，以及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灣的發展給台灣人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㈢ 文化上的歧視

日本對台灣的統治剝削不只表現在政治及經濟的規劃上，同時也表現在文化的規劃上。日本人在台灣的文化政策，爲的是發展現代化教育和移植日本語言，以加強他們的統治地位。

一九二二年以前，日本人在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範疇裏執行分立教育的政策。在初等教育的制度裏台灣存在着兩種學校：一種是專爲日本幼童設

立的小學校，另一種是保留給台灣幼童就讀的公學校。不只學校的名稱有所不同，教育制度和學生入學的比率也不相同㉕。

日本人就讀的中等學校是獨立的，而台灣人的中等學校則於一八九六年開辦，不過附屬於國語（日本語）學校實施，雖然在一九一九年整個教育制度獲得改正，但是它的受教程度一直低於同等級的日本人學校㉖。

一九二二年開始，整個教育制度獲得統一。從中等教育起，推行一種「共學制」㉗，這種措施實際上只是方便日本人的作法而已。中等學校的入學考試確實是對日本人的小學校和台灣人的公學校孩童開放，但是考試內容卻是以小學校的教材爲依據，對於在初等教育素質上已經受到歧視的台灣人而言，這種考試的結果很明顯地並不公平。下表很清楚地表明了這個事實狀況：

表一　中等學校入學考試錄取的比率

年份／數值／人別	1924			1929		
	報名登錄者(A)	考試錄取者(B)	錄取比率(B)／(A)	報名登錄者(A)	考試錄取者(B)	錄取比率(B)／(A)
台灣人	3,878	832	21.5%	3,631	812	22.4%
日本人	2,625	1,452	55.3%	2,912	1,537	52.8%
總計	6,503	2,284	35.1%	6,543	2,349	35.9%

資料來源：謝春木（謝南光），「台灣人は斯く觀る」（台北：台灣民報社，1930），第一編，頁58、72。

中等教育的入學限制對台灣人造成不利的影響，這種狀況也反映在其他教育階段上。因爲新學校陸續的創辦，台灣學生的數目整體而言也有增加；但在高等學校，台灣學生的數目反而減少了㉘。

表面看來，台灣的教育制度彷彿平等了，但是事實上，台灣人已與高等專門教育絕緣。一九二二年以前，日本人藉着降低台灣人的教育水平鞏

固了他們的領導地位。一九二二年以後，台灣人雖然能夠進入高等教育的圈子，但仍受到許多限制。這樣的做法無法再確保日本人的統治地位。一九二五年籌備、一九二八年開學的台北帝國大學，本質上仍舊是爲日本人設置的㉙。高等專門學校也仍舊由日本人壟斷控制，台灣人獲准入校就讀的機會相當有限。這反映出一個與經濟方面相同的壟斷現象，卽日本企業大資本家和日籍職員在企業中往往占據了特權的地位㉚。

日本殖民時代以前，台灣原有教會學校和傳統形式的「書房」(依據古老的制度由教師授課的私塾)，這種形式的書房保存和傳佈了中國文化，同時成爲維繫民族意識的核心。在文化歧視的政策下，它們的數目也一天天地減少㉛。

教會學校和書房一樣也受到日本人的歧視，隨着公學校的設立而逐漸地減少，這是因爲日本資本家爲了確保獨占地位而驅逐所有外來力量的結果。

日本語在當時不只是教育的工具，也是教育的主要內容。日本人利用教育的手段，藉著語言的同化意圖改變台灣人，但是日語普及的程度卻相當有限㉜。不僅台灣人用一種被動的態度面對日本人語言同化的政策㉝，第一位台灣通史的作者連橫，在《台灣通史》一書中也採取台灣人的觀點寫作，他們都盡一切努力來保存台灣話、發展台灣人的文化㉞。

總括來說，日本人在台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的教育制度並且普及了教育，但是日本教育的特徵在於維護其高階層的統治地位。因此我們可以說，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日本人在各個層面都建立了他們的統治地位。

台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數目是相當有限的，也難以在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公司中工作㉟。他們成爲「高等遊民」的菁英份子，背負着知識分子的重擔，成爲反殖民主義的先鋒。

日本人也箝制了言論和出版自由，即使在日本自由出版的雜誌期刊，輸入台灣時也必須接受嚴厲的檢查，有時甚且禁止進口[36]。有關出版的限制特別嚴厲，如果沒有總督的同意根本不可能出版報紙。在半個世紀當中，除了《台灣民報》以外，台灣人從未獲得出版日報的許可。這份報紙於一九二〇年創刊於東京時採月刊形式，以《台灣青年》的名稱出版（後來改爲週刊形式）。一九二七年獲准在台灣發行，一九三二年得到准許改爲日刊形式。但是這份作爲「台灣人的唯一喉舌」的中文報紙，仍無法避免停刊的厄運，終於被迫與其他報紙在一九四四年合併[37]。

總之，日本統治政策的重點在使台灣從中國分離，以便與日本整合成一體，最後的目標是使台灣在日本的權威統治下成爲一個堡壘，以便滿足日本的經濟需要，並利用台灣成爲日本南進的一個中繼站。日本在政治上施行控制和壓制、在經濟上要求獨占性的臣屬、在文化上採取歧視態度等作爲，都可以從這些目標得到解釋。

第二節　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

日本人的統治激起台灣人的反抗，這種反抗幾乎貫穿了整個殖民統治時代。在武裝抵抗運動受挫之後，從一九一四年起改採非武裝的政治對抗的形式。於是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間出現了近代式的民族主義運動，它最初是採取聯合陣線的組織策略，爾後卻轉換成爲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的矛盾對立。

(一)　武裝抵抗及其失敗

台灣人抵抗外來政權的歷史可以回溯到十七世紀，當時荷蘭人占據台灣的南部，曾遭到郭懷一領導的強烈反抗[38]。另外，在清朝統治期間也有所謂「十年一大亂、五年一小亂」的說法[39]。

台灣人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武裝行動，是從一八九五年五月創建「台灣民主國」[40]開始，當時遭到了嚴厲的壓制[41]。這種直接抵抗的行動在一九一五年結束，這一年爆發了大規模的「西來庵」起義事件，這個在台灣南部爆發的起義事件最後也遭到彈壓[42]。

當時，每一種觀念思潮都可以說服台灣人，而台灣人的抵抗行動多採排外的形式——一種以中國爲中心的種族中心主義的形式。在這個階段中，台灣是由軍事總督統治[43]。

(二)　民族運動的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受到民主、自決和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一

種新的抵抗形式在台灣青年知識分子領導下發展開來，他們瞭解武裝抵抗已無效果，所以在成立政治性組織時，宣佈將追求合法的目標並在法律制度下活動。有關種族平等、自治和普選的訴求，變成新的抵抗意識的核心[44]。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初步的議會法則及民主措施經由介紹傳入日本，開啓了自由主義的路線，這使得日本有心人士也想將部分內容沿用到台灣來。板垣退助是日本的名律師及自由黨的創始人，他於一九一四年訪問台北，與林獻堂[45]一起組織「台灣同化會」，這個組織成立的目的，是在種族平等的基礎上尋求日本人和台灣人之間的和諧關係[46]。同化會受歡迎的程度令日本當局擔心，終於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底，總督以同化會擾亂公共秩序爲理由下令解散，結束了它短暫的生命[47]。

不論如何，像同化會這種組織，其生存期過於短暫，沒有時間可以讓它有所作爲。然而，由歷史的角度來觀察，同化會卻激勵了台灣人，在不久之後團結在林獻堂周圍發起了一項政治運動[48]。

從一九一八年開始，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嘗試要求廢除「六三法案」。一九二〇年留在日本的台灣人成立「新民會」的組織，林獻堂被推爲會長[49]，在一九二〇年三月的一次會議中，該會通過了三個主要目標[50]：

1. 爲了教育台灣人民，並將台灣島的眞實情況告訴日本大衆，應該出版一份雜誌(一九二〇年七月他們終於爭取到第一份月刊，《台灣青年》獲准出版)。
2. 尋求中國的援助。
3. 針對總督的統治，發起政治改革運動。

在有關撤廢六三法案的爭論結束以後，「新民會」決定發起「台灣議會設置運動」[51]。

從一九二一年二月開始，台灣人開始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這是一個

具有自治特徵的運動，爲的是在日本統治下，台灣人民能夠獲得某些民政事務上的權力。換句話說，選出一個代表全島居民的立法團體，它的功能彷彿帝國議會的縮影，能夠公佈法律並通過總督政府的預算❺❷。這個運動和它提倡的觀念受到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廣泛的支持，再加上許多日本自由主義者和有影響力人士的幫助和鼓勵，使得這個運動持續了十五年。面對日警嚴格的控制力量❺❸，這的確是一項卓越的成就。

然而，帝國議會從未審查這些請願書，總督府對這個運動也一直懷抱着敵意❺❹。一九二三年年底，依據治安警察法，日本總督下令逮捕「台灣議會期成同盟」的會員以及相關人士（這個同盟組織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底成立，但是三天後卽遭日本當局禁止）。在被逮捕的人當中，約有一打人被起訴，這就是所謂的「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簡稱治警事件）。最後蔡培火、蔣渭水被判禁錮四個月，蔡惠如和其他四人禁錮三個月，其餘則判處罰金或無罪釋放❺❺。

這個事件帶給日本當局意想不到的後果：卽台灣人從此更積極地參與民族運動❺❻。這個事件使得部分積極份子瞭解到：政治運動如果獲得工農大衆的支持，便能夠給日本當局帶來壓力。有一部分積極份子開始思考馬克思主義，並傳佈推廣階級運動，因而造成了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內部的分裂❺❼。

與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同一時期，「台灣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負責人同樣是林獻堂、蔡培火與蔣渭水。因此我們可以說，「台灣青年」、「台灣議會期成同盟」以及「文化協會」可以說出自同一根源❺❽。

文化協會的實際目標在喚醒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並培養一種有利的氣氛以推展政治運動❺❾，它設立閱讀書報的場所，使人們能讀到報紙內容，特別是《台灣民報》，並組織暑期學校及夜間班傳佈知識。他們同時在城市

和鄉村組織演講隊，演講的題目極為豐富：包括歷史、地理、自然科學、對殖民政治的控訴以及土地問題等等。這些作為喚醒了大衆、激發了農工運動，以及領導了青年運動㊿。

文化協會密切地加強與東京和中國的台灣留學生組織之間的關係，以便喚起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和引導台灣人的政治意識，追求台灣的解放。

當這些運動逐漸擴大，並傳佈到日本、中國和台灣各地時，他們組成了支持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聯合陣線。但是當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興起，並影響青年知識分子以後，這批青年開始批評民族運動所採取的溫和態度，並對它產生的效果發生懷疑。年輕人當中形成一個新的派系，造成一種分裂局面，台灣的民族運動也因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61。

㈢ 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的對抗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間發生了許多重大的事件：一九二七年文協發生分裂和轉向、工農運動日見激烈、共黨運動獲得進展、文協舊幹部成立「台灣民衆黨」，「台灣黑色青年聯盟」也隨後成立，這些事件激發了台灣政治運動的蓬勃發展。一開始——我們可以說——是民族運動聯合陣線的階段，但後來，卻可以說是與民族運動發生對抗的階級運動勢力高漲的階段。

有一部分青年傾向於無產階級活動，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取得文協臨時大會的控制權，他們不願連溫卿領導下的文協只限制在民族主義啓蒙運動的範疇內，所以在臨時大會中修改了文協的活動方向，使文協成為一個無產階級的文化組織62。除了原有的活動之外，改組後的文協常鼓動工人的鬥爭活動，並且幫助工人組織的成長63。

此外，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間，蔗農和日本人控制下的糖廠不斷地

發生衝突。由於農民反對總督府將土地賣給官吏和退休的公務員，使得各地農民組合在一九二六年六月成功地模仿日本的模式，組成「台灣農民組合」的聯盟組織，這個組織受到日本農民組合及勞動農民黨的支持，它的指導方針也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激發，都支持階級運動。

正當階級運動在台灣發展的時候，留學日本和中國的台灣學生也接受了共產主義的影響，開始進行左翼的活動。一九二八年終於在上海成立了「台灣共產黨」(以下簡稱台共)。台共在台灣成立了黨中央機關，逐漸地控制了台灣的左翼組織，但是它的活動發展情形以及所達到的效果，終於招來日本當局像對付其他左翼組織一樣的破壞措施。這些事件在以後的章節裡會陸續提到，它們構成這本論文的主體部分。

文協左傾以後，包括林獻堂、蔡培火、蔣渭水以及其他人在內的民族主義派老幹部，秉持他們原先的觀點，決定離開文協。一九二七年七月，這些人組成一個新的政治組織——「台灣民衆黨」，揭示的指導綱領是「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及革除社會制度的缺陷」[64]。

民衆黨以組織全體民衆爲基本政策，因而與左翼組織發生衝突。蔣渭水深受孫文學說的啓發，在他的領導下，民衆黨想極力促成民族運動和階級運動的結合[65]。

民衆黨以取得工人運動的領導權並爭取他們的支持，來和文協競爭。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間發生多次的衝突，導致工友會紛紛成立。一九二七年台灣已經有司機工友會、木工工友會、冶金工友會、石工工友會等多種組織。一九二八年二月，在民衆黨的影響下，「台灣工友總聯盟」成立了。這個聯盟組織在民衆黨指導和支持下，持續地增加力量和活動[66]。

但是從民衆黨創立開始，它的內部就已經存在兩種意識形態不同的派系。一派抱持着爭取殖民地自治的目標，偏向合法而漸進的改革路線。另一派堅持爲了實現自決可以使用革命手段[67]。在這種情況下，民衆黨所以

能夠繼續存在，就在於它能與急進份子妥協，這樣也使得民衆黨的領導權落入急進份子手中，它的活動也日趨激烈。一九三〇年，民衆黨內中產階級和大地主宣佈脫離，組成另一個溫和的團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68]。

民衆黨能合法的存在，應歸功於溫和團體仍然側身其內活動的緣故。但是自從這個溫和派系離開後，一九三一年二月在民衆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中，急進份子的目標被採納，他們公開地鼓勵階級運動和民族運動，並視工農大衆爲鬥爭的基本要素。這種活動內容的轉變，使得民衆黨終於被日本當局下令禁止[69]。

民衆黨被壓制以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就成爲台灣唯一獲准存在的政治組織，它象徵性地維持活動直到一九三七年自動解放爲止[70]。台灣的民族運動時代也從此宣告結束。

——第一章註解——

❶「六三法案」或稱爲「台灣に施行すべき法令關する法律」，全部只有六個條文，第一條規定：「台灣總督得在其管轄區域內，發出具有法律効力之命令」。參閱：井出季和太著，郭輝譯，《日據下之台政》（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6），第一册，頁 246—247。該書原標題爲《台灣治績志》。

❷台灣總督官房文書課，《台灣統治綜覽》（東京：1908），頁 49。

❸葉榮鐘等著，《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叢書編輯委員會，1971），頁 53。「六三法案」在 1921（日本大正十年）被修訂爲「第三號法律」，依據第一條第二款，「三號法案」的用意在於促使台灣總督儘量引用日本法律，如果因爲台灣情形特殊，不能適用日本法律的全部或一部分時，才授權台灣總督發佈命令。參閱同書，頁 58—60。以下簡稱《台灣民族運動史》。

❹ Ramon H. Myers, 〝Taiwan as an Imperial Colony of Japan：1895—1945〞, in：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 6(2), déc. 1973, p.426.

❺ Edward I-te Chen,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Korea and Formosa：A Comparison of the System of Political Control〞,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30), 1970, p.144.

❻ Ramon H. Myers, p.427.

❼這是一種連坐的制度，類似中國古代的保甲制度，1898 年由兒玉源太郎總督加以採用。參閱 Chen Ching-Chih, 〝The Japanese Adaptation of the Pao-Chia System in Taiwan, 1895—1945〞,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2), févr. 1975, pp.391—416.

❽ Hyman Kublin, "Taiwan's Japanese Interlude, 1895—1945", in: Paul K. T. Sih (éd.), Taiwan in Modern Times (New York: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23.

❾非軍事方面的總預算當中，單是警務費用在1904年以前就佔了40%至50%，但其實是超過了50%。而且，1898年至1913年，地方預算中，警務的費用由50%升爲70%，也就是說，台灣人所繳納的稅賦有一半是供警察使用，以監視這些納稅的台灣人。參閱周憲文，《日據時代台灣經濟史》(台北：台灣銀行，1958)，第一册，頁3—4；第二册，頁368。

❿劉滙湘，《日據時期台灣警察之研究》(台北：台灣省警務處，1952)，頁41—42.

⓫葉榮鐘，"日據時代台灣的日本警察"，收入：葉榮鐘，《小屋大車集》(台中：中央書局，1967)，頁168。

⓬同上，頁171。黃靜嘉，《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法制與殖民統治》(台北：1960)，頁133、200—202。

⓭周憲文，第一册，頁14。

⓮我們無法肯定日本特別想將台灣工業化，只是在三十年代末期，爲了準備戰爭，日本必須在台灣建立工業基地。參閱 Samuel P. S. H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Taiwan :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n 34(2), févr. 1975, p.421.

⓯ Samuel P. S. H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29.

⓰在三十年代中期，大約29%的日本進口貨品來自朝鮮、台灣和滿洲。米和糖佔日本進口總額的15%至20%。日本消費的糖，其中75%由台灣供應。參閱 William W. Loc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éd., augm.(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536.

我們可以下列圖表簡單說明台灣在經濟上對日本的附屬關係：

	米和糖在台灣出口中所佔百分比			運往日本的米和糖所佔百分比		
	米	糖	總額	米	糖	佔輸往日本貨品的百分比
1905	24.3	24.2	48.5	89.9	99.6	56.2
1915	11.0	48.0	59.0	97.0	99.1	79.6
1925	27.4	42.4	69.8	99.9	94.7	81.9
1935	30.1	43.2	73.3	99.9	96.3	90.0

資料來源：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の台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1975), 頁61、62、163。

⑰ Chang Han-Yuet Ramon H. Myers, "Japanese Coloni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Taiwan, 1895—1906：A Case of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2(4), autumn 1963, pp.448—449.

⑱ Samuel P. S. Ho, p.32.

⑲ 矢內原忠雄著, 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初版, 1929)(台北：台灣銀行, 1956), 頁5—42。

⑳ 1924 年以前，台灣人沒有權利組織同業公會，沒有日本人的參與也不能成立公司。參閱張漢裕，〝日據時代台灣經濟之演變〞，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經濟史二集》(台北：台灣銀行，1955)，頁 96。

㉑ Samuel P. S. Ho, p.39.

㉒清朝末年的土地所有制度，其關係甚爲複雜，同一塊土地，上有「大租戶」，中間是「小租戶」，最下面才是佃農，眞正的耕種者。參閱王益滔《光復前台灣之土地制度與土地政策》，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經濟史十集》(台北：台灣銀行，1966)，頁 62—70。又參閱 Ramon H. Myers et Adrienne Ching,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Journal of Asian Stndies 23(4), autumn 1964, pp. 560—562.

㉓王益滔，頁 71—72。泉風浪，《台灣的民族運動》(台中：台灣圖書印刷合資會社，1928)，頁 193—230。關於整個農民運動，參閱 Edgar Wickberg, 〝The Taiwan Peasant Movement, 1923—1932 : Chinese Rural Radicalism Under Japanese Development Programs〞, Pacific Affaire 48(4), juin 1975, pp.558—582.

㉔日本對台灣製糖工業的發展與壟斷，被矢內原忠雄形容爲「糖業的帝國主義」，這也是他的書中第二篇的篇名：「台灣糖業帝國主義」，頁 96—134。另外參閱涂照彥，頁 60—73。

㉕台灣入學兒童的比率，1899 年是 2.04%；1919 年爲 20.69%，1929 年 30.68%。然而，日本學童的比率是 1899 年 23.71%，1919 年 95.57%，1929 年 98.64%。參閱井出季和太，第一册，頁 44,「初等教育普通比率表」。

㉖矢內原忠雄，頁 73。這種教育上的歧視引發了台灣人要求台中創立

中學的請願運動，台灣總督府不得已在1915年開辦公立台中中學校，1919年改稱爲公立台中高等普通學校，作爲台灣人中等教育機關。參閱《台灣民族運動史》，頁35—52。

㉗矢內原忠雄，頁73—74。1941年大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爲了表示平等起見，才將小學校和公學校統一稱爲「國民學校」。但事實上，學校並未統一，所授課程也不相同。參閱盛清沂、王詩琅、高樹藩，《台灣史》(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頁591。

㉘根據台灣總督府有關學校事務的第25年報，日本學生的數目從1921年到1928年成長了三倍，由224人變成606人；而台灣學生的數目則減少了2／3，在專業教育方面，包括醫學院和高等商業學校及高等農業學校，人數由640人減爲220人。參閱謝春木,《台灣人は斯く觀る》(台北：台灣民報社，1930)，第一編，頁59—60。

㉙Tsurumi Patricia E.,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Co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22—124.

㉚矢內原忠雄，頁75。

㉛王詩琅，〝北市書房最後數字〞，再版（初版：《台北文物》5卷4期，1957年6月），見：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78)，頁186。另參閱 Tsurumi, ibid., pp.30—32.

㉜依據台灣總督府的一項調查，1935年底，懂得日文的台灣人有1,400,000人，佔人口的29.7%，參閱井出季和太，第一册，頁78。

㉝蔡培火，《日本本國民に與ふ》(東京：台灣問題研究會，1928)，頁50。

㉞盧修一，〝連雅堂民族思想之研究〞，《台灣文獻》18卷4期，1967年

12月，頁91—95.

㉟1945年日本殖民統治末期，167個「敕任」的公務員之中只有一個台灣人，2,120名「奏任」的公務員中只有29個台灣人，在21,798個「判任」的公務員中只有3,726個台灣人，佔17%。參閱塩見俊二著，周憲文譯，〝日據時代台灣警察與經濟〞，收入：《台灣經濟史初集》（台北：台灣銀行，1954），頁145—146。

㊱限制新聞及出版的主要法令是1990年頒佈的：「台灣出版物之規定」及「台灣報紙條例」。參閱黃靜嘉，頁179—180。

㊲參閱楊肇嘉，〝台灣新民報小史〞，見：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三版（台北：三民書局，1970），第二册，頁407—440。1973年，《台灣民報》在台北影印重刊，爲從事於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的民族運動所做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彌補有關了那個時期台灣第一手資料的不足。

㊳郭懷一（荷蘭文獻中稱之爲"Capitain Fayec"）領導的反抗行動，造成荷蘭人約一千人的死亡，台灣人約四千人的死亡。參閱連橫（連雅堂），《台灣通史》（初版分成三册，發行於1920—1921年），影印重刊（台北：古亭書屋，1973），頁22—23。

㊴張菼，〝台灣反淸民變的不同性質暨其分類〞，《台灣銀行季刊》27卷3期，1976年9月，頁305。

㊵ Harry J. Lamley的三篇文章對於台灣共和國及台灣人的反抗行動有精彩的描述：

(1) 〝The 1895 Taiwan Republic： A Significant Episod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7(4), autumn 1968, pp.739—762.

(2) 〝The 1895 Taiwan War of Resistance： Local Chinese

Effort against a Foreign Power″, in：Leonard H. D. Gordon (éd.), Taiwan：Studies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 (New York／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23—77.

(3) 〝A Short-lived Republic and War, 1895： Taiwan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Paul K. T. Sih (éd.), pp.241—316.

㊶根據統計，從1898到1902的五年內，有2,999人被判死刑，有8951人未受審判即遭處決。由此可見抵抗者的頑強以及鎮壓的殘酷。參閱：山邊健太郎，「現代史資料」第21輯，《台灣 I》(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頁31。以下我們將此一資料簡稱爲《台灣 I》。

㊷西來庵事件，又稱余淸芳事件，參閱王詩琅、吳家憲，《余淸芳抗日革命案全檔》(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4)，2冊。

㊸Edward I-te Chen, 〝Formosa Political Movement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914—193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3), mai 1972, p.477.

㊹Ibid.

㊺林獻堂是出身台灣中部富紳家庭的地主，參閱 Johanna M. Meskill, “The Lins of Wufeng：The Rise of a Taiwanese Gentry Family”, in：Leonard H. D. Gordon (éd.), pp.6—22. 他的政治信念以及對日本政府的溫和態度深受梁啓超與戴季陶的影響，他與他們分別於1907年及1913年在日本見過面。梁啓超與戴季陶均認爲在最近的未來，台灣人無法期望中國方面的任何幫助，因爲當時的中國沒有能力幫忙台灣人。兩人均鼓勵林獻堂尋求日本自由派人士的協助，以限制台灣總督府對台灣人的壓迫。參閱：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葉榮鐘編著)，《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一，《林

獻堂先生年譜》(台北：1960)，頁15。

㊻ Douglas Mendel, The Politics of Formosa Nationalism (Berkeley/Los Angeles, C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22. 另外參閱台灣同化會定款（章程），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鷲巢敦哉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1939初版)，復刻版(東京：龍溪書舍，1973)，頁16—18。以下簡稱爲《沿革誌》。此一資料，台灣史料保存會亦曾影印出版。書名改爲《日本統治下的民族運動(下)：政治運動篇》(東京：風林書房，1969)。

㊼郭水潭，〝台灣同化運動史話〞，《台北文物》4卷1期，1955年5月，頁109。

㊽蔡焙火，〝日據時期台灣民族運動〞，《台灣文獻》16卷2期，1965年6月，頁175。矢內忠雄，頁89。

㊾謝春木，《台灣人の要求：民衆黨の發展過程を通じて》(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1)，頁8。

㊿《沿革誌》，頁27。

51《沿革誌》，頁311—312。林慈舟（林呈祿），〝六三問題之命運〞，《台灣青年》1卷5期，1920年12月15日，漢文版，頁16-29。

52 Douglas Mendel, p.3.

53 Edward I-te Chen, 〝Formosa Political Movements……〞, p. 484.

54自1921年起至1934年止，前後進行十五次的請願活動，雖然請願書曾經列入貴族院與衆議院請願委員會的議程，但始終不能通過審查而未能列入帝國議會的議程。Cf. George K. Kerr, Formosa, Licensed Revolution and Home Rule Movement 1895-1945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ess, 1974), p. 129.

㊺參閱：高日文,〝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之法庭辯論經過〞,《台灣文獻》17卷1期，1966年3月，頁81—108：18卷1期，1967年3月，頁156—176。

㊻ 1925年第六次請願書的簽署人數增爲三倍(參閱：《沿革誌》頁330—331)，《台灣民報》的銷售量也突然增加到10,000份(參閱：謝春木：《台灣人の要求……》，頁23)。

㊼ Edward I-te Chen, 〝Formosa Political Movements……〞, p. 488.

㊽矢內原忠雄，頁90。

㊾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史》，卷九,《革命志／抗日篇》(台北：1971)，頁62。以下簡稱《抗日篇》。

㊿有關文協的種種活動，參閱葉榮鐘等著，頁295—319。

61參閱：黃煌雄，〝文化協會的分裂及影響〞，見張俊宏主編《春風叢書》第一輯（台北：春風出版社，1978)，頁68—84。

62參閱：〝文協會則大改〞,《台灣民報》141期，1927年1月23日，頁5—8。

63《沿革志》，頁222—223。

64謝春木,《台灣人の要求……》，頁87。

65黃煌雄在其所著的蔣渭水傳記中，將孫中山及蔣渭水兩人的思想作一比較，指出孫中山對蔣渭水的影響，作者認爲蔣渭水是《台灣的孫中山》。參閱：《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台北：1976)，頁261—281。

66簡炯仁,《台灣民衆黨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

士論文，1977)，頁83—84。

㊼謝春木，頁39—40。

㊽《抗日篇》，頁92。

㊾《台灣新民報》352期，1921年2月21日，頁3。另參閱："台灣民衆黨禁止理由"，《沿革誌》，頁514—516。

㊿楊肇嘉，第二册，頁318。

第二章
台灣共產黨成立前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

第一節　在日本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

日據時期留學日本東京的台灣學生，和日共份子常有聯繫並受到影響，他們效法日本人組織社會科學的研究團體，而且傳佈共產主義的思想，並逐漸取得「東京台灣青年會」的領導權，同時也為「台共東京支部」做好了成立前的準備工作。

(一)　台灣青年會的成立與社會科學研究的組織

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九年這段期間，因為台灣缺乏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一些富有的台灣家庭開始將子弟送往日本讀書，東京是這些學生的主要集中地，學生的數目年年增加。一九〇八年時台灣留學生的數目不超過六十位，一九二二年時却高達二千四百位。台灣總督府於一九〇八年設置辦事處，負責監視台灣學生的任務，一九一二年，特別為台灣學生籌建的「高砂寮」在東京正式完成❶。

由於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意識高漲的影響，台灣的學生紛紛投入政治運動。當一九二〇年「新民會」在東京成立的時候，絕大部分的參與者都是學生。爲了擴大這些參與者的政治活動，他們另外成立了「台灣青年會」，作爲新民會對外活動的化身。他們的刊物是「台灣青年」雜誌，這個組織參加了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並趁着假期返台組織各種演講會，與文化協會時有聯繫活動❷。

二十世紀初期，社會主義思潮開始傳入日本，但是一直到一九一七年蘇聯十月革命以後，馬列主義的學說才逐漸影響到學生、知識份子和工人身上。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這個階段中，蜂湧而起的結社、刊物出版和活動沒有一項不和馬列主義發生關係。東京大學的學生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成立「新人會」以研究馬克思主義；早稻田大學的學生也組織相同性質的「曉民會」。一九二〇年，幾個已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學校組成「日本社會主義同盟」❸。

台灣留學生當中，彭華英是最早爲社會主義思潮所吸引的人，他在日本明治大學就讀期間即已參加「曉民會」組織，同時登記爲「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盟員❹。他曾經在《台灣青年》上發表了第一篇討論社會主義的文章，以便在台灣學生當中擴展社會主義思想❺。他特別和朝鮮左翼分子及中國學生聯繫，但是由於日警嚴密的監視，他只好前往上海繼續推行共產主義活動❻。

當社會主義思潮瀰漫日本的時候，日本學生基於研究馬列主義思想潮流的需要，在一九二三年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這個社會主義團體，隨後於一九二四年年底改稱爲「學生社會科學聯合會」。這個聯合會擁有遍佈全國的五十八個支會組織，包括一千五百位會員❼。台灣學生在感受到這些社會主義團體的影響後，造成「台灣青年會」第一次分裂❽。社會主義潮流滲入了青年會，受到影響的主要人物包括：許乃昌、楊貴、楊雲萍、

商滿生、高天成、黃宗垚、林朝宗和林聰等人❾。許乃昌於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大學就讀，稍後在一九二四年被當時擔任孫文政治顧問的鮑羅廷送往莫斯科，進入「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KUTV)受訓。許乃昌和同輩的謝廉淸當時都是「上海台灣靑年會」的領導人物，他倆是鮑羅廷當時送往莫斯科學習的一百五十位學生當中的第一批台灣學生❿。當許乃昌從莫斯科東返後，於一九二五年八月回到東京，負責發展台灣人的共產主義運動，並且成爲台灣人組成的社會主義團體的一個主要成員⓫。

在「新人會」指導下，這批台灣學生定期集會研究馬列主義的學說，一九二六年一月他們組成「台灣新文化學會」，這個組織被置於新人會的領導下，企圖擴展他們對台灣人的影響力⓬。

一九二七年三月在一次定期聚會中，靑年會基於新文化學會會員們的建議，決定在靑年會之下創立一個社會科學研究的部門⓭。這批新文化協會分子成立籌備委員會，經過他們的努力一共召集了八十位會員，四月底在許乃昌的指導下，其中三十位會員祕密集會組織「社會科學研究部」，並決定未來行動的主要路線⓮：

1. 社會科學研究部的研究內容保密。
2. 研究部的組織依照共產黨的形式。
3. 籌備委員卽指導委員會成員，擁有完成研究部活動的所有權力。
4. 繼續與日本左翼學生組織及台灣左翼組織保持聯繫。

在靑年會的掩護下，研究部採取一種類似共黨的活動方式。研究部的領導人包括下面這些永久會員：黃宗垚、許乃昌、陳來旺、楊雲萍、陳銓生⓯。東京地區總共成立六個支部，他們每星期舉行一次祕密會議，研究和討論共產主義的書籍文獻，並聽取「新人會」的演講。這種工作聯繫的對象同時包括「學生社會科學聯合會」，特別包括一九二七年開始左傾的文協，另外還有農民組合等組織。他們趁着假期返台組織演講會，以便在台

灣擴展他們的影響力[16]。

(二) 左翼的控制及其演變

由於社會科學研究採取祕密活動的作法，以及日警對全國社會科學聯合會的壓制，引起台灣青年會中民族主義分子和研究部會員間的衝突，導致青年會和研究部之間的分裂。一九二七年某次會議中，民族主義分子提出解散研究部的建議，在他們的建議被拒絕之後離開青年會這個組織，這次分裂事件當時曾經有過公開的報導[17]。十一月青年會重新改選，研究部會員獲得勝利[18]。在失掉文協領導權後的同一年，民族主義派在日本又遭遇一次新的挫敗。

研究部的會員在獲得台灣青年會控制權之後，開始推廣共產主義運動，進行與日本同性質的團體聯繫，並與日共建立關係；他們同時與台灣的左翼組織建立聯絡管道。在這個時候才出現推展運動的具體步驟，它的組織系統才確實有所發展。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帝國議會第一次舉行男性的普選，甫於一九二七年祕密重建的日本共產黨，也以勞動農民黨名義提名競選，這次選舉第一次將日共帶上日本的政治舞台。然而日本政府增加了它的政治力量，選舉後不到一個月，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爆發大規模逮捕共黨領袖的事件[19]。四月十日內務省首宣佈解散三個有共黨嫌疑的組織：「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勞動農民黨」以及「日本無產青年同盟」。其後，受「新人會」影響的各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也次第遭到壓制而解散[20]。

「三一五事件」之後，日本的局勢越來越緊張，青年會的舊幹部準備恢復在青年會的領導權，研究部的領導人因此考慮到研究部不能再留在青年會了。三月底，他們宣佈社會科學研究部自立門戶，改名「社會科學研

究會」，但是改組後沒有多久，這個組織也逃不了日警禁止的命運。這些事件迫使這個組織再改名為「台灣學術研究會」㉑。

當時，沒有一個左翼組織能夠合法地存在，它們幾乎不可能有任何實質上的活動。儘管如此，該會活躍的積極分子陳來旺，仍舊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初前往上海，和林木順（化名林民埉）一同參加台灣共產黨建黨大會㉒。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陳來旺從上海返回東京，其任務是在東京成立台灣共產黨支部。當時東京局勢日趨不利，他只能和他的同志恢復聯繫，暫時等待機會進行活動。

左翼的台灣人團體，經由他們的活動獲得了一個有利的環境，終於在九月份成立「台共東京特別支部」。前述台灣人團體的成員成為特別支部的黨員，部分的成員回到台灣後，在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第二節　在中國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

台灣學生在中國接受中國革命的影響，開始進行抗日的運動。當國共合作階段，台灣的解放運動在台灣共產主義者的指導及影響下，逐漸地傾向共產主義。這批舉足輕重的角色曾分別在莫斯科和上海讀書。

(一) 民族意識的覺醒和在中國的台灣人組織

台灣和大陸只隔着一道狹窄的海峽，所以兩地的聯繫很容易，尤其是對岸的福建，更是大多數台灣人的祖籍地。日本人爲了防止台灣人前往中國大陸，強迫性地要求台灣人必須具備「渡華旅券」(相當於護照) 才能往返兩地，而這種證件只有經過日警調查後才能取得。但是日本與中國之間卻未實施這種規定㉓。

一九二二年以後，由於日本人在教育制度上的不公平安排，造成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無法在台灣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另一方面，文協的活動與民族意識的覺醒相互結合，而與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產生關連，無可避免地吸引了許多台灣學生前往中國求學。他們或者偷渡到福建，或者取道日本再轉往中國沿海大都市就讀，包括廣州、廈門、上海、北京等㉔。

日本在華南設有領事館，負有監視台灣人的任務，防止他們與中國人聯繫，日本當局懷疑台灣學生受到中國民族主義革命運動的影響，特別擔心他們回台推展共產主義㉕。

儘管如此，隨着中國革命的進展，中國大陸上的台灣學生也展開了台灣的解放工作，並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並行發展。蔡惠如在中國的台灣人革命運動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蔡惠如是親中國的民族主義派領袖之

一，希望台灣回到中國的懷抱，在這個目標下，他時常往返台灣、日本和中國之間，從事台灣人的組織工作㉖。

一九二一年七月，蔡惠如和彭華英一起返回上海，彭華英是台灣第一位社會主義者，前面已有討論。這兩個人在學生羣衆中極力發展台灣人的民族主義運動㉗，因此有一九二二年一月「北京台灣青年會」的成立，一九二三年六月廈門成立了「台灣尙志社」，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成立了「上海台灣青年會」，一九二四年五月上海另外成立「台灣自治協會」，一九二六年三月南京成立「中台同志會」，一九二六年年底「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也告成立㉘。在這些團體中以上海的組織最爲重要，它們在台灣的共產運動中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

(二) 上海的台灣人運動和邁向共產主義的經過

自蔡惠如和彭華英於一九二一年返回上海後，他們開始和台灣人接觸。爲了尋求對台灣民族運動發展上的援助，他們也和國民黨及亞洲各殖民地國家的民族主義者保持聯繫，其中特別重要的是朝鮮共產主義者(如呂運亨)㉙以及中國共產主義者的聯繫工作，他們也經常出入蘇聯領事館以取得財務支援㉚。

上海的台灣解放運動就在他們的努力下獲得進展，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台灣青年會」宣告成立，開始推動實際的工作，譬如與朝鮮和中國人共同協商推動有關的台灣政治運動㉛。

一九二四年三月，居住在中共黨員羅豁家中的台灣人和朝鮮人，也感染了羅豁的政治信念，三月底，在呂運亨及彭華英的提議下，他們和許乃昌、蔡孝乾……等人共同組織了「平社」。這個組織成立的目的在研究和推廣共產主義，出版《平平》刊物祕密運回台灣散發，並與蔣渭水取得聯繫㉜。

這個組織的成員譴責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懷疑這個運動的有效性，他們並將意見傳達給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㉝。他們主張組織一個大規模的反帝同盟，來聯合東亞各弱小民族對付日本帝國主義㉞。

許乃昌、謝廉清兩位青年會幹部曾經前往莫斯科受訓，在他們東返後，開始發展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許返回東京，謝則往返北京、上海、厦門、廣州等地活動，組織左翼的台灣學生。謝回到上海後和彭華英合作，他們共同組織了「赤星會」，同時出版《赤星》雜誌，用來傳佈共產主義思想㉟。

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使中國共產黨獲得發展機會，並且在青年中伸展了它的影響力㊱。上海的台灣學生受到中國學生運動的影響，特別是受到共產主義潮流的影響。就讀於「共產黨大本營」——上海大學㊲的台灣學生，在瞿秋白㊳的教導下，日後都成爲台灣共產主義運動的積極分子。譬如蔡孝乾(蔡乾)，在他父親及文化協會的資助下，於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來到上海大學研讀社會學，成爲瞿秋白的學生。在瞿秋白和陳獨秀指導下，他對馬克思主義發生興趣，一九二五年並成爲上海共青團團員㊴。此外，如謝雪紅(本名謝阿女)，她生長在台中的一個貧苦家庭，十五歲的時候爲人作妾並進入一家糖廠工作，種下反抗意識。她曾經前往日本，返回台灣後，直到一九二五年之前一直參加文協的婦女運動，在遭遇日警壓制後，她與林木順前往上海，進入上海大學就讀，曾經積極參與「五卅運動」。他們與中共青年團也互有聯絡㊵。

爲了進行台灣人的組織運動，一九二五年年底在彭華英和蔡孝乾的提議下，他們仿照中國學生會的例子組成「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這個學生會取代了上海其他台灣人的組織，當時上海左翼的台灣人紛紛加入這個新組織，對於在中國發展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而言，這象徵着一個新階段的開始㊶。

西元一九二六年，謝雪紅及林木順經中共黨員的推薦前往莫斯科，進

入「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KUTV)就讀[42]，一九二七年年底學業告一段落，他們接受第三國際的指令，在日共的指導下發展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但是返回上海後，卻發現那兒的情勢已完全不同。

自從國共決裂後，上海屬於國民黨的控制範圍，共黨的活動必須祕密進行，上海日本總領事館的警察也在搜捕反日的積極分子。謝及林返回上海後，必須隱蔽自己以便祕密進行政治活動；經由日共代表鍋山貞親的協助，他們與日共取得聯繫。他們同時與翁澤生恢復聯絡，獲知有關台灣和上海的情況[43]。

翁澤生是台北人，曾就讀於廈門集美中學，趁假期返回台灣從事政治活動，成爲無產青年團體的一個領導者。稍後進入上海大學就讀，並成爲瞿秋白的學生。自從成爲一名中共黨員後，他積極地參與台灣學生會的活動，因而成爲一名領導人物[44]。

謝、林及翁這三名台共的組黨者，一起爲共產運動的進展而工作。一九二七年年底他們組成了「台灣讀書會」，參加的人都是台灣學生聯合會的左傾分子，包括江水得、陳粗皮、陳美玉、張茂良、劉守鴻、楊金泉和林松水等人，他們開始研究共產主義，並於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名爲《屋內刊》的刊物，以會員及同情者爲發送對象。讀書會逐漸推展活動，並爲未來台共的建黨奠下堅實的基礎[45]。

㈢ 廣州和北京的台灣學生運動

一九二一年年初，估計住在北京的台灣學生不超過三十個，他們在一九二二年一月組成「北京台灣青年會」，並與台灣的文化協會保持聯絡，對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給予支持[46]。由於謝廉清和謝文達的努力，大多數青年會會員都傾向共產主義。范本梁（鐵牛）於一九二〇年就讀東京上智大學，

結識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等人，因而遭到日警的監視。他於一九二二年轉赴北京大學就讀，成爲青年會的活躍分子㊼。他也在北京與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互有聯繫，並組織「新台灣安社」，出版《新台灣》刊物傳回台灣，產生若干的影響㊽。一九二六年七月，范於返台後被捕，以他的活動論罪，被判刑五年㊾。

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之前，廣州一直是國民黨的根據地，但也是共產主義最活躍的地方，這種情形足以說明爲什麼台灣學生能同時接受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影響。一九二六年年底北伐開始的幾個月後，在中山大學校長戴季陶指導下，「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成立㊿。次年三月，以聯合會的成員爲基礎，祕密地成立「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它的團員支持台灣的獨立運動，反對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想法，認爲這種作法並不可靠[51]。他們出版《台灣先鋒》雜誌，大多數都送回台灣[52]。

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黨展開對共產黨的鬥爭，六月，革命青年團被視爲左翼組織而被迫解散，主要領袖林文騰、張深切、郭德金被日警逮捕，並在台灣被拘禁[53]。解散後，有些團員加入共產黨、有些團員參加台共的建黨大會，而在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三節　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

(一) 社會問題研究會和青年組織

一九二一年彭華英在《台灣青年》雜誌上發表了第一篇討論社會主義的文章，同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時候，台灣已經有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讀書會組織，儘管這個讀書會組織壽命很短暫，但是這兩件事說明，台灣的社會主義思潮倡導者和稍晚成立的「社會問題研究會」之間並非沒有關係。

文協成立後，在日本和中國的台灣學生與這個組織時有聯繫，這批接受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影響的學生，透過文協同時將這兩種思潮傳回台灣。

在台北，連溫卿與在中國傳佈共產主義運動的彭華英及謝文達[54]。之間互有聯絡。連溫卿是時醉心於世界語，日本世界語專家山口小靜當年年底來到台灣，在她的影響下，連氏逐漸傾向社會主義[55]，並且認識日共創始人之一的山川均，從而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洗禮[56]。蔣渭水——這位文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很關切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情形，自從孫文採取聯俄容共的政策以後，他也對共產主義有了興趣。透過他們的關係，共產主義得以在台灣的知識份子當中發揮影響力。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全球經濟蕭條，台灣工農運動日益上昇，台灣社會科學研究的潮流也就越來越受到重視[57]。

一九二三年七月，連溫卿、謝文達、蔣渭水、石煥長、蔡式穀在台北成立「社會問題研究會」，爲了籌備七月廿三日的集會，他們印製並分發了有關研究會規章的小冊子。但是總督府爲了阻止它的成立，以違反出版規定爲由，立即禁止小冊子的分發行爲。儘管遭到禁止，研究會的活動並未因此中斷[58]。

月底，翁澤生提議在文協的指導下組織「台北青年會」，也立刻遭到總

督府的禁止㊾，青年會的成員不顧禁止命令另外成立組織，如「台北青年體育會」以及「台北青年讀書會」，繼續展開活動㊿。

這兩個組織的成員時常集會，進行社會問題的研究活動、討論各種思潮，並推展共產主義的準備工作。漸漸地，它們的內部發生分化，形成了「無產青年」的團體，翁澤生、洪朝宗、王萬得、潘欽信、蔡孝乾都是其中的有力分子。在文協的指導下，全島各地依照台北的例子紛紛成立類似的青年會組織。

一九二四年五月，連溫卿參加在東京舉行的世界語大賽並認識山川均。返台後，他召集台北和彰化的「無產青年」，極力分發日共支持的《無產者新聞》及《前進》雜誌，以傳佈山川均的共產主義思想[61]。

一九二五年一月，這個青年團體開始籌備列寧紀念會，五月又準備舉行勞動節示威遊行，這兩個計畫都因日警的干涉而未能如願[62]。一九二六年，趁着六月十七日日人慶祝「始政紀念日」的機會，無產青年的成員召集一項會議圖謀公開予以譴責。就在此時，潘欽信、洪朝宗、王萬得及連溫卿被日警逮捕[63]。

無產青年對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以及文協的活動並不滿意，認爲文協的活動過於溫和，因此，這些成員在《台灣民報》上發表一篇〝無產青年公開狀〞的文章，在文中表示他們與文協有不同的意識形態[64]。

同年十月，王、潘、洪及其他無產青年對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領袖表示了他們的反對態度，當時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並未完全對立，在日人小澤一的策劃下，一九二六年年底成立了「台灣黑色青年聯盟」，台北和彰化的無產青年都參加這個組織，其中以王萬得、洪朝宗、王詩琅、蔡孝乾爲主[65]。

但是一九二七年二月聯盟會員被逮捕後，這個組織便解散了，它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也消沉了。同時，共產主義正於此時勃興，某些黑色聯盟的會員因而轉向台共[66]。

㈡ 文化協會的左傾

西元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間，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有了新的變化，在台灣內外台灣人左翼運動的影響下，原爲統一戰線形式的民族主義運動，無可避免地面臨分裂的命運。這種情形，蔡孝乾在他的文章「轉換期的文化運動」中有所指陳：

「在改組以前，不滿文協的民衆是不少。這（是）不過火的話，留中學生的大部分，留日學生的一部分，島內民衆的進步分子，都是不滿文協在來組織的不完備，幹部行動的紳士氣，主張言論的不徹底等等。」㊼

這些不滿份子產生了一股改革的氣氛，以後導致文協的分裂。

當時文協中存在着三種不同的思想傾向㊽：

1. 第一種是連溫卿及王敏川組成的社會主義派。主要以無產青年和農民組合爲代表，這一派追求的目標是推行階級鬥爭。
2. 第二種是所謂的「全民主義」派。受中國國民革命的影響，由蔣渭水所領導，它集合了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企圖在工農運動中維持統一的民族主義運動形式。
3. 第三種是由蔡培火代表的溫和民族主義運動派。這批人主要是台灣的資產階級及地主，主張以合法的路線達到自決的目的。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至三日在台中舉行的文協臨時總會中，爲了辯論改革的問題，連及王獲得無產青年的支持成爲多數派，取得了文協的領導權。蔡培火及蔣渭水被迫先後離開文協，他們準備另外成立一個組織㊾。

早在一九二七年文協改組以前，台灣社會運動於發展過程中卽已存在了兩種對立的思潮，這兩種思潮分別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外貌出現，而在圍繞着「中國的重建」這個主題上發生一場大論戰，前者以許乃昌和

蔡孝乾爲代表，後者則以陳芳園（逢源）爲代表⑳。

爲了避免日本當局的檢查，這場論戰集中在「中國的重建」這個問題的討論上，實際上是討論台灣解放運動的策略問題。連溫卿在給文協的一篇報告〝一九二七年的台灣〞中，曾經評述這種情勢：陳芳園說台灣因爲沒有資本主義所以應該加以發展以抵抗日本的資本主義，這種說法只代表少數人（地主和台灣資本家）的利益，只是想支持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相反的，許和蔡認爲台灣存在着資本主義，他們依附着日本資本家的統治，而大多數的台灣人是工農羣衆，受到剝削和壓制，因此，結論是只有階級鬥爭才能夠解放台灣㉑。這場論戰持續了五個多月，構成「當時報紙上的一大偉觀」㉒，充分表達了當時台灣這兩種思潮，並在文協中造成社會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分裂的氣氛，最後民族主義者成爲少數派㉓。

這場分裂象徵台灣解放運動衝突對立的開始㉔，文協成爲左翼發展勢力的一個組織。在連及王的指導下，新文協的年輕幹部及積極分子屢次集會，除了傳佈左派思想以外，還批評殖民政府機關並發展工人運動。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連溫卿在台北成立了台灣第一個機械工會，這是台灣工人組織的起源。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四日文協在台中舉行第一次大會，大會通過的宣言表明了這個組織的性質，它是一個農民、工人、小商人及小資產階級組成的戰鬥團體。換句話說，新文協要開展階級鬥爭運動來護衛一般大衆的利益㉕。

㈢ 農民組合的馬克思主義化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間，日本勞農黨部麻生久及布施辰治曾經兩度來台，爲二林事件涉嫌人辯護㉖。由台灣農民組合的兩位負責人簡吉和趙港安排，在全島各地舉辦講演會，傳揚階級鬥爭的必要性、呼籲對資本主

義和地主進行的鬥爭必須團結。從一九二七年開始到一九二八年六月止，台灣的農民運動達到了最高潮，農組也加強了與日本有關團體的政治聯繫。

一九二七年二月，簡吉和趙港前往東京的帝國議會，呈遞有關農民問題的請願書，他們與左翼政治團體取得聯繫，特別是與日本勞農黨和日本農民組合的聯繫。這兩個組織與日共相當接近，而當時勞農黨已成爲與日共互有關聯的合法性無產階級政黨，派古屋貞雄律師駐在台中，擔任台灣農民組合的顧問，也擔保了台灣農民組合今後與勞農黨的聯繫⑰。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的農民組合迅速地左轉，它發動各種示威遊行、組織左翼聯合陣線；藉着古屋貞雄的協助，又與朝鮮左翼運動取得聯繫。台灣的農民運動除了日漸傾向社會主義之外，也朝向階級鬥爭發展⑱。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農組在台中召開第一次大會⑲，在會議期間通過許多決議，其中特別重要的有三點⑳：

1.支持日本勞農黨。

2.成立特別活動組，進行無產階級鬥爭。

3.在馬克思主義範圍內，加速工農羣衆的團結。

這次大會後，農組發表一篇文章——「台灣農民組合的過去、現在、未來」，在文章中確定農民運動今後追隨的是馬克思主義路線㉑。因此，農組強化了它與文協的合作關係，並且籌組共同的鬥爭行動。文協和農組的左傾，構成台灣島內台共發展史上具有決定性的一頁。

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主要在台灣的年青人中發展勢力，它對在台的日本青年也產生影響，這些年青人當中出現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即一九二八年在台北成立的「第一線讀書會」。它與文協及農組都取得聯繫，儘管它的存在相當短暫，但「第一線讀書會」爲台灣人和日本人指出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上，他們可以採取共同的行動㉒。

—— 第二章註解 ——

❶《沿革誌》，頁 23—24。張深切的自傳，《里程碑：黑色的太陽〉(台中：聖工出版社，1961)，第一册，頁 125。

❷盛清沂等著，頁 680—681。《沿革誌》，頁 28、31、33。

❸ Robert A. Scalapino, The Japanese Communist Movment, 1920—1966 (Berkeley/Los Angeles, Cal.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10—11. George M. Beckmann et Okubo Genji,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22—1945 (Stanford, Cal. :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4.

❹山邊健太郎編，「現代史資料」第 22 輯，《台灣II》(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頁 31。以下簡稱《台灣II》。

❺彭華英，〝社會主義之概說(上)〞，《台灣青年》2 卷 4 期，1921 年 5 月，頁 50—57。連溫卿於 1927 年評論這篇文章爲台灣社會主義思潮的先驅。參閱：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台灣民報》138 期，1927 年 1 月 2 日，頁 12。

❻《沿革誌》，頁 584。

❼ Scalapino, p.26.

❽楊肇嘉，第一册，頁 231。

❾《沿革誌》，頁 37—38。另參閱：林梵，《楊逵畫像》(台北：筆架山出版社，1978)，頁 76。

❿依據《沿革誌》頁 38，許乃昌於 1924 年 8 月至 1925 年 6 月在俄國一所共產主義學校唸書；但頁 584 的記載，許於 1924 年 10 月至 1925 年 7 月在孫逸仙大學唸書；而頁 184 則指出許於 1923 年 9 月在上海大學就讀，

認識了陳獨秀，後來於1924年8月由陳獨秀介紹進入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就讀，直到1925年6月才回到上海。根據研究，許乃昌事實上就讀於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因爲孫逸仙大學於1925年才創立，到了1926年才招收學生。Cf. (1) Xenia J. Eudin et Robert C.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1927 (Stanford, Cal.：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84—87. (2)楊子烈，《張國燾夫人回憶錄》(香港：自聯出版社，1970)，第二章。(3) Sheng Yueh (Sheng Chung-li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Kansas：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1), p.31. (4)王建民，《中國共產黨史稿》，增訂再版(香港：中文圖書供應社，1975)，第二册，頁81—82。

⑪《沿革誌》，頁38。

⑫《沿革誌》，頁36、663。

⑬楊肇嘉，第一册，頁231。《台灣民報》151期，1927年8月3日，頁4。

⑭《沿革誌》，頁39。

⑮《沿革誌》，頁40。〝陳來旺聽取書〞，收入：東京警視廳特別高等課內鮮高等係編，《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員檢舉顚末》(東京：1929年)，參見：《台灣II》，頁85。以下簡稱《台共檢舉顚末》。

⑯《沿革誌》，頁39—40。《台共檢舉顚末》，同上。

⑰《台灣民報》182期，1927年11月23日，頁3；《沿革誌》，頁40。

⑱楊肇嘉，第一册，頁231—232。當選名單參閱《台灣民報》184期，1927年11月27日，頁3。

⑲ Scalapino, pp.33—34. Beckmann & Okubo, pp.153—154.

⑳ Beckmann & Okubo, pp.155—156。另參閱：立花隆，《日本共產黨研究》(東京：講談社，1978)，上册，頁214—215、218。

㉑《沿革誌》，頁 41—42、664。

㉒〝陳來旺聽取書〞，見：《台灣II》，頁 85—86。

㉓《抗日篇》，頁 98。

㉔《抗日篇》，頁98。盛清沂等著，《台灣史》，頁702。依據調查，1920 年底，在中國的台灣學生只有 1.9 人，1923 年則有 273 人（參閱《沿革誌》，頁 174）。

㉕ 1923 年 5 月，在日本駐中國南方領事第四次會議上，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提醒注意此一發展中的事件。連溫卿在其文章中曾提及此事（但未註明出處），〝台灣文化之特質〞，《台北文物》3 卷 2 期，1954 年 8 月，頁 129。

㉖羅有桂，〝台灣民族英雄人物：蔡惠如〞，台北，《大學雜誌》100 期，1976 年 9 月，頁 26。

㉗《沿革誌》，頁 68—69。

㉘《抗日篇》第六章，〝台胞在祖國之活動〞，頁 98—117。

㉙這是韓國共產主義者的第一個組織，被稱爲「上海派」。Cf. Suh Dac-Sook (trans. & ed.), Document of Korea Communism 1918—1948 (Princo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8.

㉚據日本當局的消息來源，1921 年 9 月由一名韓國共黨份子經手，俄國人供給彭與蔡 3,000 圓，（參閱《沿革誌》頁 584）。另一資料指出，在上海派韓共份子 Yi Tong-hwi 的收支帳目上，有一筆 11,000 圓的經費是付給台共及中共份子。Cf. 〝Item 7 :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Korean Communist Party〞, in : Suh Dac-Sook (ed.), ibid, p.40.

㉛《台灣民報》15 期，1924 年 1 月 1 日，頁 13。《抗日篇》，頁 100。

㉜《沿革誌》，頁 77—78、183。

㉝對於設置台灣議會的請願書，帝國議會後來審查過。每年提出請願書變成了一種儀式性的象徵活動。Cf. Kerr, p.129.

㉞《沿革誌》,頁 77。涞雲的兩篇文章：〝台灣議會より革命運動まで〞,見《平平》創刊號（《沿革誌》, 頁 79—80）；及〝再び台灣問題を談ず〞,見《平平》第二期（《沿革誌》, 頁 80—82）。

㉟《沿革誌》,頁 585。

㊱ Jacques Guillermaz,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t.1, Des origines à la République soviétique chinoise(1921—1934), nouvelle éd. rev. et augm.(Paris： Payot, coll. 〝Petite bibliothèque Payot〞, 1975）, p.90.

㊲王健民, 第一册, 頁 171。

㊳瞿秋白任社會系系主任, 參閱：司馬璐,《瞿秋白傳》(香港：自聯出版社, 1962), 頁 39。另參閱：瞿秋白〝多餘的話〞, 收入：同書, 頁 130。

㊴參閱：蔡孝乾,《江西蘇區·紅軍西竄記回憶》(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 1970), 頁 140。Edgar Snow,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ty Press, 1957), p.103. Helen Fost Snow(pseud, Nym Wales), The Chiness Communiste : Sketches and Autobiographies of the Old Guard(Wesport, Conn : Greenwood Publishing, 1972), Book II, Autobiographical Profiles and Biographical Sketches, p.325.

㊵王育德,《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歷史》(東京：弘文堂, 1964), 頁 126。黃師樵,《台灣共產黨秘史》(桃園：1933), 頁 16、 29, 以下簡稱《台共秘史》。

㊶《抗日篇》, 頁 103。《沿革誌》, 頁 86—87。

㊷依據日本資料來源, 林木順是中共黨員, 由中共推薦就讀於孫逸仙大學（參閱《沿革誌》, 頁 588)。但依據當時同在上海的張深切的說法, 當時正在徵求庚子賠款留學生, 台灣學生有人冒充中國籍去應徵, 李萬居等

人應留法分面的招生，而林木順、謝雪紅（謝阿女）等人要去參加留俄方面的學生組（參閱張深切，《里程碑》，第一册，頁157）。有證據顯示林與謝曾就讀於莫斯科的「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KUTV)，張國燾的太太就讀於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時，與謝雪紅同爲室友。參閱：楊子烈，頁155、156、161。

㊸《沿革誌》，頁588—589。

㊹蔡孝乾，頁160；《沿革誌》，頁87、588。

㊺《沿革誌》，同上。

㊻《抗日篇》頁98、99。《沿革誌》，頁876。

㊼《沿革誌》，同上。強深切，第一册，頁163。

㊽張深切，《我與我的思想》(台中：中央書局，1965)，頁210。《沿革誌》，頁876—877。

㊾《沿革誌》，頁882。《台灣民報》，188期，1927年12月25日，頁3；198期，1928年3月4日，頁3。范本梁(鐵牛)於1937年中日戰爭初期再度被捕，逝世於監獄中。張深切在其兩本著作中曾記載范的一生，參閱〝鐵牛傳〞，見《里程碑》，第一册，頁163—181；〝記范烈士本梁〞，見《我與我的思想》，頁201—208。

㊿《沿革誌》，頁119。《抗日篇》，頁109。

51参閱此一團體主要領導人之一張深切的著作，《廣東台灣獨立革命運動史略：在廣東發動的台灣革命史略》(台中：中央書局，1947)，頁9—10。

52送往台灣的《台灣先鋒》雜誌，印了兩千本以上，可以推斷這個團體在台灣的影響甚鉅。參閱：《沿革誌》，頁121、126—128；張深切，同上，頁17。

53《沿革誌》，頁122—123、135—137。張深切，同上，頁17、23—24。

54謝文達是台灣人第一位飛行員，北京台灣青年會的活躍份子。他對共產

主義感到興趣，與謝廉清經常保持密切關係。1923年3月，他在東京參與編輯《台灣民報》。參閱：《沿革誌》，頁183—184；《台灣民報》15期，1924年1月1日，頁16。

55 在台灣，世界語運動始於1913年，兒玉四郎在台北成立AEJ的一個分部。連溫卿和蘇璧輝在兒玉四郎之後負責領導這個組織。他們把這個分部改爲台灣世界語學會，並於1919年至1924年間出版月刊《綠蔭》，連溫卿担任總編輯。參閱：史可乘，〝日據時期台灣世界語運動〞，《台灣風物》17卷4期，1967年8月，頁53—58；〝人類之家：台灣世界語學會〞，《台北文物》3卷1期，1954年5月，頁91—93。另參閱：戴國煇，〝台灣抗日左派指導者連溫卿とその稿本〞，《史苑》（東京：立教大學，歷史學報）35卷2期，1975年3月，頁57—58。

56 1924年連溫卿到東京參加世界語大會時，住宿在山川均家中。連提供給山川均有關台灣情勢的資料，使得山川均得以在1926年撰成〝殖民政策下の台灣〞。參閱《山川均全集》（東京：勁草書房，1966），第七卷，頁258，編者對這篇文章的附註。另參閱：戴國煇，同上，頁58—59；及《沿革誌》，頁183。

57 連溫卿，同上，頁12—13。

58 黃師樵，〝蔣渭水及其政治運動〞，《台北文物》3卷1期，1954年5月，頁81。《沿革誌》，頁184。

59 《沿革誌》，頁185—186、882—883。黃師樵，同上。黃文雄〝台北青年會，讀書會、體育會〞，《台北文物》3卷2期，1954年8月，頁137。

60 《沿革誌》，頁187—188；黃師樵，同上；黃文雄，前引文，頁137—138。

61 《沿革誌》，頁183、884。

62 《沿革誌》，頁189、884。

63 《沿革誌》，頁189—190、886。《台灣民報》113期，1926年6月11日，

頁6－7。黃煌雄，《被壓迫的：台胞抗日史話》(台北：1977)，頁81—82。

64此信登於《台灣民報》116期，1926年8月1日，頁13。

65《沿革誌》，頁885、887。

66聯盟會員遭到逮捕之事，參閱：宮川次郎，《台灣の社會運動》，頁128—129；同一作者，《台灣の政治運動》，頁82—83。另參閱：《台灣民報》197期，1928年2月26日，頁5。

67蔡孝乾，"轉換期的文化運動(三)"，《台灣民報》144期，1927年2月13日，頁7。

68 1927年1月2日出版的《台灣民報》138期，登載了三篇代表三種不同觀點的文章：

(1)蔡培火，"我在文化運動所定的目標"，頁8—11。

(2)蔣渭水，"今年之口號：同胞須團結，團結眞有力，"頁11—12。

(3)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頁12—13。

69《台灣民報》，141期，1927年6月23日，頁5－8。

70陳逢源爲台灣民報記者及文協委員會之一員，宣揚以資本主義爲基礎重建中國的想法。1927年1月他辭去台灣民報的工作，進入有日本人參加的第一家台灣人金融公司「大東」。該公司一半的資本爲林獻堂、陳炘所有。參閱：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灣：抵抗と彈壓》(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頁282。許乃昌爲東京「台灣青年會」左派領導人，蔡孝乾爲文協幹部。許和蔡則主張以社會主義來重建中國。有關雙方的論戰，參閱下列登載於《台灣民報》中的文章：

(1)陳逢源（芳園）、"最近之感想：我的中國論"，《台灣民報》120期，1926年8月29日，頁8—10。

(2)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台灣民報》126期，1926年

10月10日，頁9—11；129期，1926年10月31日，頁9—11。

(3)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台灣民報》130期，1926年11月7日，頁11—12；131期，1926年11月14日，頁11—12；132期，1926年11月21日，頁10—11；133期，1926年11月28日，頁11—14；135期，1926年12月12日，頁8—9；136期，1926年12月19日，頁11；137期，1926年12月26日，頁11—12；139期，1927年1月7日，頁12—13。

(4)蔡孝乾，〝駁芳園君的中國改造論〞，《台灣民報》134期，1926年12月5日，頁10—13。

(5)許乃昌〝給陳逢源氏的公開狀〞，《台灣民報》142期，1927年1月30日，頁11—12；143期，1927年2月6日，頁11—14。

⑪連溫卿，〝1927年の台灣〞，見《沿革誌》，頁203—204。

⑫楊肇嘉，〝台灣新民報小史〞，見：楊肇嘉，第二册，頁425。

⑬蔡孝乾在〝轉換期的文化運動(二)〞認爲，最近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劇烈論戰，乃是台灣思想界轉換期的特徵。並導致了文化協會的改組；「有了思想界的轉換，才促成了文化協會的有意義的改組，同時有了文化協會的改組，才證明台灣思想的有意義的轉換」。參閱：《台灣民報》143期，1927年2月6日，頁11。

⑭黃煌雄，〝文化協會……〞，頁83。

⑮大會宣言最後標明台灣文化協會的任務，在於「促進實現大衆文化」，而提出下列主張（參閱《沿革誌》，頁206）：

1.組織農民工人。

2.團結小商人小資產家。

3.站在台灣民衆利益上的團體，都是我戰線上的朋友。

4.背離台灣民衆的利益，破壞共同戰線的團體，都認爲是台灣民衆的叛

賊，本會將極力剪除之。

5.統一戰鬪力，朝向正面的敵人進軍！

⑯二林事件發生於1925年，起因於台中州二林庄的蔗農與林本源製糖會社間因爲甘蔗收購價格不合理而引發糾紛。Cf. Wickberg, p.564.

⑰ Ibid.，pp.568—569.

⑱葉榮鐘等著，前揭書，頁530—531。謝春木，《台灣人の要求……》，頁36—37。

⑲這次大會參加者甚衆，有155位農民組合各支部的代表，以及約2000名與會者；這是台灣社會運動極可觀的一次聚會，也引起日本及朝鮮的注意。參閱《台灣民報》186期，1927年12月11日，頁3；《沿革誌》，頁1052。

⑳《沿革誌》，頁1054—1056；《台灣民報》186期，1927年12月11日，頁3。

㉑《台灣民報》189期，1928年1月1日，頁14；190期，1928年1月8日，頁13。

㉒有關讀書會，參閱《沿革誌》，頁578—588。宮川次郎，「台灣の政治運動」，頁83—85。

第三章
台灣共產黨的成立
(1928)

第一節　上海建黨大會
(1928年4月15日)

(一)　台共建黨時的環境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第三國際的指導下，日共於一次祕密大會中重新組織起來。但是，在會議籌備及開會期間，支持第三國際路線和支持福本主義的參加者之間產生了矛盾。換句話說，針對有關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構成要素的所謂「分離・結合論」的問題，雙方產生了爭論❶。

這次大會以後，中央委員會委員長佐野文夫和其他七位黨領袖，包括福本和夫、渡邊政之輔、德田球一等前往莫斯科，報告日共黨組織重建的經過，和接受有關解決日共黨的爭執的指示。當時莫斯科設有一個特別委員會，專門討論所謂的「日本問題」，然而第三國際的領導階層突然發生變化：季諾維也夫失去他的職務，托洛斯基也失去原有的權力，布哈林卻調升新職。

布哈林取得特別委員會的領導權具有顯著意義，他會見福本和夫、佐

野文夫、渡邊政之輔、鍋山貞親，幫助日共克服它內部的分歧，並選擇一個有效能的政綱和組織。經選定的綱領即衆所周知的〝七月綱領〞或〝一九二七年綱領〞，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採用，這代表第三國際針對日本情勢以及日共所擔負的角色，所做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分析。在這個綱領中明白指出「殖民地完全獨立」，並進一步規定，日共應對日本殖民地解放運動保持密切聯繫，並給予思想上、組織上的各種支援❷。

西元一九二七年年底，兩個台灣共產黨人——林木順和謝雪紅結束了在莫斯科的訓練課程，攜帶第三國際要他們發展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並應服從日共指導的指令，返回上海。他們與日共聯絡，同時也與中共黨員翁澤生取得聯繫，以瞭解台灣和上海的情勢。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日共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佐野學在東京會見渡邊政之輔，渡邊剛自莫斯科返回，向其報告第三國際命令日共組織台灣共產黨的決定❸，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林木順和謝雪紅應日共召集前往東京，渡邊和佐野學在瞭解台灣情勢後，着手撰寫〝政治大綱〞草案，渡邊同時並負責撰寫〝組織大綱〞草案❹。

謝和林同時列席日共中央委員會，接受下述指令：

1. 日共應該暫時組織「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
2. 日共正在準備第一次國會普選，不能專注台共的組黨工作，應該請中共代為指導❺。

謝及林接受了日共中央採行的〝政治大綱〞和〝組織大綱〞草案❻，在「東京社會科學研究部」積極分子陳來旺的陪同下❼，於一九二八年一月底返回上海。

(二) 建黨的準備工作

事實上，上海的局勢已不容許謝雪紅、林木順從事公開的活動❽。一九二五年底謝及林在蘇聯的時候，對中國的局勢以及台灣各種運動的發展沒有充分的認識，也不知道這些趨勢對中國及台灣有什麽關係。當時上海在「五・卅」事件過後，革命的情勢迅速地轉向白色恐怖時期；在台灣，由於文協的左傾、農運的發展以及一九二七年民衆黨的組成，抗日運動的內部也處於相互衝突的階段。

林和謝自東京返回上海後，即開始從兩方面着手組黨的行動。首先，他們開始挑選參加建黨大會的人員，並作爲黨的第一批成員；另一方面，他們想從兩個綱領草案中確定今後將依循的政治路線。在進行過程中，林及謝很尊重翁澤生有關選擇黨員以及開會代表的意見❾。

起初，由於是中共黨員的緣故，翁能和中共黨中央進行聯繫工作，並利用這些關係將上海讀書會的重要會員介紹給林及謝，這批人因此被考慮爲建黨的第一批成員。翁要求當時在台灣的林日高、洪朝宗、蔡孝乾以及在廈門的潘欽信，前來上海參加台共的組黨工作。蔡及洪無法離開台灣，最後林日高和潘欽信在二月初抵達上海❿。

爲了便於「綱領」草案的討論工作，翁澤生特地將謝自東京帶回的日文文稿譯成中文。隨後在三月初，謝、林及翁組成建黨籌備委員會，以便選擇應提出大會討論的綱領及各項決議草案，他們在提出大會討論前，對綱領草案⓫的內容做了部分修正⓬。

從那時起，在林的指導下他們開始起草有關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婦女運動、青年運動以及赤色救援會的計畫草案⓭。四月十三日在中共代表彭榮的建議下，召開「台灣共產主義者積極分子大會」作爲台共建黨的籌備會議，彭榮⓮、林木順、謝雪紅、翁澤生、陳來旺、林日高、潘欽信及

三位「上海台灣讀書會」積極分子張茂良、劉守鴻、楊金泉等十一人參加了這個會議⑮。

在會議中全體一致通過應提出成立大會言論的計畫草案，基於安全的理由，又決定參與黨成立大會的人員必須不同於籌備會議的人員，建黨日期並選定在籌備會議後的第三天——四月十五日⑯。

㈢ 台共建黨大會

西元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台共建黨大會在上海法國租界的一家照相館二樓舉行⑰，除了中共代表彭榮和朝鮮共黨代表呂運亨⑱外，參加者都是台灣人，包括謝雪紅、林木順、翁澤生、林日高、潘欽信、陳來旺、張茂良等人⑲。

首先由林木順致簡短的的開幕詞，他強調台共的成立對台灣的革命局勢具有顯著的意義；在他致詞後，謝雪紅當選爲會議主席⑳。

彭榮在致詞中分析「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無產階級運動，特別是分析了從國共聯合到分裂這個階段，最後他呼籲台灣「同志」應該警惕對資產階級的妥協，以避免中共曾經犯下的「機會主義」的大錯誤㉑。

在有關程序和實質問題的報告之後，大會審查並通過〝政治大綱〞、〝組織大綱〞和各項運動的方針，彭榮建議的幾點意見也被接受㉒。最後選出五位中央委員及兩位候補中央委員㉓：

委　員：林木順
　　　　林日高
　　　　莊春火（缺席）
　　　　洪朝宗（缺席）
　　　　蔡孝乾（缺席）

候補委員：翁澤生

謝雪紅

書　　記：林木順

建黨大會後，林木順、翁澤生、謝雪紅(翁與謝分別代表缺席的中委)在四月十八日召集第一次中委會議，選出中央常務委員並分派職務，他們決定由林木順再返東京，向日共中央委員會報告台共建黨的經過㉔。

兩天後——四月二十日，台共中委會四位成員重新集會，討論台共建黨宣言並草擬感謝中共協助的信函。四月二十二日陳來旺與林日高分別前往東京與台灣，開始進行他們的活動。台共建黨的有關文件也秘密地帶回台灣，交給未能參加建黨大會的中委蔡孝乾及洪朝宗兩人㉕。

在致中共的信函中，強調台灣人對中共的支持及指導台共建黨活動表示感謝，並希望未來能繼續獲得這種支持㉖。

第二節　黨的政治方針與主要決議

西元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這個階段，由於中國情勢的變化，可說是東南亞共黨運動重整和混亂的時期。在中國，國共合作的政策遭遇挫折後，第三國際的策略遇到很多困難。至於日本共產黨，在黨內以及與外部的關係面臨着同樣多的困難，它必須秘密地活動以重建黨的組織。以上這些都是台灣共產主義運動決定政治方針時，所必須面對的客觀環境。

(一) 黨的政治方針

台灣革命路線的基本特徵在台共文件中有清楚的說明，它涉及到台灣殖民地解放的策略，它並不是日本革命的一部分，也不是中國革於的一部分，我們可以說台灣的解放策略是自成一體的原創形式㉗。黨的〝組織大綱〞首先便指出：

「在相當期間內，台灣共產黨是以第三國際的支部日本共產黨之下的一個民族支部而組織成的，因此必須遵守日本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的指令。此即台灣共產黨將透過日本共產黨去履行它作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一支隊的任務。」㉘

因此，台灣共產黨依靠日本共產黨的協助，在第三國際的指揮下，組成日共的一個民族支部。

有關台灣革命策略的決定，完全基於台灣民族的發展理論。〝政治大綱〞的第一部分——台灣民族的發展——認爲台灣民族是由中國南部遷來台灣的漢人所形成的。從鄭成功統治到日本殖民地這段期間，他們逐漸形成了台灣民族㉙。台灣並沒有長久的獨立傳統，應該把台灣當做一個實體來考

慮它的解放問題[30]。台共揭示的目標是要創立一個獨立共和國，這是它與台灣其他政治派系不同的一個主要口號。

在台灣社會的分析方面，台共指出台灣不僅是一個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同時也是一個仍然保有許多封建殘餘的社會。因此，在本質上台灣革命是追求全島獨立的民族革命，同時也是民主革命，以消滅封建主義爲其目標。所以，這是一個包含社會革命可能性在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31]。

由於民族和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先決條件，因此「工農政府」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應於適當時機提出。從對台灣經濟和政治情勢的研究出發，台共將台灣人分爲九個社會階層：(1)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階級，(2)包括大地主在內的反動的資產階級，(3)進步的資產階級，(4)小資產階級，(5)大地土，(6)中地土，(7)自耕農，(8)貧農及農村工人，和(9)工人階級[32]。

在社會階層中最窮困的要算是占台灣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和貧農，他們因此構成革命的主力。當然，工人階級應該構成革命的先鋒。除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外，我們可以說其他社會階級都具有反日的革命特徵，雖然工農革命力量對進步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構成威脅的時候，彼此可能會妥協，但是後者仍應該歸併於反動陣營[33]。

然而基於實際的政治條件，工人階級作爲革命的先鋒部隊，應該在與資產階級建立聯合陣線的時候，仍舊掌握台灣解放的領導地位[34]。在我們所指出的台共政治方針這個基礎上，台共提出了十三項基本口號，這些口號和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提出的口號非常相近[35]：

1.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2.台灣人民獨立萬歲

3.建立台灣共和國

4.廢除壓制工農的惡法

5.勞動七小時——不勞動者不得食

6.爭取罷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

7.土地歸與貧農

8.打倒封建殘餘勢力

9.制定失業保險法

10.反對鎭壓日、鮮無產階級的惡法

11.擁護蘇維埃聯邦

12.擁護中國革命

13.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

㈡　黨的主要決議

除了〝政治大綱〞和〝組織大綱〞外，建黨大會還採納了幾項關於工農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以及國際問題、赤色救濟會運動的計畫。

1.工人運動

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間，台灣的工人運動處於初步探索階級，因此沒有穩固的基礎[36]。在文化協會發生分裂以及台灣民衆黨成立後，台灣的工人運動分爲兩個陣營：一派是文協領導的「左翼」工會，它受到「福本主義」的影響，陷於「宗派主義」的錯誤[37]；另一派是「右翼」工會，組成台灣工友總聯盟，在民衆黨的領導下選擇「改良主義」路線[38]。

台共專心致力於聯合所有的工會的原因，是因爲這個基本任務也關係着階級鬥爭，特別是工人階級聯合的問題。黨應該派遣工作同志進入左翼工會，建立黨的領導地位，以便儘速成立台灣總工會，作爲統一戰線的基

層組織。黨同時應該派遣工作同志進入「右翼工會」，揭穿他們領導者的面目，並進而掌握羣衆㊴。

爲了聯合工會組織，必須一方面重整原有的工會，一方面依照企業的分類原則創立新的工會，聯合台灣所有的工人階級團體，進而組織各個支部。這些支部除了確立黨的領導地位外，也能有利於黨員的徵募工作㊵。

2.農民運動

關於土地問題，台共強調兩個重點：

(1)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台共提倡在革命者之間要有服從和聯盟的關係。確立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而農民是它的同盟軍。

(2)民主革命的主要社會成分是農民革命的實現，也就是消滅封建勢力，解決土地問題。換句話說，在民主革命的階段中，應該將封建地主的土地充公並分配給農民㊶。

事實上，台共在〝政治大綱〞中指出，不只應該將充公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最後的目標應該是土地的國地化（土地應該屬於農民蘇維埃所有），這樣的作法不只可以完全廢除土地私有制，最後還可以達到土地社會化的目標㊷。目前提出「土地歸與農民」的口號，只是革命發展到一定階級必須有的做法；換句話說，當前台共要解決的農民問題，是屬於民主革命時代的農民問題，但同時應該爲下一個階段——蘇維埃政權的階段預作準備㊸。

農民運動在台灣農民組合的指導下逐步發展，對台共而言這是相當有利的條件，因此黨應該派遣它的幹部進入農組工作，並在農民運動中建立黨的領導地位，它同時應該建立黨的支部組織，並且在黨之中設立掌管農民組織的部門㊹。

3.青年運動

不管台灣的青年是什麼社會成分，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一點上面卻是一致的，儘管他們的革命意識水平各有不同㊺，黨應該在最短的期間內組成共產青年團，以領導台灣的青年運動㊻。青年運動最初的任務是鼓動工農青年，黨應該在工會和農民組合中建立青年支部的組織，就像黨在文協中的作法一樣，可以在鬥爭中召募和領導工農青年。

黨今後應該重整所有的青年組織，作法上可以分爲三個階段：

(1)擴大各地讀書會的組織，準備成立全島性的聯盟。

(2)重整「無產青年」的組織，並克服先前的錯誤，進而召集工農青年，使「無產青年」成爲一個眞正的青年大衆組織㊼。

(3)發展學生運動——特別是台灣的學生運動，準備成立一個聯盟組織，並擴大中國、日本和台灣各地青年運動之間的聯繫關係㊽。

4.婦女運動

由於封建傳統的關係，社會運動很少有婦女參與，但從一九二六年開始，婦女開始成立組織以改善本身的條件㊾。自從婦女運動有所發展以後，它與其他社會團體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與無產階級的關係，變得相當重要了㊿。

在這個前提下，台共決定將婦女運動的工作方針建立在——

(1)婦女運動的特徵和規律：作爲台灣解放運動一個重要部分的台灣婦女運動，應該支持工農羣衆。其實，台共將婦女運動併入民族解放的範疇內，不將其視爲純粹的婦女運動，是突顯了婦女問題的重要性。但事實上，只有經由民族解放路線，婦女才能獲得解放51。

(2)依照第三國際的理論52，婦女組織不應該是獨立的個體，相反地，

它應該拋棄獨立組織的所有形式。黨應該在各種民衆團體中建立婦女支部，諸如工農會組合與文協。這些支部應該建立在工農婦女羣衆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方針㊸。

(3)在台灣婦女運動的國際特徵方面，台共應加強台灣婦女運動和國際陣線之間的關係，並在加入第三國際後，特別著重與中國、日本、朝鮮各地婦女解放運動間的聯繫工作㊹。

(4)對於遭受傳統壓迫下的婦女的平等原則而言，台共應強調婦女應有的特別權利，以及目前仍爲法律禁止的婦女參加政黨的權利㊺。

5.赤色救援會

台灣的社會運動一天天地蓬勃發展，被日警壓制的參與者和積極分子也日益增加，因此，對於這些「犧牲者」的救援運動也一天一天的迫切起來㊻。

在〝赤色救援會組織提綱〞裡，台共將這個問題作了說明：

(1)赤色救援會具有雙重的角色——它是包括革命戰士在內的後備軍，應該反抗所有形式的壓迫，並對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庭提供物質援助；同時，作爲解放統一戰線一部分的赤色救援會，也是一個宣傳和煽動的組織㊼。

(2)赤色救援會的組織應該建立在工農大衆的基礎上，並在全島成立地方支部。假如赤色救援會不能進行公開的組織活動，台共應該給予秘密協助。假如文協和農組成立自己的救援會組織，而不願意組成一個更獨立的救援會形式時，黨應該成立一個黨團在其中執行黨的決策，並幫助他們的活動㊽。

(3)組織的經費來自會員的贈與、分攤及特別的捐助，會費的繳納則依各人的經濟情況而定㊾。

6.國際問題

對國際團結關係的重視，是台共建黨大會決策上的一個特點。事實上，〝政治大綱〞中卽已指出：

「我們必須藉由國際團結的口號，促使台灣無產階級去深刻認識國際問題。」60

在「黨的當前任務」中指出，應該聯合日本的無產階級運動、支持中國的革命、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並支持蘇聯。在有關社會運動的各項決議中，台共強調國際團結的意義，每個組織應該注意國際上相對組織的情形，使得共同的鬥爭工作達到世界水平。

此外，在一項討論到國際問題的特別提綱中，台共指出目前所有運動沒有關注國際問題的錯誤趨勢，這個趨勢造成運動的孤立現象61。因此，黨決定推動負責日常鬥爭的各個系統組織，使工農大衆都能掌握國際相互支援的意識，藉着各種不同的國際性紀念節日來擴展黨的影響力。

第三節 黨的組織與成分

(一) 組織

台共作爲日共的支部，它應該像〝組織大綱〞中的說明一樣，遵循日共的領導。換句話說，它透過日共的協助與第三國際保持聯繫，遂行它作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一部分的任務[62]。

台共的組織體制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上，更確實地說——建立在每一個工廠組成的支部組織上[63]。黨員大會構成黨的最高機關，其下是黨員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則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組成[64]。中央委員會領導黨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所有的活動。中央委員會設立組織、宣傳和煽動各部以及工會委員會；並設立三個特別委員會處理農民政策、婦女運動和青年運動；另外還有一個書記處[65]。事實上，所有的措施僅止於書面文字而已，因爲建黨大會三天後，有關它們的實施問題即出現分歧意見，即使負責人的職務分配問題也有爭執。

〝組織大綱〞強調工廠支部的組織[66]，這點堅持與黨的構想十分吻合。支部是工人階級解放的唯一武器，也是台灣革命的主導力量[67]。每個工廠應該部署爲黨的一個基地，但是地方支部也可例外地建立起來，以幫助黨的壯大[68]。

第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中，決定了職務分配與內部的組織體系[69]：

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林木順
林日高
蔡孝乾

中央委員的職務分配：書記長——林木順
組織部負責人——林木順

農民運動部負責人——洪朝宗

青年運動部負責人——莊春火

宣傳煽動部負責人——蔡孝乾

婦女部負責人——林日高

東京特別支部負責人——陳來旺

東京與日共聯絡人——謝雪紅(候補中委)

上海與中共聯絡人——翁澤生(候補中委)

會中同時決定林木順、林日高、潘欽信和謝玉葉等四人應該返回台灣工作⑰。

這種安排有三點值得注意：

1. 首先，黨的成立表示在國外發展共產主義運動階段的終止，黨的中央機構將移到台灣，爲的是能在台灣發展，中央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包括三位缺席中委：蔡孝乾、洪朝宗、莊春火）決定返回台灣秘密展開活動。這些作法清楚地顯示，新建的黨優先選擇在台灣展開具體活動，並將台灣當作共黨運動的核心。
2. 這種象徵性的分配，說明黨的成立是依循第三國際的決策，因此黨也成爲國際共黨運動的一部分。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間，儘管台灣民族運動內左翼有所進展，但島內左派對於由上而來的建黨決定反應冷淡，台共因此決定進一步加強與左翼力量的聯繫工作，這樣做可以在左翼分子中徵募黨員，作爲黨的基層人員。這就是爲什麼謝雪紅和翁澤生長久爲建黨工作奔走，却只獲選爲候補中委的原因。這種決定和台灣的情勢很有關係。
3. 最後，對於負責和日共、中共聯繫人選的選擇，也顯示新的黨組織體認到和中共、日共聯繫的重要性。從準備工作到建黨工作的完成，日共、中共的幫助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爲了黨的未來發展，必須

和國際共黨連絡，加強並且維繫與日共、中共的關係也就不可免了。這也是爲什麼在台共建黨後，日共和中共對台共的演變具有決定影響力的原因。

接著我們檢視台共建黨後黨內力量的關係，在中央委員會五位中委當中，洪朝宗、蔡孝乾、翁澤生三人曾經在上海大學就讀，翁澤生和蔡孝乾並且是瞿秋白的學生，洪朝宗彷彿也是㉑。翁澤生及洪朝宗在廈門就讀的時候，曾經在一九二四年四月組成一個台灣讀書會組織，林日高一九二五年在廈門海員工會工作的時候，他已經是中共的黨員了㉒。莊春火曾在一九二五年年初返廈門，就讀於集美中學㉓。這些人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事件前都已經是中共或其外圍組織的一分子，或者和翁澤生有過接觸㉔，中央委員會成員中，除了林木順外都與翁澤生有私人關係，潘欽信是四位應該返台工作的委員之一，當時也曾就讀於上海大學附屬中學㉕，謝玉葉則是翁的太太㉖。

整體而言，從建黨開始黨內卽存在着兩個對立的陣營：一派是圍繞在翁澤生旁邊的多數派；另一派由謝雪紅和林木順代表，包括來自東京的陳來旺，爲日共指定的領導人。由於人事上的對立，使得組織上的配置不可能實現。和中共有密切關係的黨員與受日共影響的黨員間似乎存在着一種敵對局面，這種敵對局面隨着台共的發展，一天天地明朗起來。

㈡　黨的成分

台共是一個負有解放無產階級任務的無產階級政黨，但是，正如其創始人之一謝雪紅所指出的一樣，台共黨員中並無一人是無產階級㉗。

這種現象對台共這個新黨而言並不是什麼值得驚異的事，事實上，中共和日共也同樣地具有這種特徵。參加「台共積極分子大會」和「台共建

黨大會」的成員都是從日本、中國和台灣來的台灣知識分子，包括三位缺席獲選的中委也是這種情形。總體而言，他們最低限度都受過中等教育，而黨中央機構的成員洪朝宗、林木順、翁澤生、蔡孝乾、謝雪紅、陳來旺都在國外受過高等教育。從一開始，台共卽建立在知識分子的基礎上，受到知識分子的領導。我們可以這麼說，這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共同特徵[78]。

〝政治大綱〞明白指出，知識分子負有鼓動工農的任務，以建立黨的堅實基礎：

「台灣共產黨的當前急務，即在於把散佈在台灣各地參與實際運動的共產主義者，迅速地糾集起來，以這些革命的先進知識分子作中心，着手從事組織的準備。在準備會議之後，努力吸收戰鬥的工人和農民爲黨員；然後，才能以工人階級和貧農爲基礎，建立嚴密堅固的共產黨。」[79]

這種意圖和工農聯合的策略是相稱的，工農應該構成革命的主力。然而，從台共誕生開始，即預見到知識分子的「機會主義」和「妥協」的可能性。中共代表彭榮曾經建議刪改〝政治大綱〞中的某些字句，譬如以「先進分子」取代「前衛的革命知識分子」[80]，這表示對知識分子有保留的態度。不管怎樣，一九二八年年底台共終於在台灣建立黨中央機關，並在左翼運動中逐漸擴展影響力。然而，文協和工農組織中的黨支部仍舊由知識分子所領導，只有在一九三一年「改革同盟」成立的時候，他們才嘗試改變這種狀態[81]。

大體看來，直到台共毀滅的時候，知識分子仍舊在黨中占着重要的比例，領導台共的始終是知識分子。一九三一年遭受日警逮捕並移送檢察處的七十九名人犯中，有四十九名是台共黨員，他們後來被移送至初審庭審判；假如我們將四十九位被提審者的教育程度（表二）與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只占三分之一的台灣兒童入學率比較[82]，我們可以發現台共黨員都

曾入學就讀，他們中的多數人分別受過初等和中等教育。

表二 台共黨員教育程度表

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高等	4	8.16
中等	17	34.69
初級	27	55.10
文盲	1	2.04
總計	49	100.00

註：平均年齡：26.5 歲

資料來源：根據黃師樵著「台灣共產黨秘史」，

頁 22、23 作成。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局長友部元也確認了這些數據的正確性。台共的情形跟日共的情形正好一樣。至於職業方面，百分之五十二的黨員屬於無業者，然而從某方面來看，他們都是「職業革命家」[83]。

—— 第三章註解 ——

❶ Xenia J. Eudin et Robert E.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1927 (Stanford, Cal.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77.

❷ Ibid., pp.277—278. 關於〝一九二七年綱領〞全文，參閱〝Annexe D〞, in: George M. Beckmann et Okubo Genji,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22—1945 (Stanford, Cal.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pp.295—308.

❸關於佐野學1929年被捕時在審訊中有關台共問題的答覆，參閱〝佐野學予審訊問調書，第八回〞，見：山邊健太郎編，「現代史資料」第20輯，《社會主義運動Ⅶ》(東京：みすず書房，1968)，頁236。在此審訊中，佐野學解釋說，1928年7月他代表日共參加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時，在所看到的第三國際日共關係文獻中，並沒有發現有關台共建黨的資料。由他的話可以得知，台共的成立，由第三國際看來是非正式的決定。參閱若林正丈，〝台灣革命とコミンラル：台灣共產黨の結成と再組織〞，《思想》610期（東京，1975年4月），頁133。

❹〝佐野學予審訊問調書，第八回〞，同上。

❺《沿革誌》，頁589。

❻根據謝雪紅的說法，是她本人直接與渡邊連繫，接受〝政治大綱〞及〝組織大綱〞。參閱《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11月10日，頁7。

❼《沿革誌》，頁589。

❽若林正丈，頁134—135。

❾翁那時是中共黨員，負責接待國共分裂後由廣東逃到上海的台灣左派份

子。參閱《沿革誌》，頁588、662。他同時又是文協發行的《台灣大衆時報》派在上海的記者，經常與台灣左派的組織保持連擊。

⑩《沿革誌》，頁589。

⑪綱領的部份修正見於山邊健太郎的「解說」之中，參閱《台灣II》，頁21—26。

⑫政治大綱及組織大綱登載於《沿革誌》（頁595—613)，以及附錄於「台灣共產黨檢舉の概要」（見《台灣II》，頁256—273）之中的台共政治大綱及組織大綱，係日本治安當局由中文原稿譯爲日文。雖然在〝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記錄〞中提到，中共代表建議對大綱做若干的修正，但是我們並沒有發現修正的記錄（參閱《台灣II》，頁252—253)。因此可以推定，《沿革誌》及《台共檢舉概要》中所收錄的大綱就是爲建黨大會準備的草案全文，並且爲大會所通過採納。至於彭榮的評論與建議，沒有多大意義，所以未做任何修正。以下我們便以大綱作爲分析的基礎。

⑬《沿革誌》，頁589—590。

⑭在他的著作《日本統治下の台灣：抵抗と鎮壓》(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中，許世楷認爲彭榮其實就是彭湃，亦即發起海陸豐公社的、中共農民運動中著名的領導人（參閱頁328)。但研究的結果無法證實彭榮與彭湃爲同一人，Moriyama Akio 特別反對此種說法。Cf. Moriyama Akio,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ttitude toward Formosa：from 'Independence of Formosa' to 'Liberation of Formosa'〞, Mitaka, Tokyo: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12）, mai 1974, p.130, note 12.

⑮《沿革誌》頁589—590。

⑯同上，頁590。

⑰這家照相館位於上海法國租界內，羅勃神父街(rue du Père Robert)及

霞飛路(avenue Joffre)的交叉口。

⑱呂運亨是上海朝鮮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長」,曾參加1920年在巴庫舉行的第一屆東方人民大會。參閱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社,1971),第一册,頁182。自1920年起,呂運亨在上海與台灣派來的民族主義者如蔡惠如、彭華英等均有連繫,並和台灣人合作成立《平社》,宣揚共產主義(《沿革誌》,頁68、77)。

⑲《沿革誌》,頁590。在七個台灣人之中,謝雪紅、林木順和翁澤生是籌備委員會委員(《沿革誌》,頁589);林日高、潘欽信、陳來旺、張茂良,可以視爲台灣、厦門、東京、上海的積極份子的代表(參閱若林正丈,前引文,頁136)。來自台中的張茂良,是1927年3月成立於廣東、後來被中國國民黨當局及日警所破壞的「台灣革命青年會」刼後餘生的會員之一。參閱〝台灣共產黨事件全貌〞,《台灣日日新報》,號外,1933年7月24日,頁2。以下簡稱爲《台共事件》。另參閱:張深切,《廣東台灣……》,頁24。

⑳《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11月10日,頁7。根據《沿革誌》的記載,主席是林木順(參閱頁590—591)。然而在〝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記錄〞中,被選爲主席的是一個姓吳的人。依照作者的推斷,這個姓吳的應該就是謝雪紅。

㉑〝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記錄〞,收入:「台灣II」,頁246—251。

㉒有關大綱的評論與修改是彭榮所提出的。但有關二人運動的計畫則由彭榮擬定(同前註,頁252—253)。

㉓《沿革誌》,頁592。

㉔同上,頁657—658。

㉕同上,頁658。

㉖參見《沿革誌》,頁661,〝中國共產黨中央に致せる信〞。

㉗若林正文，頁 139。

㉘參閱〝組織大綱〞，見：《沿革誌》，頁 595；及《台灣II》，頁 256。

㉙參閱附錄一，〝一九二八年台共政治大綱〞。

㉚同上。

㉛同上。

㉜同上。

㉝同上。

㉞同上。

㉟參閱前註。台共提出的十三個口號，為：

1.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2.台灣人民獨立萬歲

3.建立台灣共和國

4.廢除壓制工農的惡法

5.勞動七小時——不勞動者不得食

6.爭取罷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

7.土地歸與貧農

8.打倒封建殘除勢力

9.制定失業保險法

10.反對壓迫日、鮮無產階級的惡法

11.擁護蘇維埃聯邦

12.擁護中國革命

13.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

1927 年 7 月 15 日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通過〝關於日本的綱領〞（即〝一九二七年綱領〞）其中有十三項規定，是日本共產黨奮鬥的目標：

1.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而戰！
2.反對介入中國革命！
3.擁護蘇維埃聯邦！
4.殖民地完全獨立！
5.解散國會！
6.廢除君主制度！
7.十八歲有普選權！
8.爭取集會、結社權！爭取言論、出版自由！
9.八小時勞動制！
10.失業保險！
11.廢除壓制勞工的惡法！
12.沒收天皇、地主、國家及寺廟等的財產！
13.建立累進稅制度！

Cf. Beckmann & Okubo, p.308.

㊱參閱：(蔣渭水)，〝黎明期台灣勞動運動〞，《台灣民報》152期，1927年4月10日，頁2。

㊲參閱《沿革誌》，頁222—223；及葉榮鐘等，《台灣民族運動史》，頁351—352。

㊳〝勞動運動對策提綱〞，見《沿革誌》，頁614。

㊴同上，頁620—621。

㊵同上，頁617、622—623。

㊶參閱〝農民問題の重要性〞，見《沿革誌》，頁623。

㊷參閱：附錄一，〝一九二八年台共政治大綱〞。

㊸根據第三國際有關農民問題的基本原則及指導原則，台共在〝農民問題的重要性〞中，指出三方面的指導意見：

(1)民主革命的農業問題；

(2)無產階級革命的農業問題；

(3)蘇維埃政權時期的農業問題。

參閱《沿革誌》，頁 623。

㊹同前註。

㊺〝青年運動提綱〞，見《沿革誌》，頁 635—636。

㊻同前註，頁 637—638。

㊼〝青年運動提綱〞指出「無產青年」犯了下列四項錯誤：(1)沒有明確要求青年的權利；(2)農工青年極少介入；(3)和「共產主義青年」有所混淆；(4)無產青年沒有組織。參閱《沿革誌》，頁 640。

㊽《沿革誌》，頁 640—643。

㊾參閱 1926 年 8 月 8 日《台灣民報》117 期社論，〝台灣婦女解放運動的失聲〞，文中號召全島婦女組織起來。

㊿參見玉鵑，〝婦女運動的促進與婦女部的設立〞，載於《台灣民報》38 期，1927 年 1 月 2 日，頁 15—17；及張丹澄，〝女運動的認識〞，《台灣民報》145 期，1927 年 2 月 20 日，頁 9—11。

51台共的〝婦女問題議決案〞，參見：《沿革誌》，頁 647。

52《沿革誌》，同上；鄭學稼，《第三國際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第三册，頁 1235。

53〝婦女問題議決案〞，參見：《沿革誌》，頁 647—648。

54同上，頁 649。

55由於〝治安警察法〞明文禁止婦女參加政治組織(第五條)，台共特別針對這一點，在〝婦女問題議決案〞中提出一項口號，主張「婦女有參加政黨的自由」(《沿革誌》，頁 649)。參閱〝社會運動關係諸法規〞，見：台灣民衆黨宣傳部，《台灣民衆黨特刊》，第一册(台北：1930)，頁 122。

❺❻參閱水藻，〝我們的一個提議：請合力組織爲台灣犧牲的人們之救濟機構〞，《台灣民報》16期，1926年8月1日，頁12—13，台灣農民組合中央委員會於1927年4月5日決議，對受難同志提供救濟和援助，見：《台灣民報》154期，1927年4月24日，頁6。

❺❼台共的〝赤色救濟會組織提綱〞，見《沿革誌》，頁650—652。另參閱台共的〝組織大綱〞，見：同書，頁599。

❺❽同上，頁650—651、654—655。

❺❾同上。

❻⓿參閱：附錄一，〝一九二八年台共政治大綱〞。

❻❶〝國際問題提綱〞，見《沿革誌》，頁655。

❻❷〝台共組織大綱〞，見《台灣II》，頁256。

❻❸同上，頁257—258。

❻❹同上，頁260。在組織大綱中也指出，大會召開前，每一部門的成員必須對日共中央委員所成立的中央領導組織負責。我們可以斷言，林木順和謝阿女是台共主要領導機關的成員。

❻❺同上。

❻❻參閱〝台共組織大綱〞中「黨的基礎：支部與建設」，見：《台灣II》，頁258—260。

❻❼參閱：〝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宣言〞，見《台灣II》，頁253。

❻❽〝台共組織大綱〞見：《台灣II》，頁259—260；《沿革誌》，頁599—600。

❻❾同上。

❼⓿同上。

❼❶根據《沿革誌》，洪並未在上海大學唸書（《沿革誌》，頁213）。

❼❷《台共秘史》，頁36—37。

❼❸同上，頁56。

⑭蔡孝乾於1925年加入「中國國共產黨青年團」，參閱 H. F. Snow，Book II，p.325.

⑮《台共秘史》，頁34。

⑯《沿革誌》，頁662。

⑰參閱〝謝氏阿女預審庭に於ける供述要旨〞(《沿革誌》，頁683)。林木順於建黨大會中曾提及沒有工農份子參加建黨。參閱〝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記錄〞，見《台灣II》，頁252。

⑱參閱：葉榮鐘等，〝凡例〞。Edward I-te Chen，〝Formosa Political Movements……〞，p.4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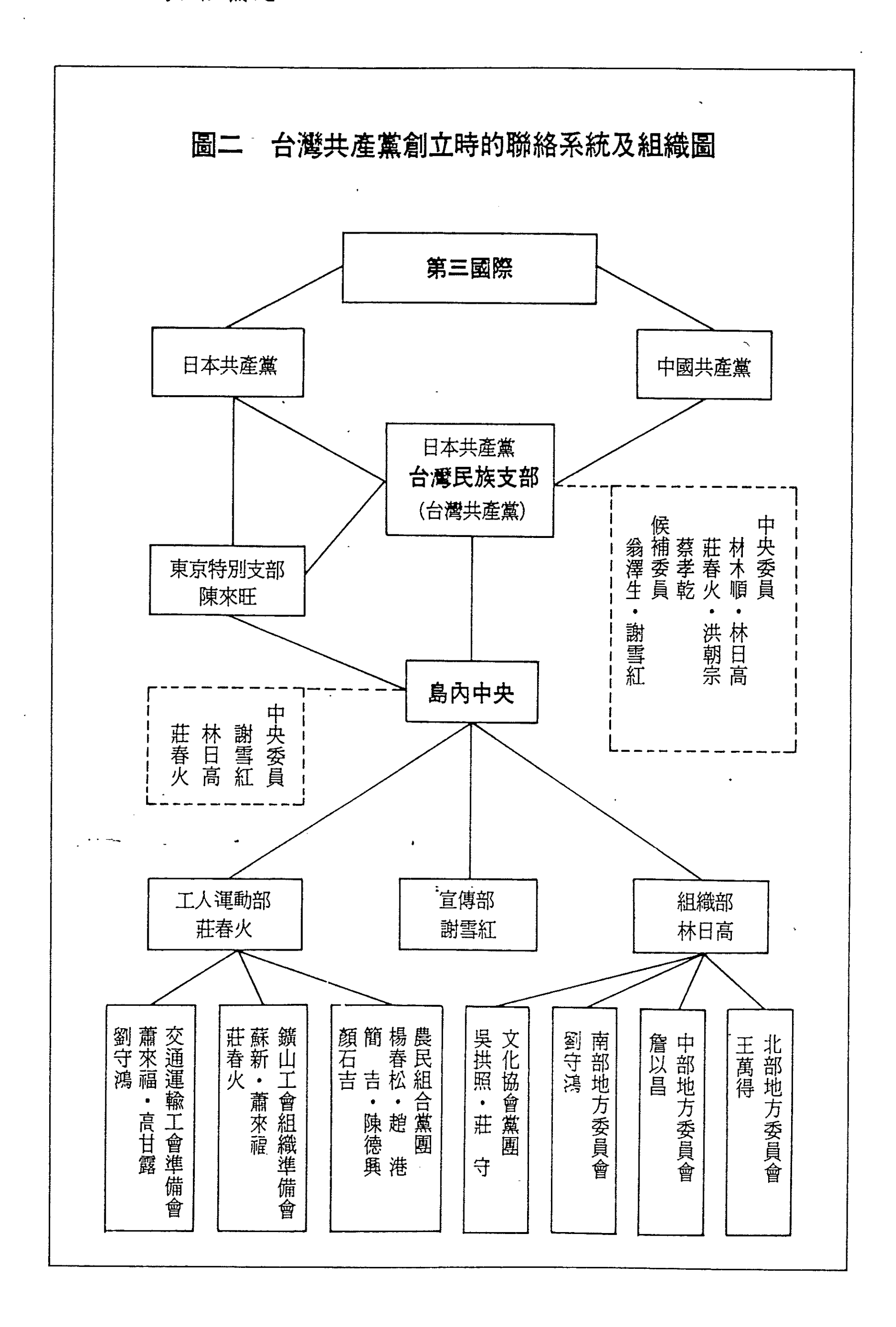
⑲附錄一，〝一九二八年台共政治大綱〞。

⑳〝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記錄〞，見《台灣II》，頁251。

㉑《沿革誌》，頁753。

㉒台灣就學兒童1917年佔13.1%，1922年佔29.2%，1927年佔29.7%，1932年佔35.97%。參閱「歷年學齡兒童——本地人」表，見陳正祥、段紀憲合著，《台灣之人口》(台北：台灣銀行，1951)，頁121。

㉓參閱〝台灣共產黨事件に關する友部警務局長聲明〞，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別編：詔勅、令旨、諭告、訓達類纂》(台北：1941)，頁644—645。以下簡稱：《沿革誌別編》(附錄)。另參閱〝關係官吏感想談〞，見《台共秘史》，頁67—68。



圖二　台灣共產黨創立時的聯絡系統及組織圖

第二篇

台灣共產黨的演變與毀滅

(1928～1932)



第四章
第一次破壞與黨的重建
(1928~1930)

對所有在日本控制地區下的共黨而言，一九二八年是悲慘的一年❶。

日本當局對日本本土及其殖民地共產主義運動的注意，使得共黨的領袖日趨謹慎。事實上，經過「三一五事件」後，日共遭遇了嚴重損失，但上海的日警並沒有鬆弛對台共的監視，他們多次大逮捕的行動使得新成立的台共受到慘重的打擊。

第一節　台灣共產黨第一次被破壞
(1928年4月)

(一)　上海台灣讀書會事件

正當台共建黨準備期間，林大順、翁澤生、謝雪紅三人糾集上海台灣學生會左翼學生，組織了一個研究社會科學的讀書會，這個讀書會的主要成員包括江水得、楊金泉、林松水、劉守鴻、張茂良、陳粗皮、陳美玉、和黃和氣等人，他們致力於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同時也從事政治活動。

他們和中共黨員也保持聯繫，尤其特殊的是，他們還與朝鮮共黨份子組成聯合戰線，這些活動引起上海日本領事館的注意❷。

在朝鮮人慶祝「三一革命運動」週年時，張茂良與許多讀書會分子參加了紀念會活動，並發表聲援文。日本人因此得悉台灣人的秘密活動，他們也獲得情報，知道林木順要成立一個秘密團體，這使得日本人決定採取逮捕行動，以瞭解事情的眞相❸。

上海是一個國際性都市，當時在各種不同的勢力控制之下，但代表這些勢力的不同國家間有某種協調，以維持公共秩序。這種協調使得日本人能在不同的處所完成三次成功的行動，第一次是三月十二日發生在不屬於共同租界的閘北，由於中國治安當局的協助，日本人逮捕了黃和氣、江水得、陳美玉。第二次行動是三月三十一日，在共同租界逮捕了陳粗皮。最後一次發生在台共建黨大會後十天，張茂良、楊金泉、林松水、劉守鴻、謝雪紅等人在法國租界被日警逮捕。

這個時候台共所有的重要文件都已被查扣❹，儘管缺乏實質和正式的證據，我們相信這同時發生在日本和日本之外的逮捕行動，必然互有關聯❺。在被逮捕的九個人當中，陳美玉被判斷與這件事無關後獲釋，其餘八人被解送回台灣接受偵訊❻。

在審訊期間，黃和氣和謝雪紅以證據不足獲釋❼，一九二九年四月三十日，其餘六人以組織秘密團體，「目的在要否認日本在台灣的統治權，及廢止一切的私有財產制度，以建設共產社會」❽等罪名，違反治安維持法而提起公訴。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高等法院判決楊金泉、張茂良二人兩年徒刑，其餘四位分別判處兩年徒刑，緩刑四年❾。

㈡ 黨員的逃亡和日本人控制的強化

震撼台灣政壇的上海台共事件告一段落之後，因爲主要人物林木順、翁澤生、謝玉葉（翁妻）仍然在逃❿，日本當局繼續監視，並且保持警戒。當時，謝雪紅這名台共的主要組織者已經落在日本當局手裏，但是他們並未發現她在組織中的重要性，同時她的智慧也足以應付審訊的人，這就是爲什麼日本當局在逮捕行動後，認爲他並未接觸到台共核心的原因⓫。

無論如何，在幼年期的台共這次受到嚴重打擊，損失了幾位預定的幹部，這也解釋了爲什麼建黨大會採用的計畫不能遵行或要加以修正的原因。林日高參加建黨大會後由上海返台，五月十五日會見了三位缺席獲選的委員莊春火、洪朝宗以及蔡孝乾，告訴他們台共成立的經過以及黨所採用的政策。

上海讀書會事件後，由於感覺危機日增，他們決定暫時停止活動以等待機會⓬。建黨大會後由上海返台的潘欽信、謝玉葉二人偕同蔡孝乾、洪朝宗，於一九二八年八月底秘密搭船離台，前往福建。蔡孝乾逗留在漳州和厦門一帶繼續推展活動，並與上海方面保持聯繫，直到一九三二年他進入「江西蘇區」⓭爲止。潘欽信也一直留在厦門，一九三〇年他返回上海並遇見翁澤生⓮。蔡孝乾和三位同伴逃亡中國大陸的行動，據蔡孝乾的解釋是爲了避免黨在台灣完全被毁滅⓯。

基於日本政府控制力加強的觀點，蔡孝乾爲黨的生存而逃亡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但是這項逃亡的決定正好指出，建立在知識分子上的台共組織先天的脆弱性，誠如首批黨員陳來旺的說法：

「……由知識分子指導的黨，一個百分之百由知識分子組成的黨，在白色恐怖的襲擊下，就會引起機會主義的動搖，……一聽到檢舉，就協議逃亡，競相放棄工作並逃往日本和中國。一受到壓制，知識分子的動搖性

機會主義就在光天化日下暴露無遺；由此事實證明，由知識分子構成的黨是如何的無力！」⑯

逃亡在中國的黨員是應該回台灣工作的，而突然回台的謝雪紅却應該留在島外以保持與日本方面的聯繫，這個組織上的變動台共並未事先安排。這種事實狀況以及隨後蔡孝乾等四名黨員的行動，開啓了一個新的局面，但也引發了內部的鬥爭。

在逮捕共黨分子之後，日本政府在其本土及國外都加強了治安上的措施，以強化對各種左翼運動的控制。治安維持法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改後，加入死刑的處罰⑰，這個法律早在一九二五年便已施行於台灣⑱。一九二八年七月，東京警視廳擴充特別高等警察爲全國性的組織，由內務省集中管理，以便監視各地的社會運動。

成千的特務人員因此被派往本國各地區工作，並與各地區地方警察密切地合作，他們的情報都送往內務省處理。台灣和朝鮮的民族運動同樣地被稱職的官員監視著，上海、倫敦、海參崴等國際都市都在這些官員的監視下，特別受到注意的是顚覆運動和煽動分子⑲。

基於同一理由，台灣總督府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建立一個特別高等警察體系，從台灣總督府到地方行政各個階層，這些特高警察負責監控所有的左翼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台灣和其他地方的航運交通也因此加強了⑳。這些作法後來成爲渡邊政之輔在台灣死亡的起因，後文將會討論到。

第二節　東京特別支部的成立與破壞
（1928年9月～1929年4月）

(一) 特別支部的成立

台共在上海建黨時，曾經做出成立東京特別支部的決定，這個事實一方面反映出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在日本的發展，另一方面表示台共想強化日共對台共的指導。因此，特別支部的成立在於加速共產主義運動，並擴大對台灣人的影響力，同時，借助特別支部在經濟、政治、社會方面的特別關係，可以從日本本土開始向台灣滲透共產主義的勢力，以完成殖民地獲得解放的「國際任務」。

陳來旺前往上海參加台共建黨大會後，「東京台灣青年會」下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左翼台灣學生組織——由於受到日共「三一五事件」的影響，改變名稱爲「台灣學術研究會」，並暫時停止活動。四月二十三日陳來旺返回東京以後，携回建立台共支部的任務。儘管當時形勢已經變化，他仍然和原有同志聯繫，並爲東京的台灣共產黨運動進行組織上的籌備工作㉑。

一九二八年八月，逃避上海四月逮捕事件的台共書記林木順抵達東京，他帶來日共中央委員會有關台共建黨和隨即被破壞的報告。在東京他與陳來旺碰頭，雙方交換了對局勢的看法，並決定建立東京支部應採取的步驟，陳來旺推薦兩位台灣學術研究會的積極分子林兌及林添進入黨㉒。

九月二十三日晚間，陳來旺、林木順、林克及林添進四個人聚在一塊籌備東京特別支部，由陳來旺負責。在會議中，他們決定了兩項任務㉓：

1. 在「台灣學術研究會」和「東京台灣青年會」建立黨的指導地位，以便吸收台灣學生爲黨員。
2. 建立與日共以及台灣黨組織之間的聯繫關係。

林木順是由黨派定回台的黨員，因爲安全的理由放棄了回台的計畫，十月底他回到上海，重新加入翁澤生組織上海台灣人的行動行列㉔。

在重整後的日共指導下，台共東京特別支部的活動日趨積極㉕。一九二八年年底以前，在陳來旺的擬議下，學術研究會內的委員會成員於東京文化協會下的《台灣大衆時報》社址集會三次㉖，這些成員包括林兌、蕭來福、黃宗垚、何火炎、陳銓生、林裳、蘇新和陳來旺，他們討論了組織的指導路線和活動內容，其中重要決定如下㉗：

1. 以學校爲單位，組織台灣人。
2. 改革東京台灣青年會，使它在東京特別支部指導下成爲一個大衆團體。
3. 出版一份報紙。
4. 組織一個台灣人聯盟，支持《無產者新聞》。
5. 組織一個支援委員會，以援救從事台灣解放運動的受難者。
6. 對即將在一九二八年年底召開的台灣農民組合大會發表聲援書。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陳來旺、何火炎、蘇新、蕭來福、林兌、林添進、李清標、林加才、黃宗垚等人舉行支部會議，他們將七個地方小組重組爲十個學校小組並分配各人的任務。他們決定加強徵募黨員以及銷售《無產者新聞》的工作。在特別支部的領導下，學術研究會的活動有所進展，青年會的左傾會員也逐步被吸收。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青年會的一次聚會中，在「學術研究會」會員的領導下大會通過改革青年會的決議，並決定成立「日本台灣學生會」，當日選出的委員會成員幾乎全是研究會的會員。青年會在特別支部的指導下改組，成爲東京台灣人的左翼組織㉘。

(二) 特別支部被破壞

自從特別支部在學術研究會和青年會中建立領導地位後，支部藉這兩個組織擴展自己的活動，並與台灣的左翼組織建立密切的聯繫。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底，林兌被支部派往台灣，攜帶支部的指示和林木順準備的〝農民問題對策〞㉙。一九二八年夏天，林兌趁著假期返台，和農民組合領導人之一的簡吉聯繫，並和當時在台灣著手重建黨中央的謝雪紅取得聯絡。他們共同指導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大會，這次大會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底舉行，結果強化了台共對台灣農民運動的影響力。林兌拒絕出任農民組合中央委員會書記的職務，並於一九二九年一月返回東京㉚。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日本當局開始逮捕台灣農民組合的幹部，農民遭受了慘重損失，東京特別支部派遣學術研究會的主力分子返台，以協助農民組合的再建運動。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事件前夕，日共組織的領導人間庭末吉被捕，從他身上搜獲的日共黨員名單給日警提供了相當多的情報，並據以發動一九二七年以來的第二次大逮捕行動㉛。在這份名單中有三位台灣人，爲了知道這三位台灣人的名字，東京警察逮捕了四十三名台灣學術研究會的主要會員，因爲這個組織早被視爲左翼台灣人的組織。在偵訊中發現了陳來旺、林兌、林添進的日共黨員身份而加以逮捕，其餘人則以證據不足獲釋，但仍遭日警嚴密監視。

特別支部於存在了六個月之後，遽然被破壞而告消失，但是在逮捕行動前返台的蘇新、蕭來福、林朝宗以及逮捕行動後返台的莊守，繼續在後來的共產主義運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些學術研究會的成員嘗試重整會務，在這些嘗試證明無效後，這批旅居東京的左翼台灣人一個個轉向日本左翼文人的文藝活動中去了㉜。

第三節　黨中央在台灣成立
(1928年11月)

上海台灣讀書會事件對台共而言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但是謝雪紅獲得釋放，却開啓了台共一個新的局面。

(一) 恢復活動並與日共聯繫

謝雪紅自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獲釋後即返回台中家鄉。從一九一四年台中人士爭取設立台中中學開始，這個城市已經成爲民族主義運動的中心。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分別將其大本營自台北和台南移至台中，使得台中成爲台灣最重要的社會運動中心。

謝雪紅並不瞭解被破壞後黨的實際狀況，儘管如此，她決定繼續進行她的活動，在她返回台中後，重新參與文協與農組的活動以便尋找幹部並與黨員恢復聯繫。她一方面準備黨在台灣的重建工作，另一方面推展台共在文化協會和農組中的影響力㉝。不久，林日高返回台中與謝雪紅取後聯繫，他們交換有關情況的意見，並檢討五月十九日蔡孝乾、洪朝宗等人的錯誤決策——有關停止活動以及逃亡中國大陸的決定。他們決定由林日高前往東京與日共中央委員會取得聯繫，並聽取有關恢復黨員工作的新指示。在抵達東京後，六月二十日林日高在《大衆時報》與東京特別支部負責人陳來旺會面。但是因爲三月十五日事件後，日共及日本翼組織受到嚴重的損失，特別支部與日共的聯繫暫告中斷。林日高和陳來旺決定等待下去，八月，林木順由王萬得㉞陪同由上海抵達東京，四人曾經數次集會，檢討台灣和中國的實際情況。林木順最後任命林日高先行返台，等候日共新指示，之後他也返回台灣。

八月底，林日高返台並携回林木順給謝雪紅的命令，依照命令，他們應該遵照建黨大會採用的決議以及「政治大綱」內規定的任務，進行黨的活動。

(二) 黨中央委員會的成立和渡邊政之輔的死亡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日共的新指示傳抵台灣，謝雪紅召集林日高、莊春火在台北家中舉行一次中央委員會委員會議。依照日共新指示，謝獲選爲中央委員。三人做了下述決定㉟：

1. 蔡孝乾、洪朝宗、潘欽信、謝玉葉四人放棄職務逃亡中國，應開除這四位機會主義者的黨籍。
2. 吸收楊克培、楊春松爲新黨員㊱。
3. 分配中央委員會職務：

書記長兼組織部部長——林日高

勞工運動部兼宣傳煽動部部長——莊春火

其餘事務負責人——謝雪紅

由於林木順未如約返台，而林日高雖被任命爲台共書記長，但事實上黨的領導權掌握在謝雪紅手中。因此，由林木順擔任書記長的台共第一階段至此宣告結束。

他們決定由謝雪紅和楊克培在一九二九年年初開設「國際書店」，一方面販賣左派讀物並宣揚左派思想，另一方面也作爲黨的集會場所。在日警的嚴厲監視下，新的中央委員會爲了生存而隱蔽起來，而利用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的活動場合來強化黨的影響力㊲。

謝雪紅經常返回台中，保持與文協和農組內同志的聯繫，她又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以及有關土地問題、抗日及無產階級運動等的討論會㊳。

由於這些努力，她才能從文協和農組中吸收黨員，並在這些組織中建立台共的支部組織。基於黨的方針，謝於一九二八年八月提出三份有關青年部、婦女部以及救濟部的組織「提綱」㊴，這三份提綱稍後爲農民組合中央委員會所採用。

一九二八年年底農組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時候，謝雪紅聯合林兌企圖在農組中建立黨的領導地位。林兌這名東京特別支部的黨員，其返台主要是傳送書記長林木順有關〝農民問題對策〞的指示。雖然大會遭日警解散，黨中央却在第二天秘密發佈一份取材自〝農民問題對策〞的聲明㊵。

台共逐步地滲透農民組合內部而影響它的活動，日本當局不得不有所反應。他們決定不再允許農民組合公開傳佈共產主義，使農村受其思想毒害㊶。日本當局以農組分發宣傳品違反出版規則爲由，發動大規模的搜索行動，總共搜索了三百個支部和房舍，超過五百人被逮捕，農組領袖簡吉、楊春松、陳德興、陳崑崙、顏石吉、張行、蘇淸江、江賜金、侯朝宗、譚庭芳等被捕處緩刑㊷。「二一二事件」，日警雖然未能證實農組與台共的關係，但這個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却給農組及左翼運動嚴厲的打擊，台共被迫更審愼地進行活動㊸。

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警察對停泊在基隆港的「湖北丸」輪船進行檢查，這艘船的目的地是日本。檢查中發現一位穀物商的證件不合規定，又在他的行李中發現大批外國證劵。穀物商在行將被押往辦公處所時拔出左輪槍，槍擊日警成重傷之後企圖逃亡，最後在警察包圍下舉槍自殺。內務省的調查報告中顯示，這個涉嫌人事實上是日共新書記長渡邊政之輔㊹。渡邊是日共的領袖，他和建黨後的台共有密切關係，自從逃避東京三月十五日逮捕事件後，他來到了上海並與林木順碰面，聽取林木順有關台共狀況的報告。無疑的，他和日共中央委員會曾經擬出台共未來的指導路線，他很有可能携帶對台共的重要指示而來台。日共刊物曾指出，「渡邊同志前

往台灣，負有重要的任務。由於不能逃脫危險，他毅然自殺以保護黨」㊺。以後，某些台共黨員悲痛地回憶：假如渡邊能夠安抵台灣，台共後來的活動將演變成另一種局面㊻。但是直到目前爲止，我們沒有發現任何一種文件能說明渡邊來台所負任務的眞正性質㊼。

渡邊的死、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農民組合幹部被逮捕，以及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事件後東京特別支部被破獲等事件，切斷了台共和日共間經常性的聯繫。由於各種事件的影響，造成台共的困擾與問題，台共黨員們發現自己已陷入孤立地位。除了借助於長駐上海的聯絡員尋求中共的幫助和第三國際的指令外，台共沒有第二條路可行。

第四節　黨的更生運動與松山會議
(1930年10月27日至29日)

(一) 黨的更生運動

台共中央委員會當時由謝雪紅、林日高、莊春火三人組成，在一九二九年年初以前，只空有這個領導機關，缺乏堅強的實質組織，也沒有幾個黨員。但是，兩位候補黨員蘇新和蕭來福在日本四月十六日逮捕行動前，已應東京特別支部派遣回台，莊守也在被釋放後返回台灣㊽。此外，居住在中國大陸參加中共共青團的王萬得、吳拱照、劉守鴻也相繼返台，並成爲台共黨員㊾。文協和農組的成員也陸續入黨，不僅增加了黨員的數目，同時也增加了台共的影響力。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逐漸蕭條，各地的無產階級運動也逐步獲得進展，這種情勢對停滯不前的台共發展相當有利㊿。

一九二九年十月，謝雪紅、林日高、莊春火在國際書局集會，討論當時的局勢並重新分配職務，他們做了以下的決定[51]。

1. 指定地區負責人——

　台北市：王萬得

　基隆地區：蘇新

　高雄地區：劉守鴻[52]

2. 指定左翼組織台共支部負責人——

　文化協會：吳拱照、莊守

　農民組合：楊春松、趙港

3. 重新分配中央委員會職務——

　宣傳煽動部：謝雪紅

　勞工運動部：莊春火

組織部：林日高

由上面的工作指派可以看出，台共已展開全島從南到北的活動，並強化台共對左翼組織的控制力量。日本在二月十二日對農組幹部及成員的壓制，增加了農組成員對台共的同情與依附。因此，農組中的黨支部也增強了活動，黨的控制地位逐步建立㊼。文協中的黨支部同樣地也建立了領導地位。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文協第三次大會開幕時，連溫卿——這位民主社會主義分子、日共黨內喪失主要地位的山川主義派忠實信徒——的力量已被圍繞在王敏川周圍的「上大派」所超越，終於遭到文化協會的除名。至此，台共在文協的領導權也確定了下來㊽。

一九二九年年底，台共已經控制了讀書會和青年會等組織，並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工作——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工作方面，以便從中徵募黨員。一九三〇年下半年，社會科學研究會的組織日益擴展，依照一九三一年逮捕台共事件後日警的調查，當時已有十七個與台共有關的組織，其中大多數在謝雪紅的影響下活動㊾。

爲了確保黨的發展，台共對於所謂的右翼改良主義的團體，如「台灣民衆黨」以及由民衆黨分裂出去並於一九二九年八月另外成立的溫和派「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採取了批鬥和反對的態度。在台共的領導下，文協、農組及左翼工會的幹部在文協彰化支部集會，組成「打倒反動團體鬥爭委員會」，以巡廻演講的方式「譴責」並「揭發」右派改良主義者。這樣的活動聚集了相當數目的支持者㊿。

台共黨員同時出版雜誌：包括謝雪紅、楊克培、郭德金出版的「台灣陣線」，王萬得聯合周合源、陳兩家、張朝基和江森鈺等五人合創的「伍人報」[57]，由於日本檢查尺度甚爲嚴厲，所以實際上都被禁止出版。

㈡ 松山會議

自從加強在台灣的活動後，台共又尋求與外界恢復聯繫。因爲考慮到沒有機會和日本聯繫，日共和台共東京特別支部當時仍在日警的壓制下無法活動，所以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台共決定派遣林日高前往上海，透過翁澤生與第三國際聯繫。林日高直到一九三〇年四月才離開台灣，他取道厦門與潘欽信、謝玉葉兩人取得聯繫，五月抵達上海與翁澤生見面。翁澤生不滿意台灣的台共活動，他說：「台灣的黨幾乎是離開大衆，沒有活動表現，目前不過只是一個研究的團體，必須要做根本的改革」。而且，「台灣的客觀情勢已有顯著的變化，黨的各種工作方針必須重新檢討」[58]。翁澤生要求林日高提出書面報告，以便向第三國際東方局詳細報告台共的活動情形以及台灣的局勢。林日高完成報告後留在上海等候上級的指示，直到七月底才有人告訴他，要他先行返台，上級不久之後將派員赴台傳達指示。林日高失望之餘於七月返台，向謝雪紅提出脫黨聲明書。莊春火也跟著退黨[59]。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激進的」年輕黨員日漸增多，這批人感覺黨的領導力不足，同時對中央委員會的不滿也逐漸擴大轉爲不信任，當時黨中央委員會僅有謝雪紅爲代表，她遂成爲衆矢之的[60]。林日高和莊春火脫黨後，謝雪紅逐漸感到孤立，其間也因爲第三國際的指示久候不至，她感覺需要黨內有力分子支持，王萬得正是她所信任的人選。

與王萬得討論之後，謝雪紅在松山召開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會期從一九三〇年十月廿七日至十月廿九日，參加的人員包括楊克煌、吳拱照、蘇新、趙港、莊守、王萬得等人，他們決定了一條黨的臨時指導路線。

謝雪紅指出黨不能有所發展的原因[61]：1.日本當局的壓制，2.黨員的消極態度，3.中央委員會的被動態度。王萬得分析了台北地區勞工運動的

狀況，趙港和吳拱照分別就農民組合和文化協會的活動提出報告，莊守和蘇新提出他們對南部和北部地區工會運動的看法。有關工運的報告，批評黨對於工會組織運動缺乏一定的方針，放任黨員個別行動，造成工運停滯不前。最後會議做成以下的決定㉜：

1. 任命指導勞工運動的負責人——王萬得及蘇新。黨應該確立一條指導路線，以團結工會組織。
2. 建立或擴大農組支部，使它們成爲獨立的組織，並準備參加未來的「赤色總工會」。
3. 文協已無工農分子，實際上已成爲小市民階級的大衆鬥爭團體，黨應該改變它的組織性質。
4. 開除林日高、莊春火的黨籍，中委缺額等下次大會再予補全。

松山會議一方面決定了黨的臨時指導路線；另一方面，黨領導機關的不健全和指導力的薄弱也展現在黨員代表面前。處於孤單情勢的謝雪紅被削弱領導權，黨員感覺到需要一條更實際的指導路線來面對台灣的情勢。

—— 第四章註解 ——

❶治安警察法及治安維持法先後實施之後，警力大爲擴張，對於左派運動造成極大的打擊與損失，此種情形讓人覺得日本根本就是一個警察國家：〝……the Japan of the late twenties, under its parliament, was basically a police state〞. Cf. Reger Swearingen et Paul Langer, Red Flag in Japn :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n Action, 1919—1951 (New York : Greenwood Press, 1968), pp.31—32.

❷參閱(日本)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編，《台灣共產黨檢舉の概要》(東京：1928)，收入：《台灣II》，頁237—238。以下簡稱《台共檢舉概要》。《沿革誌》，頁86、661。

❸《沿革誌》，頁661—622；《台灣II》，頁237—238。

❹《沿革誌》，頁662；《台灣II》，頁244—245。

❺日本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如佐野學、渡邊政之輔、市川正一、山本懸藏等人均逃過了「三・一五大檢舉」。Cf. Scalapino, p.34.

❻《台灣II》，頁245；《沿革誌》，頁662。

❼《台共秘史》，頁29；《沿革誌》，頁662。

❽《台灣民報》259期，1929年5月5日，頁3；宮川次郎，《台灣の社會運動》，頁328—330。

❾宮川次郎，同上。

❿《台灣II》，頁245。

⓫《沿革誌》，頁663。

⓬同前註。

⓭蔡孝乾，《江西蘇區……》，頁1—3； E. Snow, p.103. ; H. F. Snow,

pp.324—325.

⑭《沿革誌》，頁 673—674。

⑮蔡孝乾，同上，頁 3。

⑯陳來旺，〝台灣の黨組織活動方針及びその組織狀態〞，收入：《台共檢舉概要》附錄，參見：《台灣II》，頁 271—273。這是陳來旺根據在台黨員提供的資料，向日共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報告。1929 年 4 月 27 日東京警察在市川正一住處搜捕時發現這篇報告。

⑰ Swearingen et Langer, p.32.

⑱黃靜嘉，頁 132。

⑲ Swearingen et Langer, pp.32—33. 立花隆，上册，頁 255—258。

⑳井出季和太，第二册，頁 849—850。

㉑《沿革誌》，頁 43、664，另參閱：〝陳來旺聽取書〞，收入：《台共檢舉顚末》，見《台灣II》，頁 87—88。

㉒林兌，台中人，日本大學商學系三年級學生。他在台北師範學校就讀時，曾參加 1924 年 10 月由三年級學生組織的罷課行動，反對日本人的教育歧視，因而被開除。次年，他前往東京繼續求學。參閱〝林兌聽取書〞，收入：《台共檢舉顚末》，見：《台灣II》，頁 101—102。林添進，台中人，情形和林兌相同，也到東京求學。參閱〝林添進聽取書〞，收入：《台共檢舉顚末》，見：《台灣II》，頁 111—112。

㉓有關成立東京特別支部的討論內容，參閱陳來旺、林兌、林添進的審訊記錄，見：《台灣II》，頁 87—88、103、112。

㉔《沿革誌》，頁 664、813。

㉕參閱〝陳來旺聽取書〞，見：《台灣II》，頁 90。

㉖文協分裂後，台灣民族運動唯一的機關報《台灣民報》仍在舊日幹部的控制下，這些幹部離開文協後，另外組織台灣民衆黨。1928 年 3 月，文

協在台中成立《台灣大衆時報》，但沒有獲准在台灣發刊，因此將報社遷往東京，於 5 月 7 日創刊發行，經由秘密管道送回台灣。由於困難重重，1928 年 7 月 9 日《台灣大衆時報》出版第 10 期後，便停止發行。參閱《沿革誌》，頁 219—220。

㉗《沿革誌》，頁 43—45。

㉘青年會的改組係以「讀書小組」爲基礎，以進行共產主義運動。參閱宮川次郎，《台灣の社會運動》，頁 340—347。另參閱〝東京台灣青年會通信〞，見《台灣II》，頁 214—228。

㉙〝林兌第二回聽取書〞，見：《台灣II》，頁 109—111；及〝陳來旺聽取書〞，見：《台灣II》，頁 91。〝農民問題對策〞此一文件和台共建黨大會所採納的〝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同樣重要，但主要部份更爲具體簡要，有助於重建台灣農民組合，使之變爲「赤色」農民組合，全文請參閱《台灣II》，頁 156—164；《沿革誌》，頁 1088—1098。

㉚〝林兌第三回聽取書〞，見《台灣II》，頁 108—109、111。

㉛ Swearingen et Langer, p.37.

㉜《沿革誌》，頁 49—67。

㉝參閱〝台灣共產黨事件〞，頁 2；《抗日篇》，頁 158。《沿革誌》，頁 667、1071。

㉞王萬得，台北人，是文化協會領導人之一。1927 年 1 月前往中國大陸，在武漢加入中共。1928 年 3 月，他前往南京從事活動。參閱葉榮鐘等，前揭書，頁 351；《台共秘史》，頁 35。

㉟《沿革誌》，頁 668—669。

㊱楊克培，彰化人，1927 年由東京明治大學政治系畢業後前往中國，在武漢成爲中共黨員。1928 年 8 月，楊克培回到台灣，由謝雪紅介紹加入台共。參閱《台共秘史》，頁 37—38。楊春松，新竹人，是農民組合中央委

員。參閱《沿革誌》，頁 1085。

㊲《沿革誌》，頁 669；〝台灣共產黨事件〞，頁 2。

㊳謝雪紅在台中農民組合的所在地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1928 年底，除了謝雪紅之外，重要成員是簡吉、陳德興、楊克培。參閱《沿革誌》，頁 669。謝與農民組合合作，舉辦問題討論會，討論有關青年、婦女、農組的策略，國際無產階級運動、批判殖民政策等等的問題，參閱《抗日篇》，頁 158。

㊴參閱〝台灣農民組合青年部組織提綱〞，見《沿革誌》，頁 1072—1073；〝台灣農民組合婦女組織提綱〞，見《沿革誌》，頁 1073—1076；〝台灣農民組合救濟部組織提綱〞，見《沿革誌》，頁 1076—1078。

㊵參閱《沿革誌》，頁 1071—1072、1084—1085、1087—1088、1098—1099。〝林兌第三回聽取書〞，見《台灣 II》，頁 109—111。參閱〝農民問題對策〞，見《台灣 II》，頁 156—164；及《沿革誌》，頁 1088—1098。有關〝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宣言〞，參閱《沿革誌》，頁 1099—1101。

㊶葉榮鐘等著，前揭書，頁 534，未註明出處。

㊷《台灣民報》239 期，1929 年 12 月 29 日，頁 2。宮川次郎，《台灣の社會運動》，頁 368—371。

㊸《沿革誌》，頁 669、1102—1103。葉榮鐘等著，前揭書，頁 534。

㊹ Cf. Swearingen et Langer, p.36.

㊺《沿革誌》，頁 669—670。

㊻同上。

㊼日共在其黨史中，始終聲稱渡邊被警察「謀殺」。但是到了 1972 年，卻改口說渡邊是自殺的。參閱：立花隆，上册，頁 297—298。根據 Beckmann & Okubo，渡邊到台灣的目的是爲了幫助台共的組織發展（參閱頁 171）。但是，他們對此種說法沒有提供任何的證據。

㊽蘇新，台南人。1928年10月，他成爲東京特別支部的候補委員。參閱《台共祕史》，頁39；〝台灣共產黨事件〞，頁2。蕭來福，台南人，台共候補委員，《無產者新聞》台灣部門的負責人。1929年3月間，他返回台灣，同年10月成爲台共黨員。參見《台共祕史》，頁40—41；〝台灣共產黨事件〞，頁2。〝莊守聽取書〞，見：《台灣II》，頁149。莊守，彰化人，1928年3月入早稻田大學，同年10月加入台灣科學研究會。蕭來福返台後，莊守取代了他的地位，負責發送《無產者新聞》的工作。參閱《台共祕史》，頁50；〝莊守聽取書〞，見《台灣II》，頁147—150。

㊾吳拱照，新竹人，1928年5月在上海加入台共。由於加入「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被日警逮捕遣返台灣，判刑一年，緩刑四年。1928年11月8日釋放後與謝雪紅取得連絡，受命參與文化協會的活動。參閱，宮川次郎，《台灣の社會運動》，頁332；《台共祕史》，頁62—63；《沿革誌》，頁245。劉守鴻，於上海讀書會事件中被捕，判刑2年，緩刑4年，1929年8月釋放。他在國際書局工作，接受謝的指揮。參閱《台共祕史》，頁49—50；〝台灣共產黨事件〞，頁2。

㊿《沿革誌》，頁670。

51同上。

52劉於1930年3月被派任這個職位。參閱《沿革誌》，頁670—671。

53〝台灣社會運動團體〞，《台灣民報》294期，1930年1月1日，頁8。另參閱：許世楷，頁335—336。

54參閱“台灣社會運動團體”，同上；許世楷，同上。連溫卿派和王敏川派的衝突，反映了1927年後日本社會民主派人士與共產主義份子之間的對立。參閱山邊健太郎的評註，見：《台灣II》，頁13—14。

55參閱〝社會科學研究會一覽表〞，見《沿革誌》，頁753—756。

56《沿革誌》，頁756—759。

㊼《伍人報》，創刊於1930年6月，只維持了六個月。從第15期開始，改稱《工農先鋒》，不久與《台灣陣線》合併。《台灣陣線》創刊於1930年8月，但被禁止出版。12月改變名稱爲《新台灣陣線》，但始終被日警禁止發行。參閱，王一剛(即王詩琅)〝思想鼎立時期的雜誌〞，《台北文物》3卷3期，1954年12月，頁131—133。曹介逸，〝日據時期的台北文藝雜誌〞，《台北文物》3卷2期，1954年8月，頁47。另參閱：尾崎秀樹，〝決戰下的台灣文學〞，見尾崎秀樹，《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71)，頁207，註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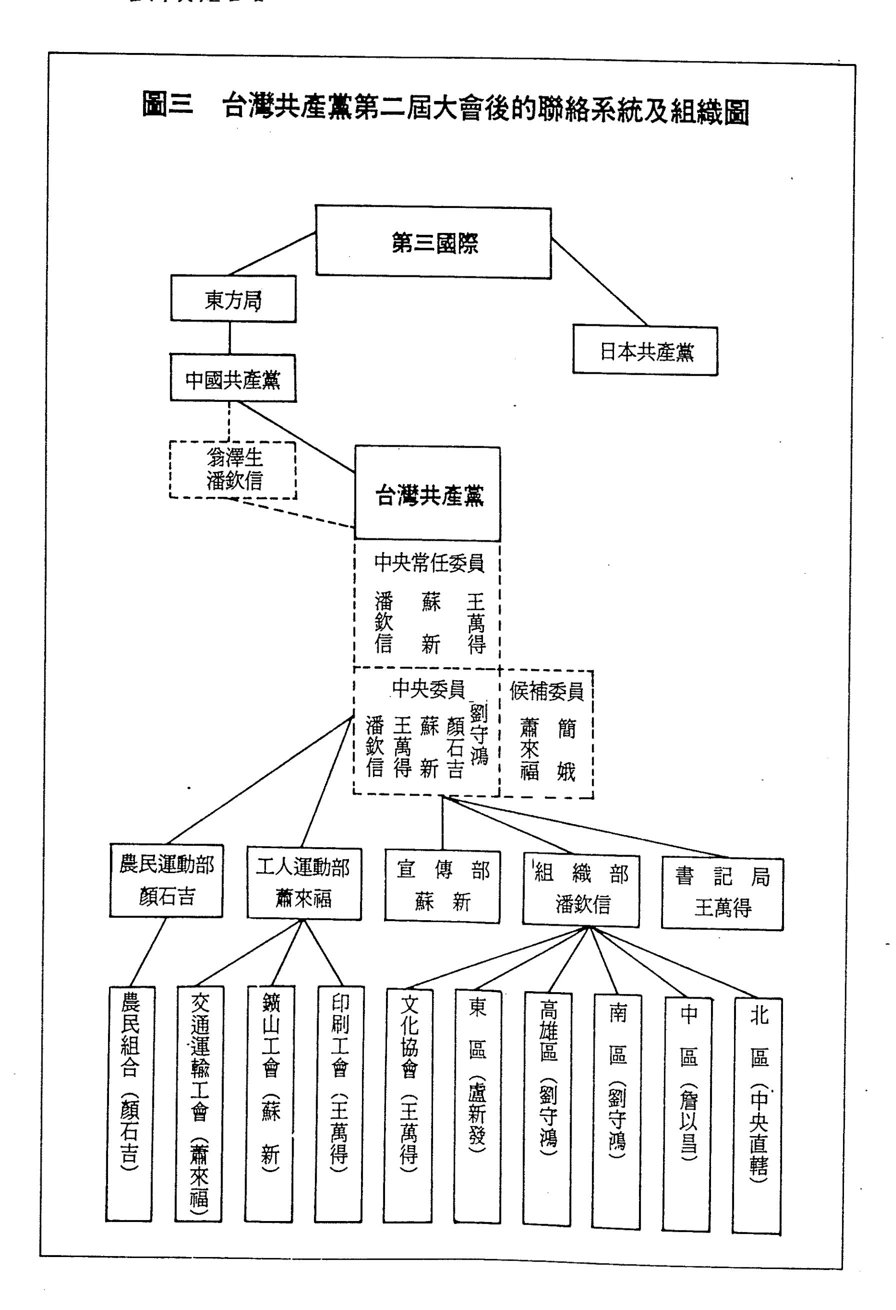
㊽《沿革誌》，頁671的引述。

㊾參閱《沿革誌》，頁672—673。我們可以確定林與莊的脫黨，一方面因爲地下活動不斷遭到日本的壓制，另一方面由於翁的批評以及在上海徒勞無功的等待使林大爲失望；此外，1928年4月，台共遭到第一次破壞時，林及莊顯得頗無作爲。謝在黨中的領導地位也可能是促使林和莊脫黨的原因之一。

㊿郭乾輝（郭華倫），《台共叛亂史》(台北：內政部調查局，1955)，頁39—40。

61《沿革誌》，頁672。

62同上，頁673。


圖三 台灣共產黨第二屆大會後的聯絡系統及組織圖
第三國際
東方局
日本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翁澤生
潘欽信
台灣共產黨
中央常任委員
潘欽信 蘇新 王萬得
中央委員
潘欽信 王萬得 蘇新 顏石吉 劉守鴻
候補委員
蕭來福 簡娥
農民運動部
顏石吉
工人運動部
蕭來福
宣傳部
蘇新
組織部
潘欽信
書記局
王萬得
農民組合（顏石吉）
交通運輸工會（蕭來福）
鑛山工會（蘇新）
印刷工會（王萬得）
文化協會（王萬得）
東區（盧新發）
高雄區（劉守鴻）
南區（劉守鴻）
中區（詹以昌）
北區（中央直轄）

第五章
改革同盟與臨時代表大會
（1930～1931）

第一節　黨內鬥爭與第三國際的干涉

(一) 黨內鬥爭

「改革同盟」的成立以及黨內的鬥爭，可以回溯至台共成立的時候。當時三位建黨組織者：謝雪紅、林木順、翁澤生分別代表著不同的勢力：謝和林代表日共系統，翁則代表着中共系統的勢力。黨內職務分派之後，翁代表的中共系統占有大多數職位，對台灣也有一定的影響力。謝和林是由日共支持而獲選爲黨的領導幹部，且第三國際是主要的支持力量。這就是爲什麼林木順當選黨書記長，而謝及翁分別是負責對日共和中共的聯絡員的緣故。這也使得剛成立的黨能夠維持某種內部的凝聚力，但是這種凝聚力在上海台灣讀書會事件過後，即迅速瓦解。

自從黨在台灣的指導機關成立後，謝雪紅開除了屬於翁澤生集團的蔡孝乾、洪朝宗、潘欽信、謝玉葉，這使得黨內的力量關係有所調整。謝與

日共維持密切的關係，在實際上控制了台共，並逐步向文協及農組等左翼組織擴展勢力。但翁的系統仍舊存在，蔡孝乾逃抵中國大陸之後，在廈門成立一個台共支部，與翁及其他台共黨員恢復了聯繫❶。

同樣地，潘欽信在廈門恢復了中共黨籍❷。至於其他人，翁澤生及林木順在四月廿五日事件中並未被捕，仍然保持台共黨籍，但同時恢復了中共黨籍。以這個名義，他們對上海的台灣左翼學生及分子再度展開工作，甚至在中共的領導下，翁及林成立了「上海台灣青年團」，作爲「上海反帝大同盟」的一個分支❸。翁在上海從事活動時，同時也伺機建立他對台灣黨的影響力。

日共和台共東京特別支部被破壞後，台共和日共的關係再度中斷，謝於是想尋求中共的資助，這就造成了翁的機會。事實上，在王萬得返台後，翁澤生即多次嘗試遣回黨羽，以圖在台灣建立新的基礎❹。王萬得返台後獲得謝的信任，逐步與台共其餘黨員建立關係，尤其在松山會議後進展得更順利。謝對翁的這種爭取領導權的宗派主義鬥爭，於焉展開。

對於台灣情勢和策略見解上的差異，也是構成雙方敵對態勢的一個重要因素。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台共建黨的那一年)，台灣的工農運動已經展開，特別是一九二七年文協分裂後，活動更爲蓬勃。文協和農組的左傾招致日本當局的壓制，使得多數幹部和積極分子（其中包括不少青年）紛紛下獄❺。這是台灣抗日運動中「痛苦」和「再調整」的階段❻，也是台共發展中最艱難的階段。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建黨大會決定的政治路線已無法全部加以應用。依據謝雪紅的想法，應該借助合法組織以增強黨力，使黨穩步進展。例如就文協而言，謝認爲文協的存在對台共的發展有利，而黨的年輕黨員以及翁澤生的系統則認爲它的存在是台共發展上的一個障碍，應該加以解散❼。

在年輕和急進黨員眼中，特別是曾在中國和日本唸書的黨員，認爲謝

企圖獨占黨的控制權；此外，謝那種與人難以相處的性格也令他們不快❽。因此，在黨員盲目遵循第三國際的指令及謝翁之間的敵對下，黨的內鬨程度逐漸增加。

一九二九年「二一二事件」發生，有些台共黨員提出文協解散的問題。但是，一九三〇年文協第四次代表大會中，在謝雪紅的支持下，王敏川出任文協主席，他提出的計畫也獲得通過；這個計畫主要在使文協這個團體變成小市民階級的鬥爭組織。因此，與謝敵對的黨員認爲這個決定是「機會主義」的作法，要求立即將文協解散❾。

由於見解上的差異和對領導權的爭奪，使得黨內鬥爭勢不可免；當時有一股外力介入，在改革同盟的成立上扮演了一種決定性的角色❿。那就是第三國際的介入。

(二) 第三國際的介入

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是第三國際策略的重新調整階段，由於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合作的失敗，這種調整是必須的。第三國際召開的第六次大會，於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九月在莫斯科舉行，會中正式宣告這種調整的必要⓫。由於第三國際所主導的「國共合作」政策遭遇失敗，第三國際必須記取「中國災難」的教訓：第六次大會中提出東方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已經背叛革命，並且將其歸併到帝國主義陣營，因此，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政策必須拋棄。它同時檢討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認爲第三國際在這些地區最難推行它的政策，因爲這些地區沒有眞正的共產黨。因此，加強這些地區內的共產主義活動，是第三國際最主要和最迫切的任務之一⓬。可以說，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之間，亞洲殖民地區共產主義運動趨於激進的理由，主要是企圖實現第三國際上述的方針。台共的改革

重組，一方面導因於內部的鬥爭，另一方面是爲了遵循第六次大會的決議，而成爲亞洲殖民地區共產黨創黨、重組的一環。

一九三〇年七月林日高返回台灣，他並沒有獲得上海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新指令。稍後，農民組合指導委員會成員之一的陳德興路過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赤色職工國際(Profintern)第五次大會。同年十月，潘欽信奉東方局的命令由廈門抵達上海⓭。在翁澤生的指導下，潘及陳進行撰寫給東方局有關台灣情勢的報告。這份報告指出台共組織無法發展，黨的細胞與黨團不分，中央機構的指導力量薄弱，工會的活動也沒有進展⓮。

一九三〇年六月，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作爲「李立三路線」期間各種事件的基本依據。在這個階段中，中共在李立三領導下，嘗試組織了各種最後終歸失敗的武裝暴動⓯。

「李立三路線」被清算後，十二月初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的瞿秋白與翁、潘會面。瞿秋白曾在上海大學擔任過翁的教授，依照潘欽信的說法：

「最近依據東方局說，由於台共陷於機會主義的錯誤，黨員缺乏積極性，黨組織與成立時並沒有很大差別，而且極爲幼稚，黨的活動也停滯不前，這就是台共爲什麼不能完成革命運動指導任務的原因。」⓰

因此，在東方局的同意下，中共中央委員會建議台共所有黨員進行黨的改革工作。瞿秋白並且強調，由於世界經濟蕭條的影響，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問題日見擴大，因而有利於革命運動的發展。台灣爆發工農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環境下，如果黨不能克服機會主義的錯誤，將無法取得未來革命的領導權⓱。

瞿在發表中共對台共組織、工人等政策問題的意見後，總結道：「無論如何，台共應該召集一次臨時大會，檢討過去的方針，並確立新的正確

方針。爲了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在大會召開之前，使一般黨員從機會主義的誤謬中覺醒過來，並在實踐過程中克服機會主義的錯誤。」⓲

稍後，東方局一位蘇聯籍負責人向翁及潘說話，除了重複瞿秋白的指示以外，並表明東方局近日將正式對台共發佈新指令。翁和潘因此應該返回台灣，傳達第三國際的命令，並準備召開黨大會。但是他倆在考慮過後，決定由陳德興擔任這項任務，因爲陳當時已無法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大會了。他必須向謝雪紅傳達第三國際改革黨的指示，假如她拒絕接受的話，就向王萬得和趙港提出這項指示⓳。

謝雪紅認爲陳德興於一九三〇年底攜回的這項指令是盲目的妄論，並不符合台灣的實際狀況，這個指令並不能代表東方局的意見，只能說是翁個人的意見，因此，她拒絕接受。陳德興停留上海時已經傾向翁澤生，於是照預定計畫向王萬得提出該項指示，而使得黨內鬥爭趨於公開化。

第二節　改革同盟的組成
(1931年1月27日)

(一) 改革同盟的成立

一九二九年間王萬得由上海返回台灣,他重新在文化協會中展開活動,並且創辦一份名爲《伍人報》的雜誌,用來作爲和各地聯繫的工具。王萬得與翁澤生早有密切的關係,當時台共對黨員並沒有強烈的拘束力,王的行動並沒有完全依照台共的紀律。由於王不滿意謝的領導以及與翁有親近關係,使得王有機會掌握黨的領導權。從松山會議開始,他已努力地建立與其他主要黨員間的聯繫。此次陳德興攜回第三國際的指令,王因爲有了正式的支持,使得他能夠運用合法的手段,迅速地準備黨的改革工作。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廿七日,王在台北住所召開會議和蘇新、蕭來福、陳德興等人討論黨的改革問題,決定結合下列七位同志進行準備工作⑳:

蘇新:鑛山工會組織的負責人

蕭來福:運輸工會組織的負責人

趙港、陳德興:農民組合黨團負責人

莊守:南區負責人

吳拱照、王萬得:文化協會黨團負責人

陳德興:負責與各地黨員聯絡的關係人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前述七位黨員在王宅集會,討論成立「改革同盟」的問題。在這次會議中列舉了黨內機會主義者的各種錯誤㉑:

1.組織上的封閉主義。

2.政治上的不動主義。

3.迄未建立黨機關及發展支部。

4.黨員不過組織生活，也不瞭解黨的政治綱領和政策。

5.黨和黨團界限不明確。

6.上級機關對於下級機關與黨團工作的領導不足。

會中決定：改革同盟必須遵循第三國際的指令，改革同盟也應該維持到黨代表大會召開時才解散。七位黨員也通過黨的暫定方針，主要內容是：黨應該激發工農大衆的日常鬥爭活動，從中吸收黨員並發展農民運動、工人運動與青年運動，進而擴展黨的影響力。此外，七位黨員主張與原有黨中央機關斷絕關係，並公開譴責原先領導機關的反動行爲，規定能夠查覺自己錯誤的黨員可以加入改革同盟的行列㉒。

選出的臨時中央委員會五位成員分別是陳德興、蕭來福、蘇新、趙港以及王萬得，後三位又同時擔任中央常務委員的職務。台灣共劃分爲五個工作地區，三個地區由黨派遣特別代表負責，其餘兩個地區由黨中央委員會直接領導㉓。

改革同盟的成立象徵台共謝雪紅時代的結束，除了楊克煌以外，松山會議的主要成員都投到改革同盟的陣營去了，謝雪紅只能控制國際書局而已，站在她身邊的只剩楊家兩兄弟：楊克煌和楊克培㉔。改革同盟同時建立了對農組的控制權，謝雪紅因而被農組成員斥爲叛徒以及反動分子㉕。

在謝雪紅這一方面，她也發表一項聲明，譴責農組領袖未能瞭解合法運動與秘密活動之間的區別，事實上這兩種方式的結合，在抗日運動的發展上都是必須的㉖。

㈡ 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指令及黨的改革準備

一九三一年二月，台共新領袖王萬得在給第三國際東方局的報告中指出：改革同盟成立之後，謝雪紅是黨內唯一拒絕進行改革工作的中央委

員；改革同盟將積極召募黨員，並擴展黨在左翼組織內的影響力㉗。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東方局透過中共的協助，以〝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答覆台共的報告㉘。這封信延伸了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採用的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理論，東方局強調：世界經濟蕭條日益加深，資本主義與蘇維埃社會主義之間的衝突也日益擴大，同時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也加深了。新的世界大戰已無可避免，爲了化解這個危機，資本主義國家毫無疑問地將加強他們的剝削與壓制，這種情形因而有助於無產階級運動及解放運動的迅速發展。台灣是殖民地的一環，並不能避免革命鬥爭高潮的來臨，因此台灣的同志應該克服自己的主要弱點——諸如它們的被動以及缺乏組織和革命鬥爭的指導等，應該將少數人組成的小團體轉變成一個堅固而團結的共產黨組織，以便完成它最初的任務——領導台灣的工農運動，確保殖民地解放，並參加世界革命的陣營。在同一封信中，東方局列出聞名的十項基本口號，這些口號反映了台共當前革命階段的需要㉙。

改革同盟接到這封信之後，從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開始，即在王萬得的指導下成立委員會，着手準備黨員代表大會。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潘欽信奉東方局和中共的建議回到台灣，一星期後召開了黨員代表大會的籌備會。參加籌備會的有王萬得、蘇新、蕭來福及潘欽信，潘欽信向大家展示東方局的指令以及中共有關改革台共黨務的建議，潘並負責起草新的台共政治大綱㉚。

經過一個月的籌備後，籌備會召開了最後一次會議，會中決定從五月三十一日開始召開黨的臨時大會，會議地點則由王來決定。參加人數預計有下面七位㉛——

潘欽信：第三國際的代表

王萬得：改革同盟中央委員會代表

蕭來福：工人運動黨員代表

顏石吉[32]：農民運動黨員代表

劉守鴻和莊守：南部地區代表

蘇新和簡娥[33]：北部地區代表

籌備會結束後，王和蘇開始聯絡黨員。蘇新携帶新政治大綱的各項計畫，於五月底前往台灣南部，分別接觸黨員並徵求他們的意見。同時，王萬得也在五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在台北召開北部地區的黨員會議。這些黨員贊同新的政治大綱，並通過一系列的決議，這些決議日後在黨員代表大會中均被接受。

第三節　黨的臨時代表大會與新的政治大綱（1931年5月31日～6月2日）

㈠ 臨時代表大會

儘管某些黨員被逮捕(如趙港和陳德興㉞)，黨的臨時代表大會仍於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在淡水附近八里觀音山麓召開。第三國際代表潘欽信在會中首先報告東方局的指導意見及中共的友好建議，然後指出：「台共已經落入機會主義者手中，應該糾正這種錯誤並確定新的方向。改革的主要方針是清除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這種成分就是機會主義的根源。在挑起工農日常鬥爭的行動中，應該察覺這種機會主義的錯誤，這種做法還可以在工農大衆中吸收新黨員、堅固黨的無產階級成分，以確保台共的布爾什維克化」㉟。潘欽信同時指出，改革同盟是爲了實行第三國際的指令而組織的「黨中黨」，雖然政治動機正當，但它還是違反某些組織的原則，這就是爲什麼改革同盟應該解散的原因㊱。

最後，大會決定解散改革同盟、通過新的政治大綱，將謝雪紅、楊克培、楊克煌等人開除黨籍，同時選出中央委員：潘欽信、蘇新、顏石吉、劉守鴻、王萬得，候補委員蕭來福、簡娥；而由潘欽信、蘇新、王萬得出任中央常務委員㊲。

六月四日，常務委員在台北開會，會中分配黨內職務如下㊳：

1.執行局——

書記長：王萬得

組織部負責人：潘欽信

宣傳煽動部負責人：蘇新

2.地方負責人——

工人運動負責人：蕭來福

農民運動負責人：顏石吉

中部地區負責人：詹以昌

南部地區負責人：劉守鴻

東部地區負責人：盧新發

北部地區：由中央委員會直接領導

黨員大會過後，王萬得向第三國際東方局報告會議結果，潘欽信也草擬〝接受中共黨中央建議的決議書〞一份，在決議書中潘欽信特別指出：中共在台共建黨大會和臨時大會所給予的支持，具有國際性的意義；這個決議書也強調台共尋求中共支持的期待心理，爲的是想促成台共的布爾什維克化，並與中共建立更密切的關係[39]。在這份決議書中「布爾什維克」一字反復出現五次，反映了一種情形，即中共四中全會(一九三一年一月)後，以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爲首的國際派——所謂「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在黨內取得完全的勝利。台共臨時代表大會的結果正是上述這種情形在台灣的翻版[40]。

改革同盟的成立原本是基於第三國際的指令和中共的支持，因此，臨時大會的召開不僅象徵台共「激進分子」的勝利，更具意義的是，象徵了第三國際權威的維持與勝利。儘管謝雪紅曾赴莫斯科受訓，但由於她對第三國際的指令採取懷疑的態度，因而遭到開除黨籍。台共臨時大會的作法，就是要貫徹第三國際的路綫與權威，任何反抗者不論所持理由爲何，都必須受到制裁。就這一點而言，一九三一年在台灣海峽兩岸共黨陣營中所發生的結果，竟然是一致的。

改革同盟的成立和它的成功，在台共發展的過程中成爲一個不尋常的事件。依據組織原則，既然有進行改革的必要，就應該直接召開黨員代表

大會。日本也如此認爲，他們懷疑改革同盟的行動到底是不是基於第三國際的指令㊶。但是就像第三國際代表潘欽信在臨時大會的簡短致詞所指出的一樣，改革同盟本身違反了組織的規定。形成黨中黨的現象嚴重損害了組織原則。就這方面來說，即使它忠實地服從第三國際的命令——動機是正當的，改革同盟也必須加以解散。

因此，以黨員代表大會名義刊行的〝告全體同志書〞中，同時強調了兩點，即改革同盟在黨的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必須解散的理由。同一封信也號召全體台共黨員配合黨一致行動，並遵照黨的正常路線活動㊷。謝雪紅在一九三一年六月被捕受審，在她的供述狀中指出，改革同盟在否認黨的存在後，也不得不承認黨的存在事實，在準備黨的臨時大會名目下，改革同盟所進行的只不過是奪取黨內領導權的陰謀㊸。

㈡ 新的政治大綱

對於殖民地革命，改革同盟採納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通過的新策略；而在台共內部，此時正出現了反對謝雪紅的暗流，這些都是改革同盟演進的主要特點。臨時大會採行了新的政治大綱，毫無疑問地，不只反映出第三國際有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運動的主要指導路線，也反映出革命策略的極左趨向：

「……台灣資產階級並不願與帝國主義分離，他們只要求在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能夠改善自己的地位，以及維持同樣的剝削機會而已；他們在帝國主義的權力庇護下，想隨帝國主義的發展而發展。……目前的台灣資產階級明顯地違背了民族的利益，並且公然與帝國主義者妥協。他們不僅不再成爲一股革命力量，相反地，他們却構成革命的障礙。」㊹

因此，只有在無產階級的指導下，農民、小資產階級、工人大衆才是

革命的推動力量。也只有在無產階級的指導下,「廢除民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政策,在農村及工廠內進行猛烈的階級鬥爭和武裝革命,才能完成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㊺。這份新的政治大綱和一九二八年的大綱有所不同,在它的策略中顯示出三個主要目標㊻:

1. 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實現台灣獨立。
2. 實施土地革命,消滅封建殘餘勢力。
3. 建立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

爲了達到這三個目標,在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指導下,新的政治大綱將其政治策略濃縮爲十點㊼:

1. 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實現台灣獨立。
2. 沒收帝國主義者的一切企業和銀行。
3. 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農和中農使用。
4. 實行八小時勞動制,實施國家失業救濟、實施社會保險等制度。
5. 廢除一切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累進稅制度。
6. 革命的言論、出版、罷工的絕對自由。
7. 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
8. 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9. 聯合日本、中國、印度、朝鮮的工農大衆。
10. 聯合蘇聯和世界無產階級。

新的政治大綱抄襲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有關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理論,它強調台灣的革命運動依靠着世界革命和台灣內部情勢的變化,這個運動將逐步發展,無可避免地應該會達到它的發展高潮。但是目前革命力量仍然十分薄弱,黨對羣衆的影響力也很有限。黨的政策和黨的存在並不爲多數人民所瞭解,這就是爲什麼黨應該對民族主義改革派和民主社會主義分子展開鬥爭,以爭取廣大羣衆的原因,它同時應該攻擊左傾和右傾的社會

主義者，使黨能遵循布爾什維克的正確路線。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政治大綱一改過去對台灣原住民的漠視態度，而把它當作少數民族問題來看待，因此提出「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張㊽。這個態度與第三國際及中共的第六次大會所有的規定一致，但是這個態度的轉變，主要是由一九三〇年十月發生的霧社事件而來的㊾。新的政治大綱強調成立一個少數民族委員會，以及與原住民組成聯合陣線打擊日本人的必要性。依據新的政治大綱，台共所犯機會主義的錯誤是由於黨員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的結果，同時組織的數目也過於有限，黨因而不能領導革命鬥爭工作。因此，黨今後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擴大黨組織，從工農中徵募新黨員，同時在企業中擴展黨的支部㊿。

臨時大會召開後，黨的新領導階層分發一份〝有關徵募黨員的指令〞。依據這份指令，黨要拋棄機會主義的態度，主動地在大企業的工人、貧農及城市的邊緣分子中吸收新黨員51。新的黨中央極力強調世界資本主義的第三期危機論，認爲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以及革命武裝鬥爭已日益迫近，因此應該降低黨員的社會標準，並大量徵募工農羣衆以迎接革命的高潮。

——第五章註解——

❶蔡爲乾，《江西蘇區・紅軍西竄記回憶》，頁 1、11。

❷《沿革誌》，p. 673。

❸《沿革誌》，頁 813—815，這個大同盟包括了大約 70 個中國人、韓國人和台灣人的團體。

❹參閱《沿革誌》，頁 820，以及謝雪紅在預審法庭的供詞，同書，頁 684。

❺〝台灣解放運動各團體的現勢〞，《台灣民報》，345 期，1931 年 1 月 1 日，頁 3。

❻〝台灣社會運動團體〞，《台灣民報》294 期，1930 年 1 月 1 日，頁 8。

❼翁澤生因此託他的一個擁護者將這個想法轉達給台共的黨員。參閱《沿革誌》，頁 820。

❽楊子烈曾特別提及，當她與謝雪紅及其表兄弟（林木順）在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讀書時，謝對待林所表現的專制嚴厲的性格。參閱：楊子烈，頁 156。

❾《沿革誌》，頁 264—265。葉榮鐘等著，頁 352—353。

❿郭乾輝，頁 40。

⓫此一策略遭到托洛斯基的指責，當時托氏由於和史達林爭權，已被排除於第三國際的領導圈子之外。Cf. Carrère d'Encausse et Schram, pp. 85—86.

⓬參閱第七章第一節，第二大段。

⓭《沿革誌》，頁 673—674。陳德興，高雄人，1930 年 4 月經趙港介紹加入台共。參閱《台共祕史》，頁 43。

⓮《沿革誌》，頁 674。

⑮ Cf. Guillermaz,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t.1, pp. 198—204.

⑯潘欽信被日警逮捕後的供詞，參見《沿革誌》，頁 674 的引述。

⑰《沿革誌》，頁 674—675。

⑱《沿革誌》，頁 675。

⑲同上，頁 675—676，謝否認這種說法。她說陳在通知她之前，已經和王連絡好，同意成立改革同盟。參閱謝雪紅在法庭的供詞，見《沿革誌》，頁 684—685。

⑳《沿革誌》，頁 676。

㉑《沿革誌》，頁 677—678。

㉒《沿革誌》，頁 678—680。

㉓盧新發負責東區（宜蘭、花蓮、台東）；劉守鴻負責南區（台南）及高雄、澎湖地區；北區（台北、新竹）及中區（台中）由中央委員會指揮領導。參閱《沿革誌》，頁 680。

㉔參閱《沿革誌》，頁 633，王萬得送達第三國際東方局的報告中特別指出，大部分黨員均屬於改革同盟，只有單獨幾個人仍受謝的影響。

㉕參閱〝台北國際書局同人反動に關する聲明〞，見：《沿革誌》，頁 689—690。

㉖參閱〝台灣農民組合の聲明書に對する聲明〞，見：《沿革誌》，頁 690—692。

㉗有關王萬得的報告，參閱《沿革誌》，頁 692—694。

㉘〝台灣共產主義者に致する書〞，收入：《沿革誌》，頁 694—701，參閱附錄二。中共中央委員會將此信交給翁澤生，轉派身爲中共共青團團員也是上海台灣反帝同盟成員李淸奇帶回台灣，將第三國際的指令轉達給王萬得，參閱《沿革誌》，頁 694。

㉙參閱附錄二。

㉚《沿革誌》，頁712。

㉛《沿革誌》，頁712—713。

㉜顏石吉，屏東人，1927年9月，他在屏東成立農民組合支部。1928年底第二次代表大會，他被選爲農組中央委員會委員。二一二事件中被日警逮捕，不久遭到釋放。1930年3月由趙港吸收爲台共黨員。參閱《台共祕史》，頁48；〝台灣共產黨事件〞，頁2；《沿革誌》，頁1098、1103。

㉝簡娥，高雄人，中學時即與張玉蘭來往，兩人同時加入農民組合的活動。1928年7月因此而遭學校開除。簡氏身爲女性又是農組會員，遂成爲當時的鋒頭人物。1930年11月，由顏石吉吸收加入台共。參閱《台灣新民報》345期，1931年1月1日，頁26；《台共祕史》，頁31—33；〝台灣共產黨事件〞，頁2。

㉞參閱第六章第一節。

㉟《沿革誌》，頁714。

㊱同上。

㊲同上，頁714—715。

㊳同上，頁715。

㊴〝中國黨中央の提議を接受する決議案〞，收入《沿革誌》，頁716。

㊵參閱1931年8月劉纘周送達的日共指令(第六章將加以敍述)，見：《沿革誌》，頁741。

㊶《沿革誌》，頁714。

㊷〝全體同志に告ぐる書〞，見：《沿革誌》，頁716—718。

㊸參閱〝謝氏阿女豫審廷に於ける供述要旨〞，《沿革誌》，頁687—688。

㊹〝台灣共產黨政治大綱〞(1931)，見：《沿革誌》，頁722—723。

㊺同上，頁722。

㊻同上，頁721—722。

㊼這十點依據的是，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政治決議案：

(1)打倒帝國主義的支配。

(2)沒收外國企業、銀行。

(3)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的權利。

(4)打倒軍閥及國民黨政權。

(5)建立代表工農兵的蘇維埃政權。

(6)實施八小時工作制，提高工資，救濟失業者，實施社會保險制度。

(7)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士民。

(8)改善士兵生活，提供土地和工作。

(9)廢除政府、軍閥、地方的苛捐雜稅，建立統一累進稅。

(10)與蘇聯及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

參閱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決議案〞，見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部會編，《中國共產黨史資料集》（東京：勁草書房，1972），第四輯，頁7。

㊽台灣的住民有三個來源：來自中國廣東、福建的移民，漢化的平埔族，以及尚未漢化、居住在台灣中央山脈的原住民。Cf. Imbault-Huart, C. L'î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réimpression(lère éd. Paris : Ernest Leroux, 1893)（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頁233）. 此處指的是第三類未漢化的原住民。

㊾1930年10月27日，中部的霧社原住民起義反抗日本人，殺死一百多人。日本的鎮壓行動造成原住民上千人的死亡。這項起義事件使得台灣民族運動的領導人改變了態度而支持反抗者。參閱：戴國煇，〝霧社起義與中國革命：漢族系中國人中的少數民族問題〞，《思想》596期，1974年2月，

pp.66—77；597期，1974年3月，頁93—107。

㊿《沿革制》，頁729—730。

51参閱〝黨員獲得に關する指令〞，見：《沿革誌》，頁734。

第六章
最後的破壞與黨的重建企圖
(1931～1932)

第一節　逮捕共產黨員與重建黨中央的企圖
(1931年3月至10月)

(一)　逮捕共產黨員

自從改革同盟成立後，急進的少壯黨員即積極進行工作，準備成立台灣礦山工會、運輸業工會以及印刷業工會等組織。他們在鐵路部高雄廠建立黨支部❶，重新組織北部地區的礦業工人❷，同時領導工人的爭議事件，以擴展黨的影響力。一九三一年二月，他們發動台北膠版印刷工人罷工，這項罷工行動持續了一個月❸，四月底又策動石灰炭礦工人罷工❹；七月，昭和製糖研究所的罷工行動❺也是他們的傑作。爲了嘉南地區的灌溉問題，他們又領導拒絕償付水租運動，以及台南和屏東農民拒絕戶稅的運動❻。

台共於臨時大會後重新改組，黨中央面目一新，在少壯激進黨員的領

導下，工作路線急速轉變，由過去的「關門機會主義」轉變爲「開門急進主義」❼。因此，工農運動有了迅速的發展，黨員數目急劇增加，工人階層中普遍建立了黨支部，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最後也落入黨的控制中。這個階段可以稱爲台共的「黃金時代」❽，只是爲期並不長久。

一九二八年四月上海台灣讀書會事件後，日警對台灣共產黨的活動採取監視行動，但是台共活動仍在地下繼續進行，這使得他們的活動情形難以爲人所知。一九二九年台灣左翼運動的發展，被日本當局視爲與共黨活動有關。

一九三〇年年底陳德興由上海返台，以及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溪森返台都被日警偵知，日人認爲此二人必定攜有對台灣共產黨運動的重要指示。

一九三一年的三月十日——日本陸軍紀念日，日人第一次在台灣舉行防空演習活動，這一天台北有人散發「反對帝國主義」的傳單，使得日本當局決定進行搜查與逮捕台共的行動。王日榮和林式鎔這兩位印製傳單的人隨後爲日警逮捕。這兩個人從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開始，即和張朝基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因此，張朝基和一位台共黨員林殿烈之間的秘密聯繫關係暴露了，後來，有關改革同盟成立以及台共臨時大會的重要文件也被扣押。三月二十四日在日警的搜捕過程中，早已列入黑名單的農民領袖趙港被捕，與趙港在一起的陳德興僥倖逃脫，隨後又於高雄被捕❾。這些逮捕行動以及黨內重要文件的暴露，使得日本當局得知改革同盟和臨時大會存在的事實。

逮捕共黨的行動遍及全島：首先，謝雪紅和楊克培於六月二十六日在台北被捕，七月十七日王萬得被捕，七月底蕭來福也被捕，潘欽信、簡娥、莊春火於九月一日在基隆被捕，九月中蘇新於彰化被捕，其餘尚有多名重要黨員顏石吉、劉守鴻、莊守等亦陸續被捕。總括這次行動中，共有一〇七名台灣人被逮捕，其中七九人從一九三一年十月開始陸續送往檢察單位，

總計四十九人被提審，分別判處二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⑩。

(二) 重建黨中央的企圖

七月和八月間，由於黨的領袖和黨員陸續落入日警手中，台共中央機關可以說已遭破壞殆盡。於逮捕行動中逃脫的黨員認爲，黨中央不可一日不存在，因此籌思重建黨中央。這批人包括蘇新、劉纘周、其他黨員以及左翼組織的成員。

劉纘周是一個海員，也是共產主義支持者，他於一九三〇年在海參崴參加共黨組織，曾代表台灣參加赤色職工第五次國際大會，一九三一年奉命返回台灣發展工人運動的組織⑪。他從莫斯科經上海返台，與謝雪紅、王萬得取得聯繫，認爲改革同盟的做法違反了第三國際的規定。他立刻取得謝雪紅的信任，由謝雪紅遣赴日本，向日共提交一份報告，試圖恢復與日共的聯繫。這份報告提出下面六點⑫：

1. 改革同盟的實際狀況。
2. 要求日共派代表來台協助重建台共。
3. 要求日共確立和台共間的組織關係。
4. 調查改革同盟與東方局之間的關係。
5. 查明東方局是否送台共三千圓經費。
6. 關於解散文化協會的指令。

謝雪紅意圖恢復台共與日共的關係，以對抗翁澤生、王萬得所代表的中共路線。

劉纘周於八月中攜回日共指令。指令中規定，如果黨的幹部犯下機會主義的錯誤，黨應該召開大會加以改正；在黨的正式組織之外，另外成立

改革同盟是一項大錯誤；反帝同盟或是赤色救濟會的組織尚未成立，而文化協會並未淪爲反動組織，不應該被解散。最後並指出，東方局沒有理由指揮改革同盟的成立工作。關於黨內派系鬥爭的基本問題，日共表示在未與東方局聯繫前不便表示意見⓭。

當劉纘周自日本返台後，謝雪紅已經被捕，他被迫與張欄梅、林梁材、廖瑞發、陳朝陽等人聯繫，討論黨的重建問題。從八月底開始，他們分發署名「台灣共產黨」的傳單，同時準備刊印《工農報》。十一月左右，劉和其餘人陸續被捕，他們重建黨的企圖也就雲消霧散了⓮。

另一方面，七月十九日謝祈年在宜蘭被捕後，黨中委蘇新躲在宜蘭，他感覺黨員之間的聯繫已被切斷，黨中央陷於毀滅狀態。八月底，蘇新指派盧新發爲東部地區負責人，負責重建黨中央，並開始解散文化協會各支部，以擴展黨的影響力⓯。蘇新隨後返回台北，指派林殿烈、張道福爲台北地區負責人，命令他們解放文協台北支部，以便改組爲赤色救濟會⓰。

日本當局展開對台共黨員的逮捕行動後，文協及農組這兩個台共外圍組織事實上已無法活動。農組竹崎會議通過的決議——譬如組織農業工會、解散文化協會、成立反帝同盟、出版《農民戰報》等，都已無法實現⓱。八月左右，台共中央委員會的活動完全癱瘓。

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前，日本在中國的軍事干涉愈來愈明顯，共產黨所謂的「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爆發的危機已迫在眼前。在這種情勢下，台共、文協及農組的成員認爲黨的活動不能夠停滯不前，八月九日農組幹部簡吉、陳結、陳崑崙，以及文協幹部張茂良、詹以昌等人在台中文協本部集會，做出下列各項決定⓲：

1. 尋找尚未被捕的中委成員，並與之聯繫。
2. 派遣代表前往中國大陸，以重建台共和中共或第三國際東方局之間的關係，尋求重建黨中央的指令。

3. 文協已經成爲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障礙，應該予以解散；農組已無法進行合法的活動，應將其成員轉移至台灣赤色救援會。救援會這個組織行將成立，應該藉著它的活動來重建黨組織。

4. 成立台灣赤色救援會籌備委員會。

詹以昌將上述協議交給蘇新審核後，九月四日他在彰化被委以選擇負責黨中央委員會重建工作的人選⓳。

九月中旬，蘇新在彰化被捕，成立不過短短四個月的台共中央委員會至此完全瓦解。

第二節　台灣赤色救援會的成立
(1931 年 5 月至 12 月)

(一)　台灣赤色救援會的起源

「赤色救援會」是非社會主義國家內廣泛支援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組織。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召開於一九二二年，會中卽決定創立救援共黨受難者的常設組織。一九二四年，第三國際第五次大會中確立赤色救援會屬於一個「非黨」性質的組織，並要求各國共黨予以支持。一九二四年七月，在莫斯科舉行這個組織的第一次世界大會。赤色救援會的角色不僅在幫助共黨運動的犧牲者及其家屬，並且以意識形
態的宣傳來聚集各類「非黨」組織，共同對抗所謂的「白色恐怖」⑳。

隨著反日社會運動的開展，受難者的數目日見增加，這種情勢導致一九二八年四月台共建黨大會通過有關「赤色救援會」的組織計畫。但是台共在建黨大會之後，隨即遭到第一次破壞，無法實際推動該項計畫。當時在台共影響下的文協和農組卽企圖組織赤色救援會，後來因爲這兩個組織的幹部被捕，使得赤色救援會必須迅速發生作用。

一九三一年五月台共臨時代表大會也在新的政治大綱中提到「救援會的工作」㉑，但事實上，從該年三月開始——當時黨尙未重組完畢——日本當局已經逮捕了一些黨員；從六月開始，逮捕的行動遍及各階層組織，殘存的黨員因而開始考慮運用赤色救援會作爲重建黨的一種方法。而且從一九三一年起，文協和農組的活動受到嚴厲的取締，無論是合法或非法的活動都受到壓制，多名幹部並且遭到逮捕，有些人因此重新考慮組織赤色救

援會以進行鬥爭的想法。

於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三日，包括詹以昌、陳崑崙、簡吉、顏錦華、湯接枝在內的台共黨員，在農組台中本部集會。他們在審度情勢後，決定透過文協和農組進行赤色救援會的組織籌備工作，並以簡吉爲負責人㉒。

六月逮捕行動後，與左翼組織有關的人士都遭到監視。同年八月，台共中央委員會完全陷於癱瘓，組織赤色救援會的工作因而變得日益急迫。因此，簡吉於八月九日在台中文協本部召開「台灣赤色救援會組織協議會議」。在會議期間，簡吉強調救援會的組織與台灣的革命運動有重要的關係，並要求將赤色救援會的活動作爲國際赤色救援會的一部分。這個會議並通過以下決策㉓：

1. 赤色救援會組織案。文協和農組各地方負責人應同時出任赤色救援會的組織者，並應設立籌備委員會，由「班」而「隊」，擴大成爲全島性組織。
2. 提名中央委員會負責人名單（簡吉、張茂良、陳崑崙）以及各區域組織負責人。
3. 出版機關刊物，以陳結爲負責人。

㈡ 籌備委員會的成立與活動

依照八月九日的決議，簡吉、陳崑崙、張茂良、詹以昌開始秘密地往返各地，一方面與同志取得聯繫，另一方面傳達指示，並聽取同志的意見。詹以昌在與台共僅存的中委蘇新取得聯繫後，奉蘇新命令解散文協並組織赤色救援會。九月四日晚間，簡吉、顏錦華、陳結、陳崑崙（以上爲農組成員）、王敏川、張茂良、詹以昌、吳丁炎（以上爲文協成員）聚集開會，

會中決定赤色救援會臨時委員會包括下列七人：簡吉、張茂良、詹以昌、陳崑崙、李明德、呂和布(簡、張、陳被選爲委常，簡擔任委員長)。在地方組織方面，每個「班」包括十人，每五個班構成一個「隊」，每個班和隊應有一名負責人，隊的負責人組成中央委員會，在全島都設有地方性組織後召開大會，設立中央機構，各地方組織負責人也由此獲得任命㉔。

赤色救援會籌備委員會召開會議後，詹以昌、簡吉、陳結、陳崑崙、張茂良和王敏川等人決定組成台共臨時中央委員會，同時派遣一名同志前往上海，經由翁澤生以獲取東方局的指令。黨臨時中央委員會特別著重赤色救援會的活動，期盼藉此將黨加以整建㉕。

一九三一年四月開始，黨員兼農組中委陳結成功地建立兩個救援會地方支部：嘉義和小梅，並逐次將竹崎農組會員移轉至前述二支部。在參加八月九日召開的赤色救援會籌備會議後，陳結返回竹崎即開始組織「班」和「隊」，九月初他召集了八十名會員，分爲十一個班。在嘉義和小梅，他同時召集了四十五名會員，分爲七個班。林銳自從被提名爲曾文和北門兩支部負責人後，組織了四個班，並爲赤色救援會籌募到經費㉖。李明德原已會同莊守，於四月和六月組織了兩個共黨讀書會組織㉗，到九月中，他也組成三個救援會的班，但莊守於九月十八日被捕後，這活動也宣告中止。

另一方面，吳丁炎在北港，呂和布、黃石順、張玉蘭在高雄，林水福、張庚申在台中，江賜金在台北，李振芳在羅東，這些人都徵募了不少會員，總共成立了五十六個「班」(每班五至十人)，合併成十六個「隊」(每隊二至五個班)㉘。

㈢ 逮捕赤色救援會會員

陳結負責出版刊物，他籌募了一筆經費，從九月起，在陳神助的協助下出版《眞理》第一號及《二字集》、《三字集》；次月中旬，又出版《眞理》第二號和第三號。赤色救援會有志於組織工農大衆，因爲他們的教育程度比較低落，所以這些出版物（特別是《二字集》和《三字集》）是以台語撰寫的，便於瞭解與記憶，也便於傳播共產主義。這些刊物的散發是秘密的，只有在執行逮捕的時候，日警才發現有許多人熟讀這些字句，並且朗朗上口，因此可以推論有很多人收到並閱讀過這類刊物㉙。

自從文協和農組組織赤色救援會後，日本當局派遣密探試圖揭開這種活動的眞正面貌。九月間，日警在小梅一家水果店發現一本「三字集」，經過偵訊搜查後，擔任發行工作的林水福、擔任編輯的陳結和陳神助分別於十一月和十二月被捕㉚，隨後領導人物以及涉及成立赤色救援會的文協和農組成員都落入日警手中。被捕的人數高達三百一十人，其中一半被移送法院，有五十三名出庭受審，包括文協領袖王敏川、農組領袖簡吉，以及這兩個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和成員等等。

在這五十三人當中，有八名涉及台共事件而被分開審判，其餘四十五名被指控參加赤色救援會運動，分別判處二至七年有期徒刑，其中數名處以緩刑㉛。我們可以在表三中發現四十五名被控參與赤色救援會活動人員的教育程度。

這個表可以讓我們瞭解台共組織成分的情形，四十五人當中只有五個人屬於中等教育程度，四個人是文盲。就整體而言，他們的教育程度低於「台共事件」被起訴的人㉜。然而，儘管逮捕事件不斷，這些人的勇氣以及重建黨務的決心是非常驚人的，也震驚了日本當局㉝。

表三　參與赤色救援會人員教育程度表

教育程度	人　　數	百分比(%)
高等教育	1	2.2
中等教育	5	11.1
初級教育	35	77.8
未受教育	4	8.9
總計	45	100

註：平均年齡：30.3 歲

資料來源: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頁796—799資料製成。

第三節 武裝暴動的嘗試與黨的覆滅 (1931年5月～1932年4月)

一九三一年五月臨時大會召開時，台共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除了更換領導人及改變戰術外，同時採用武裝鬥爭的策略，試圖建立一個蘇維埃政權，並打擊日本統治者的地位。在成立赤色救援會的運動過程中，陳結與吳丁炎即分別進行，準備以新竹州的大湖和竹南兩農組支部爲基礎，嘗試推動武裝鬥爭策略。

㈠ 大湖和竹南武裝鬥爭的嘗試

在新竹州的大湖庄、南湖及馬那邦附近的土地和森林，原來由台灣農民耕種開發。台灣總督府經過一番調查後，由於原耕種者無法提出所有權狀，這批土地和森林卽爲日本官方充公。一九二五年四月，大湖庄公所獲得這批土地的所有權，六月卽對在其土地上耕種的農民課以極高的地租，這使得農民和庄公所間爆發了爭執。同年十月，在郭常和簡吉指導下（當時他們分別是鳳山文協和農組的會員），農民提出歸還土地所有權否則減少地租的要求㉞。一九二七年底，爲了領導這場鬥爭農組大湖支部於焉成立，成立之初它的會員只有二十八位，但是經過一年努力後，會員人數驟增爲四倍。

然而，由於一九二九年「二一二事件」的緣故，大湖支部的領袖被逮捕，會員也隨之星散了。直到年底大湖支部才又恢復活動，劉雙鼎獲選爲負責人㉟。在台共黨員簡吉和郭常領導下，台共極力掌握

這個農組支部，並使這個組織慢慢地左傾㊱。

一九三〇年五月，劉雙鼎參加北部地區第一次擴大中央委員會會議，會議期間，在台共的提議下，農組採用了新的「行動路線」。自劉返回大湖後立即重組支部組織，重視宣傳共產主義及徵募會員的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農組在嘉義竹崎秘密召開擴大中央委員會會議，會中通過支持台共的決議，使得農組事實上成爲台共的外圍組織。二月，擴大中委會議在台北舉行，劉雙鼎偕同簡吉、湯接枝……等人前往參加，竹崎會議通過的決議案獲得批准。劉雙鼎返回大湖後召開一項支部委員會會議，決定基於竹崎會議的決議徵募積極份子，進行武裝鬥爭的準備工作。一九三一年五月，劉雙鼎唯恐被捕乃在農組的命令下潛往新竹州竹南郡的永和山；林華梅取代他的職位，出任大湖支部負責人㊲。

一九三一年一月，張阿艷和呂鴻增在郭常和湯接枝的指令下，重新組織三十個左右的農民，並成立永和山臨時支部。這個支部通過農組本部採用的決議，決定支持台共；自劉雙鼎抵達後農民運動益形開展，八月，這個永和山臨時支部被農組本部確認爲竹南支部，劉雙鼎被選爲支部負責人，在郭常的協助下，他與農組本部和大湖支部建立了關係。依照「班」與「隊」的原則，他改組了支部組織並極力擴展黨的影響力。隨後支部會員要求加入共產黨㊳，劉雙鼎因此被台共臨時中央委員會任命，派其前往中國大陸充當兩地的聯絡人。他原定九月動身，但受阻於日人嚴厲的監視不克成行而不得已放棄了這個計畫，並於九月底返回永和山，進行武裝鬥爭的組織工作㊴。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滿州事變(即九一八事變)後，中、日對立的情勢日趨緊張，台共臨時中央委員會企圖透過赤色救援會的組成來重建黨組織，此時救援會的會員們已開始接受軍事訓練。簡吉、

陳崑崙在郭常的協助下,命令林華梅和劉雙鼎準備暴動。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日又爆發一場新的衝突,世界緊張局面達到高潮。這兩個支部的黨員認爲「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將無可避免,這種情勢是台灣採取武裝鬥爭的一個大好機會,中共武裝力量將趕來援助這個行動㊵。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林華梅在一項會議中決定將大湖支部解散,其中的會員已悉數加入台共;他同時確立一項攻擊計畫,選定目標及負責人,並著手組織軍隊。從二月開始,竹南支部也開始這項革命工作的訓練計畫㊶。

三月初,一位在大湖值勤的警察陳卓乾,從其親戚中得知這項暴動計畫後,向主管鍾日紅提出報告,報告最後送至新竹州負責人處,交給特高警察部門親自處理㊷。

四月十二日,日警逮捕五十餘名涉及此事的嫌犯,劉雙鼎僥倖逃脫,但是五個月後(九月二十二日)也在竹東被捕。總計有九十二名嫌犯在大湖和竹南被捕,其中七十一人送至檢察庭,從一九三三年二月開始有三十七人陸續送至法院受審。一九三四年七月預審完畢,這些人分別被處以二至八年的有期徒刑,只有一人遭到釋放,這次事件的主要領袖劉雙鼎、郭常、邱天送等人則被宣告「死亡」㊸。我們在此繪製了大湖和竹南事件被起訴人的教育程度表(表四)。

暴動計畫在實行前即被日警偵知,這不僅使得台共無法達到一九三一年所擬定的目標,還使台灣的農民運動走上了絕路㊹。前表使我們瞭解到,這個計畫所鼓動的絕大多數都是農民文盲。日本當局判處這批人爲無知的農民,盲目地聽從幹部的宣傳,追尋「革命」以及配合中共軍隊在台灣的行動㊺。我們可以據此認爲,台共即使在其遭逢毀滅的階段,仍然在鄉村地區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表四　大湖、竹南事件涉案人教育程度表

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初級教育	16	43.2
未受教育	18	48.6
未指明者	3	8.1
總計	37	100

註：平均年齡：36.3 歲

資料來源：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頁 812、813 的資料製成。

然而，依據台灣作家吳濁流的回憶，所謂「革命計畫」純屬虛構，是鍾日紅一手編造的故事。鍾是吳濁流個人熟識一位台籍警察，爲了貪圖較高的官位，所以替農民們設下這個陷穽。依據吳的觀察，憤怒的農民幻想得到中國方面的幫助是非常可能的，而這一類談話內容傳抵鍾的耳中，致使鍾產生製造這個「事件」的意念㊻。

在日本統治期間，類似這樣毫無根據的控訴，由於統治者的猜疑心理所造成的冤獄尙有多起。譬如一九二二年彰化募兵事件，一九三七年（海外返台人士激發）的華僑事件以及一九四一年的東港事件㊼。大湖和竹南事件可能是經過編造的，但是直到目前爲止，我們尙未發現可資證明吳濁流所述的有關文件，因此我們僅能依據所熟知的唯一文件來了解，那就是日本人所記載的資料。

(二) 台共的覆滅

經過一番黨內鬥爭後，台共重新整頓組織，新的領導中心在一九三一年五月臨時代表大會召開後已經成立，但是隨後不久，日本當局從六月開始展開了全島的反共行動：中日九一八事變之前，黨的主要領袖都已被捕，新的黨中央也受到摧毀的命運。刼後餘生者以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爲基礎，組織赤色救援會，以十個人爲一「班」、五班爲一「隊」的組織方式，進行黨的重建工作。他們又組織農民進行武裝暴動，藉以推翻日本的統治，日本當局持續的壓制，終於使所有重組黨的努力與盼望歸於幻滅，黨的後繼者與第三國際東方局的聯繫也告中斷。在大規模的逮捕行動之後，日本當局已有理由宣稱共黨組織已完全消滅，台灣的治安已無問題㊽。

我們現在來檢視台灣以外的台共情勢。一九二九年東京「四一六事件」過後，台共東京特別支部也遭到破壞，有些台灣科學研究會的會員確實想重組該研究會。當台共黨員林兌獲得釋放後，他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召集東京的台灣留學生開會，試圖成立一個民族解放組織，這樣一個組織違反一國只能有一個黨的原則，會議之後遂無下文。因此，東京的左翼台灣人逐漸轉向於以無產階級爲軸心的文藝活動㊾。

至於中國大陸方面，上海讀書會事件後，林木順和翁澤生仍然積極地活動。一九二九年六月，他們在法租界成立所謂的「上海台灣青年團」，這個團體於一九三一年四月改名爲「旅滬台灣反帝青年同盟」，與中共聯繫而進行活動。一九三一年九月，共同租界工部局警察逮捕了它的會員，這個同盟遂遭受破壞㊿。福建方面，在林木順、翁澤生和蔡孝乾的指導下，該地成立了「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聯合會積極分子又在一九三一年六月，另外成立「廈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但是和上海反帝同盟命運一樣，隨後

即遭日警破壞[51]。曾經多次從日警逮捕行動中脫逃的翁澤生，最後終於落入共同租界工部局警察手中，旋被押往台灣[52]。

簡言之，不管在台灣、日本或中國大陸，我們都沒有發現有關台共重整的活動資料。

日本當局在採取行動對付台共之前，已經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台灣民衆黨第四次大會時將民衆黨解散[53]。民衆黨的領袖蔣渭水是一位信仰孫文三民主義的醫生，他於同年八月死亡，他的死使民族主義運動受到致命的打擊[54]，此後不再出現這類性質的運動。台灣的大地主雖然推動有限度的自治運動，舉辦象徵性的活動，然而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前，他們的活動也已告結束[55]。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沒有一個眞正的反日組織重新出現在台灣。

—— 第六章註解 ——

❶支部由三名日籍黨員負責組織：吉松喜清、宮本新太郎、津野助好。參閱《台共秘史》，頁60—61。

❷謝祈年，台北人，1931年1月當選文化協會中央委員會委員，由蘇新吸收入黨。他在年底組織了礦工工會，參閱《台共秘史》，頁63。

❸《台灣新民報》351期，1931年2月14日，頁14；352期，1931年2月21日，頁13。

❹《台灣民報》360期，1931年4月18日，頁3；361期，1931年4月25日，頁3。

❺〝台灣共產黨事件〞，頁1；《台共秘史》，頁7。

❻同上。

❼郭乾輝，頁42。

❽同上。

❾〝台灣共產黨事件〞，頁2。

❿《沿革誌》，頁734—737。在判刑名單中，判刑最重的是潘欽信，十五年；其次，謝雪紅(謝阿女)十三年；十二年的三人：蘇新、王萬得、趙港；十年的五人：陳德興、蕭來福、顏石吉、簡吉、劉守鴻。另外，翁澤生1932年在上海被捕，送回台灣後判刑十三年。參閱《沿革誌》，頁737—739。

⓫《台共秘史》，頁30—31；《沿革誌》，頁740。

⓬《沿革誌》，頁740。

⓭《沿革誌》，頁741。

⓮《台共秘史》，頁8—9、58；《沿革誌》，頁741。

⑮《沿革誌》，頁748—749。

⑯同上，頁749—750。

⑰同上，頁750—751。

⑱同上，頁751。

⑲同上，頁750。

⑳鄭學稼，第三册，頁1233—1234。另參閱：Witold S. Sworakowski,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its Front Organizations (Stanford, Cal.: The Hoover Instituti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65), p.440. 有關「國際赤色救援會」的註釋。

㉑參閱新的政治大綱，見《沿革誌》，頁731—732。

㉒《沿革誌》，頁769。

㉓同上，頁768—770。

㉔同上，頁770—771。

㉕同上，頁751—752。

㉖同上，頁771—773。

㉗〝社會科學研究會一覽表〞，見：《沿革誌》，頁755—756。

㉘參閱《沿革誌》，頁766與頁767之間的插圖：〝台灣文化協會農民組合陣營ト赤色救援會組織運動ノ發展〞。

㉙參閱《沿革誌》，頁776—777，《三字集》係以口語的台灣話韻文撰寫，描述勞苦的「無產者」、「勞動者」的艱難生活與被壓迫的情景，分成上、下兩卷，全文收入：《沿革誌》，頁777—780。

㉚《沿革誌》，頁796。

㉛同上，頁796—797。

㉜參閱第三章第三節的圖表（表二）。

㉝參閱〝赤色救援會檢舉に關する石垣警務局長聲明〞，見：《沿革誌別

編》，頁 681—682。

㉞《抗日篇》，頁 72。

㉟《沿革誌》，頁 800—801。另參閱，〝大湖竹南事件の概要〞，《台灣警察時報》，1934 年 8 月，頁 14。

㊱郭常，苗栗人，1925 年加入文化協會，1927 年底獲選爲文化協會苗栗地區的負責人，1931 年 1 月，文協第四次代表大會中，獲選爲中央委員會委員。參閱〝大湖竹南事件の概要〞，同上，頁 143。

㊲同上，頁 141—142。

㊳同上，頁 143。

㊴《沿革誌》，頁 807—808。

㊵《大湖竹南事件の概要》，同上，頁 143—144。

㊶《沿革誌》，頁 805—810。

㊷〝大湖竹南事件の概要〞，頁 148—150。

㊸判刑名單見《沿革誌》，頁 812—813。

㊹E. Wickberg, 〝The Taiwan Peasant Movement……〞, p.567.

㊺〝新竹州暴動計畫に關する石垣警務長聲明〞，見：《沿革誌別編》，頁 682—683。

㊻吳濁流，〝台灣連翹〞。《台灣文藝》10 卷 40 期，1973 年 7 月，頁 84—85。

㊼《抗日篇》第三章(頁 54—57)，對此三案件有詳細的描述。

㊽〝大湖竹南事件の概要〞，同上，頁 152。

㊾《沿革誌》，頁 52—53。

㊿同上，頁 814、851—852。

51同上，頁 858—860、868、871。

52參閱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警察編纂，《上海に於ける日本人台灣人の共産主義運動史》中有關翁澤生的記載，見：《沿革誌》，頁 853—854。

㊸《台灣新民報》352 期，1931 年 2 月 21 日，頁 3。

㊹黃煌雄，《台灣的先知先覺者……》，頁 170。

㊺葉榮鐘等，《台灣民族運動史》，頁 491。盛清沂等，《台灣史》，頁 693。

第三篇

台灣共產黨
與第三國際、日共
及中共的關係
與台灣政治運動、
社會運動的關係

第七章
台灣共產黨
與第三國際、日共、中共的關係

第一節　第三國際控制下的台灣共產黨

(一)　台灣的革命戰略

第三國際從成立開始，一直寄望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運動，並且將民族解放運動視爲世界革命的一部份❶。

列寧早已看出遠東地區的殖民地將是一個有利共黨滲透的廣大地區，因此在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中，決定組織一個「殖民地委員會」，並通過「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這個提綱爲遠東的革命策略提供一個發展的基礎，又因爲當時亞洲許多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傾向於共產主義和俄國的革命經驗，它在蘇維埃領袖的心目中更具重要性❷。

共黨運動傳抵台灣的時間很晚，是由留學日本和中國且參加國際共黨運動的台灣學生傳回島內的。台共於一九二八年成立，它毫無疑問地是基於第三國際所通過的意識形態和策略來進行活動，並接受第三國際的領導。

第三國際分析當時日本的現象後，將帝國主義對亞洲的控制和破壞殖民地可以解放亞洲前途這兩件事，密切地牽連在一起，使得所有企圖分離這兩種現象的努力都遭到失敗，並且使問題複雜化了❸。

第三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在有關殖民地的政策中最特殊的一項是殖民地完全獨立的原則❹。

這個主導思想在台共一九二八年政治大綱中重新出現，大綱中強調台灣人民的獨立以及建立「台灣共和國」的主張❺。

因此，台灣的革命策略應該做到自殖民地的桎梏中求得解放，而此項解放不應該屬於中國革命的一部分，也不是日本革命的一部分；台灣的革命應該被視爲一個獨立的現象。基於台灣的革命爲求取本身獨立的看法，日共領袖渡邊政之輔、佐野學在討論台共成立以及草擬台共「政治大綱」時，傾向於主張台灣的獨立建國。

台灣人民的歷史顯示出❻，台灣主要是來自中國南方的移民所形成的，因此「台灣民族」的傳統和「獨立的傳統」，在歷史上一向很薄弱❼。

台灣民族的概念既然尚未穩固，台共通過的策略自然是取材自第三國際的指令。第三國際考慮到這個島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事實，所以將它放在與中國不同的基本地位來考量❽。

第三國際因此決定將台灣共產黨的組織工作置於日共的指導下，而不將他們置於中共之下，一九二五年謝雪紅與林木順留學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KUTV)時，編在日文班而非編在中國班的原因也就在此。同時，台共在一九二八年成立時所通過的政治大綱，將這個決定給予具體化❾。

在這個階段，親中共與親日共份子之間的不合已經存在。但是，直到目前爲止我們尚未發現，當時已是中共黨員和上海左翼台灣人領袖的翁澤生，他對第三國際要求日共協助台共的策略有任何形諸文件上的反應。同時，領導台共建黨成立大會的中共代表彭榮，在第三國際的絕對權威之下，

也沒有抗拒這個策略。最後，當一九三一年台共在第三國際東方局指導下重新改組時，這個有關台灣革命的策略並沒有被改變。

西元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由於中國聯俄容共政策的失敗，第三國際的殖民地革命策略面臨一個困難的階段，第三國際重新評估民族資產階級所扮演的角色。一九二八年二月第三國際執委會召開第九次全會，這次會議是第三國際左傾的一個決定性轉捩點，它採用了布哈林(Bukharin)在蘇聯共黨第十五次大會提出的「階級對抗階級」的口號，「統一戰線」的策略被認定是錯誤概念下的產物，旋遭放棄❿。因此，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拒絕了與民族資產階級聯合的策略。它甚至更進一步，不僅拒絕了改革主義的民族資產階級，同時對小資產階級也極端的不信任，認爲當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願望獲得滿足後，他們的大多數必定也準備放棄革命的鬥爭工作。大會決定捨民族問題而強調階級問題，以便在工農蘇維埃的基礎上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並朝向社會主義革命發展⓫。

由於第三國際策略的變化，很明顯地，台共創立時所採的策略已經無法延續下去。在台共的看法，台灣的民族資產階級仍然保有反日的革命性格，但是台共並沒有爲鞏固這項性格而提出相應的政策⓬。

台共僅確立台灣革命運動的主要力量，將來自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合力量。它考慮到目前的革命是一種民族民主革命，但是此種革命頗具社會主義革命的遠景，因此，所謂「工農政府」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應該於適當時機提出來⓭。

前述事項清楚地指出，台共雖然在第三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會議之後成立，但是它所採用的却是先前的策略路線。

(二) 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和台共的改革

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檢討了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認爲整體而言殖民地的共黨活動最爲脆弱。事實上，多數的殖民地並沒有眞正的共黨組織，當它們成立以後，這些黨只是一羣領導人的集合體而已，並不能獲得大衆的支持⑭。因此第三國際決定增強殖民地的共黨活動，庫西寧(Kuusinen)起草的所謂〝庫西寧提綱〞於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獲得大會通過採用。這個方案主要在指出「客觀的革命形勢和主觀因素薄弱，如何克服兩者間極其顯著的不平衡是共產國際最重要的任務之一」⑮，同時「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共產黨組織的建立與發展」也是共產黨目前最根本的任務⑯。

國際共黨因此於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間，對亞洲各殖民地採取一種更激進的策略。譬如越南，當時共有三個不同的共黨組織（分別在北圻、中圻、南圻)，第三國際派遣阮愛國（胡志明）於一九三〇年抵達香港，聯合三派共黨組織成爲越南共產黨，作爲法國共產黨的一個支部⑰。同年十月該黨改名爲印度支那共產黨，成爲第三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⑱。

台共於一九三一年的重組與此情形相同，它依據的是第三國際有關亞洲殖民地共黨組織成立和重組的原則，並聯結黨內反謝雪紅的勢力。這種可以上溯到台共建黨之初的對立，不僅加劇了黨內鬥爭程度，也促使改革同盟成立⑲。

實際上，台共放棄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含混態度，認爲民族資產階級是與帝國主義妥協的反動團體，構成台灣革命的一個障礙；它同時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意念下，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與武裝鬥爭⑳。

庫西寧的提綱同時指出，建立在無產階級之上各殖民地國家的共產黨，應該正式而有效地成爲第三國際的獨立支部㉑。此舉是爲了去除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人民的猜疑與不信任。因此大不列顚(Grande Bretagne)與印度

共黨應該形成兩個不同的黨，雖然英國共黨實際上負有指導印度共黨的任務；同樣地，突尼斯與阿爾及利亞的共黨也應該脫去法國共產黨支部的角色㉒。

至於台共，它從創立之初即遵循爲日共民族支部的指導路線也因此改變了。不再有任何文書資料提及台共是日共的支部。雖然台共並沒有獲得新的地位，但仍應成爲一個獨立的黨，像其他殖民地國家的共黨一樣，成爲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事實上，除了東方局於一九三一年三月發出的「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外，我們沒有發現任何文件足以證明台共爲第三國際諸多支部之一的事實。無疑的，這是因爲台共臨時代表大會召開後即爲日本當局完全摧毀的緣故。

儘管我們觀察到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一年兩個政治大綱適用上的差異，台灣革命的這個策略始終未變，台灣是以一個獨立的單元而參與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的。

然而第三國際策劃的戰略最後並未能達到：事實上，改革同盟的成員遵從東方局的指示，排斥由謝雪紅指導的「關門機會主義者」的政策，在迅速擴大黨組織的目標下，遵循「開門的急進主義者」的路線，以配合「資本主義第三期」的新情況，這種作法事實上加速了台共的毀滅。

第二節　日共指導下的台灣共產黨

㈠ 殖民地解放政策

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就淵源來說，是受日本大正民主時代（一九一二～一九二六）的影響㉓。事實上，日本這時也是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階段，它在台灣左翼運動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一個不容忽視的角色。這些左翼運動也受到中國的某些影響，中國在當時狀況下正處於一種革命運動的起步階段，但日本的殖民地政策企圖切斷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聯繫㉔，使得日本的影響力自然變得更直接、更重要。

一九二〇年代當中，包括社會民主黨的日本無產階級政黨，曾經譴責日本的殖民政策，同時爲了解放被壓迫的人民，要求停止種族歧視㉕。一九二二年日共成立，在討論日本殖民地問題的日共提綱中，只要求「日本從朝鮮、中國、台灣以及庫頁島撤軍」而已㉖。在這個階段，尚未觸及殖民地獨立的問題。

一九二一年台灣人開始進行一項自治運動，他們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請願書，要求設立台灣議會，這個運動受到日本自由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支持。自治運動於一九二七年遭到日共反對，當時認爲這是一個傾向獨立的運動。在這之前，日共領袖佐野學曾在東京青年會本部出版的刊物上發表一篇文章，呼籲支持台灣議會的成立，同時指出這是台灣人民走向自決的第一步㉗。

日共的重建是以一九二五年綱領爲基礎，雖然這個提綱規定朝鮮及其他殖民地獲得解放，但是直到一九二七年的綱領中才正式證實了這項進展。日共在〝一九二七年綱領〞中要求殖民地應該完全獲得獨立，同時明白要

求日共與日本殖民地解放運動維持密切的聯繫，以及供應他們意識型態和組織上的支持，並將此視為本身應負的責任㉘。

可以說，自從列寧提出〝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後，日共及其他共黨組織在實現「共產國際」的任務中都必須扮演一種角色，即幫助殖民地的革命運動㉙。

事實上，日共從建黨開始，即以傳播馬克思意識型態的方式，向日本的台灣留學生擴展它的影響力，這個事實與台灣人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的事不能說沒有關係。藉著日共指導下左翼學生組織的協助，一個社會科學研究部的組織成立了，並且在「東京台灣青年會」中逐步發展。一九二七年年底，青年會被左翼分子所控制，對於在日本的台灣人而言，這是共產主義運動中很重要的一步。同時，日共著手準備組織台灣共產黨的團體，日共承擔這項具體任務，不只基於意識形態的傳佈計畫，在歷史淵源上，也基於組織的發展計畫。當謝雪紅和林木順在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KUTV)就讀的時候，他們毫無疑問地與日共黨員有所接觸，在結束學業後，他們先返回上海，繼而前往日本，在同一時間返日的日共領袖德田球一，也負有在日共指導下籌組台灣共黨運動的任務㉚。同一時期，渡邊政之輔自莫斯科歸來，他在莫斯科接受了第三國際有關組織台灣共產黨的指示。因此，日共中央委員會決定創建台灣民族支部，作為日共的一部分，為了創立台共，同時採用由渡邊政之輔及佐野學起草的政治大綱和組織大綱草案。

(二) 組織關係的含混

儘管朝鮮和台灣當時都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台共的成立和朝鮮共產黨的成立方式畢竟有所不同。朝鮮共產黨重組於一九二一年，但一九二

五年才在朝鮮正式成立朝鮮共產黨，一九二六年被第三國際執委會批准成爲第三國際的支部㉛。

但是台共的成立却相當遲緩，而且是以日共的一個民族支部形式出現，這種差異可以下述方式加以解釋：歷史上，朝鮮即是一個國家與一個民族，這與台灣的情況並不相同（一八九五年第一次中日之戰後，清廷爲賠償日本損失而割讓台灣）㉜。

然而依據研究，我們認爲前述解釋並不能完全成立，在台共組織大綱中我們讀到：

「某些階段中，台共是以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形式組織起來。」㉝

在〝台共建黨大會宣言〞中却又提到：

「台共是一個以馬列主義武裝進行活動的革命政黨，它與世界所有國家的共黨組織一樣，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㉞

依據第一段引語，台共是日共的一個民族支部，很自然地它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次級支部(soussection)；但是依據第二段引語，它確確實實是第三國際的支部(section)，這兩段話顯然是互相矛盾的。

如果我們觀察上述文中所用的語句，譬如組織大鋼中的「某些階段」，我們可以說這種說法並非完全矛盾的，可以解釋爲在台灣方面有了正式的組織活動後，台共應該成爲第三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㉟。台共成立當時的第一批黨員，無疑的是期望台共成爲共產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只是當時台共尙缺乏任何共黨運動的組織經驗，一開始以日共支部的組織形式出現，是很重要的一個決定㊱。

依據佐野學的意見，台共當時並沒有共黨的組織，但是對台灣共黨團體而言，台共不失爲一個方便的稱呼，一般共產黨都應該成爲第三國際的支部，但是這種狀況當時並不適合台共㊲。

我們發現，從一開始日共和台共之間的組織關係就不十分明朗，況且

在台共創始黨員中已有一批人是中共黨員。這些狀況使得台共和日共之間的關係更加混淆。另外，台灣共產黨中的中共黨員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在台北成立中共台灣支部㊳，這些複雜的狀況很明顯地和台共日後的變化及黨內鬥爭相互有所關連。謝雪紅日後在改革同盟召開和控制的臨時大會中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這個事實連同上述狀況，也就是謝雪紅試圖重新建立台共和日共組織間正式關係，以對抗由翁澤生和王萬得組織的中共勢力的原因，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這個問題。

㈢ 日共指導力量的不足

台共作為日共的民族支部，應該接受日共的指導，但是事實上，從一開始它的指導力量即顯不足。當謝雪紅和林木順抵達東京，想從日共手中接受有關台共成立的建議時，日共當時正為即將於一九二八年二月舉行的議會選舉工作而忙碌，他們只取回台共兩項大綱草案，這種狀況使得他們必須尋求中共方面的指導與支持。

依據台共的成立過程，我們看到日共並未派遣代表，也未對台共建黨大會致送任何訊息。在台共建黨的前一個月，三月十五日的逮捕行會已經對日共造成嚴重的打擊，因此那些逃避逮捕的日共黨員必須隱匿起來，即使台共想獲得他們的支持或象徵性的出席，在那種困難的狀況下也是不可能的。上海當時是台灣共黨運動的中心，同時獲選為台共建黨地點，東京和這個城市地理上的距離以及聯繫上的困難，也在日共指令的傳遞上構成阻礙，但是與中共聯繫却比較容易，當時它的指揮位中心仍設在上海。

因此，由中共對台共提供援助變得較有可行性，台共成立後，佐野學在上海遇見一位中共中央委員。這位中央委員與幾位台灣人早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或三月間，即對台灣共黨團體的組織問題有過數次討論。由於日共

對「台灣同志」提供指導已變爲不可能，佐野學即對中共提出類似的要求[39]。

這項由日共要求中共給予台共的指導，在台組織中造成混亂，是造成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黨內鬥爭的因素之一。

一九二八年九月東京特別支部成立前，在日本當局嚴厲控制之下的日共和台共，都處於同樣的不穩定情況，他們之間的聯繫變得不正常，特別是一九二八年十月渡邊政之輔在台灣死亡後（他所負使命的目的直到今天仍不爲人所知）。

當特別支部在東京成立後，日共的指導變得具體而明確，當特別支部負責人陳來旺從上海返日後，他不但與台灣的「同志」保持聯繫，同時也將所收到的報告與消息傳達給日共中央委員會[40]。日共則交給他重要文件以及如「赤旗」機關刊物等傳單小册，讓他便於發展東京台灣人的共黨運動，同時藉著他們的努力，擴展到台灣本島[41]。

一九二八年年底成爲台共中央委員的謝雪紅接到日共的指令，與林日高、莊春火兩人在台灣組成黨的中央機關，並開除翁澤生系統的四名中共黨員。

在這個階段中，日共的指導佔了優勢。但是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事件不僅對日共造成一項嚴重的打擊，同時也摧毀了台共東京特別支部，使日共和台共之間的關係徹底絕裂。由於恢復與日共的聯繫甚爲困難，謝雪紅轉而趨向中共，造成第三國際的介入，引發黨的改革，最後翁澤生的系統重新建立黨的領導權，台共也不再成爲日共的民族支部，而直接聽命於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指導。雖然被開除黨籍的謝雪紅派遣劉纘周前往日本，試圖重新建立與日共的關係，以對抗翁澤生的系統，但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劉返台前，黨已經被日本人整個摧毀了[42]。

台共的領袖過於順從日共的指導，缺乏創造與獨立自主的精神，這些

弱點謝雪紅是瞭解的[43]。

此外，日共對台共的指導被證實是不充分的，這在謝雪紅心目中是台共落入「機會主義的錯誤」的第一個原因[44]。

但是這種指導力量的不足從日共的立場來看是可以理解的，在警察有效而持續的壓制下，日共與台共遭受相同的命運，在一九三三年即告被摧毀[45]。

依據我們的研究，日共似乎沒有對台共提供任何金錢上的援助[46]，台共中央機關因爲黨員有限，完全依靠台北國際書店的資助。台共在沒有其他維持生計的方法之下，應該會尋求財務上的支援，根據謝的說法，正由於沒有財務上的支援，所以台共無法召開大會以糾正「機會主義的錯誤」[47]。

第三節　台灣共產黨和中共的關係

(一) 台共和中共

在日本占領下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從開始到結束都證實與中共有密切關係。一方面，一九二八年台共成立前，當時正是中國政府聯俄容共時期，在中國的台灣學生開始組織反日運動，在中共的影響下，他們逐漸地傾向共產主義。我們看到一九二四年在中共指導下成立的「平社」，它的目標即是在台灣人中傳佈共產主義。中國大陸的台灣人組織裏，在上海成立的均受到來自中共不可忽視的影響，它們在台灣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中實在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一些台灣左翼積極分子，在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後，接觸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或共青團，這其中蔡孝乾、翁澤生、林木順、謝雪紅等隨後成爲台共第一批黨員。另一方面，台共接受來自中共方面必要的援助，如中共的彭榮更直接參與台共的建黨籌備工作和成立大會。台共瞭解中共支持的重要性，所以派遣翁澤生駐在上海負責與中共的聯繫。台共在一封致中共黨中央的信中，對台共與中共的關係有清楚地說明：

「台灣共產黨有很多黨員曾加入中國共產黨，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指導與訓練。因爲這個原因，台灣共產黨的成立與中國共產黨有很密切的關係，台灣革命與中國革命也有很多的關連。所以，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對台灣共產黨給予指導與支持，這是大會全體同志對中國共產黨最熱烈的要求」[48]。

正如同我們前面指出的，當台共成立的階段，台灣共產黨內部存在著兩種派系，多數派以翁澤生爲代表，與中共有密切的聯繫；另一派由謝雪紅代表，傾向日共。

以翁爲代表的集團藉著「無產青年」的協助，在台灣拓展共產主義的運動，這其中以蔡孝乾最爲特殊，直到一九二八年四月上海逮捕共黨事件使他不得不逃亡中國大陸爲止，這段時間他的工作十分有效㊾。因此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有一位台共黨員在台北創立中共台灣支部，其目的即在防止共產黨員分崩離散，這個支部努力發展它的組織，並形成兩個小組，一個在台北，另一個在台中㊿。一九二八年底台共中央機關在台灣重新成立，在謝雪紅控制下的這個中央機關，曾經企圖吸收這個中共支部。但是這種傾向於中共的態勢仍舊保存了下來。

我們因此可設想，假如台共不能在第三國際指導下作爲日共的支部，它毫無疑問地將以中共支部的面貌出現。

只有在台共與日共完全斷絕關係之後，中共對台共的指導地位才變得最爲重要。當時台共中央委員會派遣林日高抵達上海，藉著翁澤生的協助，試圖與第三國際恢復聯繫，造成中共擁有影響力的地位。稍後台共的改革是在中共的「建議」下實現，同時由中共支持的改革同盟來進行黨內改革。一九三一年五月黨臨時代表大會召開時通過一項決議，台共再一次證明其與中共的密切關係。實際上，臨時大會認識到，中國共產主義的革命經驗，對台灣人而言是重要的一頁課程，同時中共對台共的成立與改革所提供的支持與指導也有極大的國際意義。

然而，重建後的台共却遭到第二次的破壞，這是對台共致命的打擊，絕大部分的黨領袖和黨員都遭到逮捕和拘禁。至於那些逃過逮捕的人則潛返中國大陸，與中共黨員取得聯繫。依據國民黨的資料記載，當時中共福建省書記羅明曾經接獲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指示，在厦門接待並重組這些避難於福建的台灣共產黨員，然後將他們送往江西蘇區接受訓練[51]。因此，蔡孝乾於一九三二年離開當時紅軍包圍的漳州前往瑞金，後來獲選爲蘇區反帝總同盟主席，這個組織負責與殖民地人民的聯繫工作[52]。依據同一種

國民黨資料來源，中共當時決定派遣福建籍黨員返回台灣工作，負責重組台共的任務，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長征」之前，台共黨員多半在蘇區中接受訓練[53]。然而，依據我們的研究，在一九三二年以後一直到日本殖民統治終止前，我們並沒有發現台共在台灣有任何重組的跡象。

(二) 台灣地位的問題

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台灣人曾經推動多種不同的抗日形式。這些抵抗運動觸及到台灣前途問題，民族主義運動者考慮到下面三種可能性：

1. 繼續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並且向自治的目標演進；
2. 回歸中國；
3. 爭取獨立。

第一項考慮是承認日本的統治，在合法的範圍內推動政治運動以實現自治的目標，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台灣民眾黨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都依循了這個路線；但是，這些活動都暗含有台灣回歸中國的趨向。後兩項考慮則完全拒斥了殖民地政權，有時候他們的主張也相互混淆，認為台灣獨立是回歸中國的初步階段[54]。

「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和「建立台灣共和國」這兩個表示台共基本方面的口號，造成各人解釋上的分歧。某些人認為這兩個口號如果與其他台灣人組織的口號相比較，是對台灣前途的一項清楚而明確的聲明[55]；相反地，有人認為「獨立」這個名詞意指脫離帝國主義的統治，以及台共反對回歸到國民黨反動政權控制下的中國[56]。

關於這一點，由於台共當時「在中共的影響下以及協助下」[57]成立，所以看看中共的立場以及它同意這兩個口號或其原則的理由，是很有意思的，就我們獲得的資料考量它兩個口號不僅反映了我們上文已經談過的第

三國際建立的台灣革命策略，同時也反映出中共對台灣島和島上人民的觀點。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三年間，中共的黨領袖總是將台灣人民視爲一個「民族」，並且承認台灣民族解放運動是一種「弱小民族」的鬥爭行動，這個鬥爭與中國的革命並不相同，而且具有潛在的獨立自主權㊽。就台灣人獻身反帝國主義的鬥爭而言，他們確認這是一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獨立運動㊾。直到一九四〇年代初期，中共並沒有要求歸還台灣，反而對台灣的獨立運動給予支持。

當早期中共中央委員瞿秋白建議台灣共產黨改革黨務並修改黨的政策時，他也並沒有改變這項支持台灣獨立的原則。

有關中共支持台灣獨立的最重要資料，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澤東在延安與史諾(E. Snow)的一段話。毛在談話中談到收復失土的問題：

「中國當前的任務在於收復所有的失土，而並非僅在長城這一邊保衛我們的主權，這就是我們應該收回滿州。可是，這裏並沒有包括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在內。但是當我們收復中國失土、重新獲得獨立後，如果朝鮮人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枷鎖，我們將熱烈幫助他們的獨立鬥爭行動。同樣地，這項原則也適用於台灣。」㊿

這個談話內容並沒有將台灣包括在中國失土內，它承認台灣未來將走上獨立之路，這一點意義極爲重大。然而，從一九四三年開始，中共的立場已有所改變，當時開羅宣言公開宣佈，台灣以及其他的土地將歸還中國[61]。從這個重要的日子開始，中共開始認爲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從此拒絕台灣人的獨立自主權。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共特別強調台灣的解放問題，並且認爲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62]。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對台的統治也終止了。台灣開始處於國民政府的勢力之下，多數被日本人拘禁的台灣共產黨獲得釋放，中共當時

以「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進行重組與吸收的工作，以採取對抗國民政府的活動。依據國民政府資料來源顯示，這些活動是造成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直接原因。但事實並非像官方所說的一樣，有充分的資料顯示，戰後初期國民政府統治的腐敗，是造成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原因[63]。這個事件過後，謝雪紅逃至香港，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一九四九年她抵達北京，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委員，但是一九五七年在反右派鬥爭中，她被控以右派分子罪名，一九七〇年病逝於北京[64]。

最後，我們應該指出的是，我們以上所論述的台共，也就是基於殖民地範疇以及爲解放台灣而提出台灣獨立的政策方向的台共組織，在一九三二年被日本摧毀後就不再存在了。這時期以後，在中國的台共活動以及一九四九年開始由中共控制而以「台灣共黨分子」在台灣進行的活動，應該另外加以討論，不能把它放在我們所探討的這一段歷史中來加以考量。

—— 第七章註解 ——

❶ Pierre Broue (éd.), La question chinoise dans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1926—1927), 2 ème éd. revue et augm.(Paris : Etudes et documentation interntationales,1976), p.2.

❷史達林曾經呼籲，東方不應該被遺忘，因爲東方構成一個無窮盡的革命儲備力量，面對世界帝國主義，東方是最堅強的後衞。他強調，共產主義的任務在於喚醒東方被壓迫的人民，給予他們革命解放的精神。Cf. Stalin, "Do not forget the East" (Document 23), in : Eudin et North, pp.156—157.

❸ collotti Pischel et Robertazzi, p.16.

❹ Cf. "Theses on Japan adopted in the Session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intern on July 15, 1927", in : Beckmann et Okubo, p.308.

❺參閱附錄一。

❻台共政治大綱——開始即敍述「台灣民族的發展」歷史，指出原住民是台灣最早期的居民。這個原始居民居住的島嶼在十六世紀前半葉被西方先進國家荷蘭所佔領，而揭開了台灣殖民地歷史的序幕。其後，原住民被迫避入深山，接着，由中國南方移民台灣的漢人逐漸增多，台灣民族就逐漸結合形成了（參閱附錄一）。

❼參閱〝一九二八年台共政治大綱〞中的「三、民族獨立運動的形勢」。

❽若林正文，頁 139—140。

❾同上。

❿ Jane Degras(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Doc-

uments, réimpression(lère éd. 1960)(Plymouth / London : Franck Cass, 1971), t.2, p.424. Cf.: Jane Degras, "United Front Tactics in the Komimtern, 1921—1928", in: Footman(ed.), International Communism(London: Chatto & Windus,1960), p.9.

⓫ Cf. Carrere D'Encausse et Schram, pp.87—88. Cf, "Thèses sur le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dans les colonies et semi-colonies", in: Internationale Commuuiste, Thèses èt resolutions du VI éme Congrès de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réimpression (lère éd. Paris: Bureau d'Editions, 1928) (Milano: Feltrinelli, 1967), pp. 159—204.

⓬ 1928年的"台共政治大綱",把台灣社會分為九個階級,其中進步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中地主、自耕農,均保有「革命的傾向」。

⓭附錄一。

⓮ Degras(éd.), t.2, p.526.

⓯ "Thèses sur le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les colonies et semi-colonies", in: 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Thèses et résolutions du VIème Congrès……, p.188.

⓰同上。

⓱ J. Lacouture,Hô Chi Minh(Paris: Ed. du Seuil,1967), pp.44—48.

⓲ Cf. Decision of XIth Plenum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26 March—11 April, 1931), in: 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XIth Plenum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ses,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réimpression(lére éd. London: Modern Books, 1931)(Milano: Feltrinelli, 1967), p.28.

⓳若林正文,頁143。

⑳ 1931 年的〝台共政治大綱〞，見《沿革誌》，頁 721—723。

㉑ 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Thèses et résolutions du VIème Congrés……, p.198.

㉒ Degras(éd.) , t. 2 , pp.526—527.

㉓ Edward I-te Chen, 〝Formosa Political Movements……〞, p.477.

㉔矢內原忠雄，頁 86。

㉕ Oakley Totten, III. The Social Democratic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 (New Haven ／ London : Yale Universiey press, 1966), pp. 277—278.

㉖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Platform, 1922〞, in：Eudin et North, pp.330—333.另參閱：〝Draft Platform of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Novembre 1922〞, in：Beckmann et Okubo, pp.279—282.

㉗佐野學，〝台灣議會の設置を助けよ〞，《台灣》4 卷 3 期，1923 年 3 月，頁 37—40。 但 1933 年佐野學被捕時，他的立場一百八十度地轉變，並且譴責共產主義運動；他宣稱殖民地獨立和民族自決都是過時的布爾喬亞的觀點；在他民族主義的而非社會主義的觀念下，弱小民族如滿洲、台灣和朝鮮，應該繼續接受日本政府的統治，以享有相等的經濟利益和相等的權利。參閱：Beckmann et Okubo, p.247.

㉘ 〝Theses on the Japan adopted in the Session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intern on July 15, 1927〞, in：Beckmann et Okubo, ibid.

㉙ Carrere D'Encausse et Schrmam, p.267.

㉚王育德， 頁 126—127。

㉛但這項批准到了 1928 年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時才正式予以承認。Cf.

Dac-Sook Suh(éd), p.228.

㉜參閱山邊健太郎的註釋，見《台灣II》，頁19。

㉝〝台共組織大綱〞，見《沿革誌》，頁595；《台灣II》，頁256。

㉞〝台共建黨大會宣言〞，見《台灣II》，頁254。

㉟若林正文，頁139。

㊱附錄一。

㊲參閱佐野學第八次預審供述，見：山邊健太郎編，「社會主義運動III」，頁235。要成爲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履行21項「條件」。參閱〝Conditions d'admission des partis dans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in：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Thèses, manifestes et résolutions adoptées par le Ier, IIème, IIIème, IVème Congrès de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1919—1923), réimpression(lére éd, 1934) (Paris : Ed. F. Maspero, 1969), pp.39—41.

㊳〝台灣の黨組織活動方針及びその組織狀態〞，見《台灣II》，頁271—273。

㊴〝佐野學第八次預審供述〞，見：山邊健太郎編《社會主義運動III》，頁236。

㊵陳來旺所寫並交給日共中央委員會的報告，於日共領導人市川正一1929年3月16日被捕時，在他家中被發現。參閱《台灣II》，頁271。

㊶這些資料在特別支部遭到破壞時，被警察沒收並編有目錄。見：《台灣II》，頁93—95。

㊷《治革誌》，頁740—741。

㊸參閱〝謝雪紅在法庭的供詞〞，見《治革誌》，頁682。

㊹同上。

㊺Scalapino, p.43.

㊻日共只支付台共傳達者旅費，例如，謝雪紅派去日本的劉讚周，收到40圓作爲回台旅費。參閱《治革誌》，頁741。

㊼參閱〝謝雪紅在法庭的供詞〞，同上，頁684。

㊽〝中國共產黨中央に致せる信〞，見《沿革誌》，頁661。

㊾H. F. Snow, Book II., p.325。

㊿〝台灣の黨組織活動方針及びその組織狀態〞，見《台灣II》，頁273。另參閱：《台共檢舉顚末》，見《台灣II》，頁90、164—165。

(51)郭乾輝，頁43。關於羅明，參閱Donald W. Klein et Anne B. Clark, Biographie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t.2, pp.650—651.

(52)H. F. Snow, Book II, p.325.；E. Snow, p.103. 另參閱蔡孝乾，《江西蘇區……》，頁1—2。

(53)郭乾輝，頁43—44。

(54)1927年在廣東組成的台灣革命青年團主張台灣獨立，認爲中國的革命和台灣的獨立關係密切。但由於中國尙未有能力收復台灣，所以台灣面對日本的統治，應該先爭取本身的獨立。參閱張深切，《廣東台灣獨立革命運動史略……》，頁16。

(55)許世楷，頁330。王育德，頁127。

(56)山邊健太郎的註釋，見《台灣II》，頁26。

(57)張禹，《我們的台灣》(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頁85。再版。見：《台灣問題重要文獻資料集》，復刻編集版（東京：龍溪書舍，1971)，第二卷。

(58)Frank S. T. Hsiao et Lawrence R. Sulliv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tatus of Taiwan, 1928—1943〞, Pacific Affairs 52(3), autumn 1979, p.446.

㊾台灣民族解放所含的獨立性質，在1937年到1941年之間最爲明確，那時毛澤東強調中國革命的「國際」性。中共官方的決議以及黨員的私人談話中，都指出台灣在抗日鬥爭中佔有獨立的政治地位。Cf. Steven M. Goldste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olonial Areas : The view from Yenan, 1937—1941", China Quarterly (75), sept. 1978, pp.594—622.

㊿ E. Snow, Etoile rouge sur la Chine, trad. de l'anglais (Red Star over China) (éd. définitive revue et corrigée par l'auteur 1963). par Jacques Reclus (Paris : Ed. stock, 1973), p.88.

(61) 1943年的開羅會議，參加的有中國、美國和英國的領袖，其目的在協商如何於近期內打敗日本。參閱 "Document 12 : The Cairo Declaration, November 26, 1943", in : Hungdah Chiu (ed.),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 Documents and Analysis (New York/Washington/London :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p.207.

(62)有關中共政策改變的理由，參閱：Hsiao et Sullivan, pp.464—466 .依据 Moriyama Akio 的研究，中共於1940年代就有關未來國家的組成，改變了它的政策，不再主張「聯邦制」，而提出一個統一的中國的構想，因此反對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利。Cf. Moriyama Akio,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ttitude toward Formosa from 'Independance of Formosa' to 'Liberation of Formosa'" (Mitata, Tokyo :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12), mai 1974, pp.133—136.

(63)裴可權，"台灣之叛亂與覆亡"，《中央日報》，1980年5月10日，頁11；1980年5月11日，頁11。另參閱：郭乾輝，第四章。但是以另一種不同於官方說法的觀點描述的二二八事件，參閱 George K. Kerr, Formosa

Betrayed (London : Eyre & Spottiswoode, 1966), Part III, "Crisis and Aftermath".

64 參閱蔡文金, "爲謝雪江同志復仇!",《展望》1 期, 1958 年 4 月, 頁 24、26—27。另參閱:思民 "謝雪江、中共與台獨:詳述中共對台獨的新策略",《中央日報》, 國際航空版, 1980 年 9 月 8 日, 頁 3。謝雪紅死後十年, 她的罪名終於獲得中共的平反。參閱《人民日報》, 1980 年 8 月 7 日, 頁 2。



第八章
台灣共產黨
對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影響

第一節　台灣共產黨和文化協會

㈠ 台共對文協的政策

文化協會成立於西元一九二一年，被認爲是民族主義運動起源的一個主要組織。從草創至一九二七年左傾爲止，它擴展文化活動使台灣人民產生民族意識，爲台灣的自決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但是它最重要的任務却與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有關，同時它對工農運動的發展也有貢獻。簡單地說，在文化協會左傾之前，它就是所有在台灣內部發展的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大本營」和主要根源❶。

文協在一九二七年分裂後，領導權落入連溫卿和王敏川手中，但是一九二七年也是文協積極致力於成立工人組織的一年❷。到了一九二七年十

月，文協已成立二十三個地方支部，會員超過一千五百人❸。此外，它與農民組合的合作也促進了台灣左翼運動的發展。

由於這些理由，台共決定讓文協扮演一個主要角色（何況那時候台共尚未組成工農統一戰線）：

「竭盡全力吸收所有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建立一個以工農民衆爲中心的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工人、農民各階級的聯合體——大衆黨——的組織是不可或缺的。現在就必須暫時利用文化協會爲中心，作爲擴大共產黨活動的舞台。即一方面先克服它的幼稚病，吸收工農先進份子及青年加入文化協會，另一方面則極力暴露民衆黨的欺瞞政策，將受其領導的群衆引向左方，漸次以文化協會作爲革命統一戰線的中心，而到一定時機後再改造文化協會，組織大衆黨。」❹

蔡孝乾和洪朝宗這兩位具有文協重要領袖身分的台共中委，由於上海逮捕共產黨員事件而避難中國大陸，謝雪紅在一九二八年六月獲釋後，與文協其餘領袖聯繫並極力推動台共的影響力。

文協當時領導反抗日本當局的鬥爭，如同一九二七年的新竹事件，或者是一九二八年有關台南墓地的糾紛❺。由於許多領袖被捕，使得文協的活動趨於停滯；會員日趨減少，財務問題更形惡化❻，文協也漸漸衰弱下去。但一九二八年十月被捕領袖獲釋後，文協召開第二次大會，試圖恢復與重組文協的活動❼，雖然大會遭日本警察制止。中央委員會隨即於次年初召開會議，會議期間有人認爲文化協會不是大衆黨的組織而是與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共聯的思想團體❽。這個定義與台共賦予文協的角色混淆不清，顯示當時指導力量的分岐，台共在文協尚未獲得優勢的地位。

當文化協會企圖依照新的方向恢復活動時，它立刻捲入所謂的「二一二事件」，以至完全無法實現新的目標。

台共中央機關在一九二八年底成立時，決定加強自己在文協中的活動，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台共派遣吳拱照和莊守進入文協工作，負責文協黨團的組織工作❾。文協第三次大會召開時，台共已有在文協中建立領導權的準備計畫，這個計畫是吳和莊提出的，以「彰化支部的草案」的名義，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第三次代表大會中通過。依照這個草案，文協新的工作方向在團結城市居民和學生，使他們成爲台灣無產階級運動的外圍勢力，更直接的目的是加強壓制民衆黨和左翼民主社會主義分子的力量❿。

新的指導路線因此確立了下來，依據一位文協領導人物吳石麟的說法：「莊守的策略顯然是布爾什維克的指導路線，由於這個路線被一個和文協具有同樣命運的『組織』所支持，我們只有默默的同意」⓫。

在這種情勢下，文協的領袖接受了台共的優勢地位，更具體地說，有些共黨分子已經成爲文協指導機關的成員⓬。

㈡ 台共在文協中鞏固地位

從一九二七年開始，台灣的解放運動反映了日本和中國共產運動的鬥爭狀況。「山川主義」和「福本主義」之間的對抗，被第三國際採用的「一九二七年提綱」確定了誰是主流地位後，造成文協幹部的分歧並分裂成對立的兩個團體：

1.「上大派」（上海大學團體），以王敏川和上海學生爲代表⓭。
2.「非上大派」，以連溫卿爲代表。連氏早先即與山川均建立良好的私人關係，他的意識形態受山川主義影響，而當時王的陣營的意識型態則建立在〝一九二七年提綱〞上。當山川主義失勢後，連氏發現他在文協中的地位也跟着動搖，兩個團體的衝突乃日趨激烈⓮。

台共想建立它對左翼的統制權，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淸除阻擋這個目標的所有障礙。在林兌於一九二八年底召開的農組第二次大會特地由東京携回台灣的文件〝農民問題對策〞中，台共已斷言左翼社會民主團體——非上大派——是破壞左翼運動發展的毒素⓯。這就是爲什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文協第三次大會時，已在台共控制下的農組會散發一項「聲明」，控訴連溫卿擾亂農民組織以及「串通」日本當局的原因。這項抗議被大會接受，交由指導委員採取行動；最後，指導委員會決定開除連溫卿⓰，共黨在文協的控制權也從那時起確立了下來。

㈢ 大衆黨的問題和解散文協的論戰

台共在一九二八年政治大綱中，已決定文協的領導權並籌組這個大衆黨的組織，在一個決定下，一九二七年文協的左轉，已經爲文協改組成大衆黨邁出了第一步。

但是文協改組的計畫被認爲是錯誤的⓱，有些台共黨員於一九二九年年底提出解散文協的要求，依據他們的意見，文協轉變活動方向後，它的領導權已落在知識分子手中，而它的組成分子也是複雜的。自從文協成爲脫離大衆的指導機關以後，它已構成解散運動發展上的一個障碍。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年底，文協解散與否，因爲摻了民族解放運動策略的選擇問題，而僅限於理論層次上的討論而已⓲。

次年九月，當張新一抵達東京試圖恢復《台灣大衆時報》的出版時，晤見了日本左翼領袖，他們就文協的活動方向提出批評：假如文協像一個黨一樣進行活動，它還是解放比較好，以避免對無產階級的成長與發展造成障碍；否則的話文協也不應該再掌握工農運動的領導權⓳。

張新一果眞將這項批評帶回台灣，不久農組中的共產黨員公開提出有關文協解散的問題，造成左翼分子間的一項大論戰；有些人奢言立即解散，有些人認爲應該先設立一個左翼總工會來取代它，另外一些人則贊同成立反帝同盟組織用來包容文協成員。簡言之，關於如何解散文協每個人都在發揮議論，而並未考慮到台灣當時的實際情況⓴。

由於這個論戰，文協活動逐漸中止，人員也日見離散，王敏川偏向保留文協成爲城市小市民的鬥爭組織，這一點他得到謝雪紅的支持，爲謹愼起見，謝雪紅希望保留合法的鬥爭手段。然而，反對這項解決辦法的王萬得，正在秘密地召集年輕黨員反對謝的領導，所以他認爲目前與謝衝突仍屬過早。最後，王萬得和吳拱照與文協兩位主要領導王敏川和張新一達成臨時協議。王敏川一心一意想將文協改造成城市小市民鬥爭組織，這個提案被接受，並於一九三一年年初第六次大會中正式獲得通過。這場關於文協解散與否的戰論終告結束㉑。然而，對王萬得等人來說，這種解決辦法露出一種機會主義的傾向，直到台共生存的最後一刻，他們都堅決要求解散文協。

文協第六次大會選出的指導委員會新成員，多數是台共黨員，吳拱照和王萬得更獲選爲指導委員會常務委員，這再一次的說明台共對文協的控制力量。第六次大會決定由一項「行動計畫」取代一般大綱，以進行鬥爭行動㉒。文協在中央委員會秘密會議期間決定支持台共，事實上，文協得已經成爲台共的外圍組織㉓。

一九三一年，當改革同盟着手取得文協領導權後，文協領袖的態度日益激烈，文協的合法活動幾乎全然停頓，而且更加受到日本當局的鎭壓。由於王萬得等人努力擴充影響力，並組織赤色總工會，行動計畫的實現已成爲不可能的事。同年六月開始，逮捕共黨的行動遍及各地，文協和農組

的成員企圖成立赤色救援會來重組台共黨務，當一九三一年年底日警進行第二次反共彈壓時，文協中央委員會主席王敏川和一些重要幹部也相繼被捕。

總之，作爲台灣民族主義運動起源的文化協會，當它認同台共以後，終於也和台共一樣遭受到日本當局鎭壓的共同命運。

第二節　台灣共產黨和農民組合

(一)　台共掌握農民組合的控制權

在日本殖民政治初期，台灣人民占整個人口的百分之七十。雖然這個百分比隨着殖民地經濟的演化而日見降低，但農民總是占人口的大多數，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殖民階段的結束。

農民可以分爲下面三種類型：

表五　農民的分類（以千戶爲單位）

分類＼年份	總計		自耕農		半自耕農		佃農	
	單位	%	單位	%	單位	%	單位	%
1922	386	100	117	30.3	112	29.0	157	40.7
1928	406	100	118	29.1	125	30.8	163	40.1
1938	425	100	130	30.6	136	32.0	159	37.4

註：所謂半自耕農，在此指既是自耕農又是佃農。

資料來源：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台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台北：1946), 頁513, 表194。

佃農和半自耕農占農民總人數的百分之七十，地租過於高昂，高達農民收益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㉔，佃農並負有納稅的義務；儘管殖民地的農業有所發展，但是這個階層仍舊處在困苦的環境中。土地的所有權非常集中，一方面，百分之六十四的小地主每人所有土地不超過「一甲」（零點九七公頃），這些土地加起來不超過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四點三五；而占人口百分之零點一四的中地主和大地主，則占有百分之十六點六的土地㉕。另一方面，日本人占有台灣土地的百分之二十一，其中百分之七十屬於日本人所有的製糖工業㉖。台灣的農民運動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出來的。

一九二六年中期，當各地農民組合以「台灣農民組合」名義組成一聯盟組織時，民族主義的分裂正迫在眉睫。因爲日本農民組合和勞動農民黨的協助和支持，台灣農民組合的活動迅速地發展開來，這一點和其他台灣人組織大不相同㉗。農民組合依循日本的行動模式放棄被動的請願，除了鼓動農民大衆示威之外，並採取激進的行動。他們逐漸與狹義的民族主義運動分道揚鑣，並和階級鬥爭緊密的結合在一起㉘。

自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左傾後，在同年底農組第一次代表大會中，農組也宣佈自己將「馬克思主義化」。文協和農組二者成爲從事台灣階級運動的最重要組織。

農組成立後，蔗農和日人獨占的的糖廠之間，有關地租以及反對總督府將土地售予日本人等等的衝突都與日俱增，且於一九二七年達到最高潮。例如，有關地租問題的四百三十一次衝突事件中，有三百四十四件（佔79.8%）是由農民組合所領導的。

由表六可見農民衝突擴大的情形。

農組成立時會員超過兩千三百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召開第一次代表

大會前，會員有兩萬一千三百一十人，有二十三個支部組織。到了一九二八年年底第二次全島代表大會，會員人數已達兩萬五千名，共有二十六個支部、四個區域性支部聯合組織㉙。鑒於農組這樣的成長情形，台共認爲「農民組合實際上已經成爲台灣革命運動中戰鬥的、最大而且最鞏固的大衆組織」㉚。

表六　有關地租的衝突

	衝突次數	參與人數
1924	5	229
1925	4(1)	256(20)
1926	15(6)	823(505)
1927	431(344)	2,127(1,469)
1928	134(80)	3,149(2,745)
1929	26(5)	701(65)
1930	11	1,245
1931	18	1,533
1932	29	527

註：括號內之數，表示農組領導。

資料來源：淺田喬二,《日本帝國主義下的民族革命運動》, 頁55。

台共的草創時期也是台灣農民運動躍升的階段，當時農民組合被台共視爲發展共產主義的一個有利要素。在〝土地問題的重要性〞這份決議中——建黨時通過的指導農民運動的旨令，台共指出土地問題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但是農民不是革命的領導階級，相反地，他應該在無產階

級的領導下完成革命任勝㉛。

依據這項教條式的定義，台共注意到農民組合觸犯了以下錯誤：

——將農民視爲一種無產階級，認爲他們是台灣解放的主要力量。

——傾向階級鬥爭，否認民族主義革命的存在，而民族主義革命却是台灣解放的一個問題㉜。

爲了克服這些錯誤以及充分利用農組創造的有利情勢，台共決定派遣黨員加入農組，以擴大台共在其間的控制力量。爲了達到這個目標，謝雪紅提供了不少幫助。農民組合中央委員會採用了謝雪紅所提出關於加心農組組織的三項「工作概要」，這正是謝雪紅爲台共滲入農組提供貢獻的一個具體證據。

然而，農組幹部中存在着分岐情況，這種分岐情況特別表現在有關農民運動的戰術方面。所謂「幹部派」是由簡吉、趙港爲代表，偏向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這個綱領同樣影響了台共的基本方向。另一派是由楊貴領導，依循山川主義行動路線，主張在合法範圍內進行鬥爭，因而遭到〝一九二七年綱領〞的批判㉝。

這兩派的對立由於台共的介入而更加激烈，一九二八年六月，楊貴一派企圖與文化協會以連溫卿爲代表的山川主義支持者聯繫，却被逐出農組的領導層，這項紛爭持續到文化協會第三次大會，即一九二九年年底連溫卿被除名時爲止㉞。

當農組將於一九二八年年底籌開第二次大會時，木順當時正是黨的書記長，他在東京秘密發表〝農民問題的適當對策〞，並命令東京特別支部黨員林兌回台傳遞這項指示，用以幫助謝雪紅的活動。依照這對策，「土地還給農民」的口號將優先提出，工農聯盟也是最緊要的任務，對策中同時強調應將台灣農民運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聯繫起來㉟。

農組第二次大會雖然中途被日本警察打斷，但農組在台共的指導下陸

續通過了下述主張：

第一，農組的指導路線已由中央委員會，於會議結束之後秘密發行的「宣言」和「口號」中表露無遺，它與〝農民問題的適當對策〞中的原則相互配合㊱。

第二，爲了加強農組的組織工作，謝雪紅所做成立救援會支部、青年和婦女支部的建議，都在大會中獲得通過，並且開始逐步實施。

第三，農組的主要領導人楊春松、趙港、簡吉、陳德興、顏石吉被認爲是台共黨員，在農組第二次大會中分別獲選爲中央委員和中央常務委員㊲。

總之，無論從指導路線的確立、組織工作的強化，或職務的分配等觀點來看，農民組合事實上完全在台共的掌握之下，但是，日本當局在即使在這個時候也不瞭解台共和農組之間的關係，他們只注意到「台共的活動藉著農民組合而明顯的表現出來」㊳。

(二) 二一二事件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日本總督不得不正視農民運動的發展，然而儘管日本當局不斷的壓制（例如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中壢事件）農民運動仍日漸滋長起來㊴，因此日本當局決定要對付農組領導機關。一方面是爲了破壞農組的活動，另一方面藉以瞭解台共和農民組合之間的關係。這項撲滅行動發生於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後來被稱爲「二一二事件」。

這次事件使得多數農組領袖遭到日本當局的逮捕和拘禁，農組會員也因此銳減下來，只有兩個地方支部倖存：台南的下營和高雄的屏東還能夠繼續活動㊵。

台共想從這次事件獲得發展機會，派遣東京科學研究會的積極分子返台，進行農民組合的重組活動。一九二九年十月，台共中央委員會正式任命楊春松和趙港為農組黨團的負責人，加速吸收被釋放的農組領導幹部加入台共❹❶。有些可疑的會員被開除會籍，這種作為增加了農組激烈化的程度。另一方面，由於日本人監視力量的加強，使得合法的行動成為不可能，農組因此趨向秘密活動。為了重建農組，用盡了一切辦法，例如消息與鬥爭指令的秘密傳佈、未獲許可的議會以及私人間的聯繫等等❹❷。

(三) 台共影響下農民運動激進化

一九二九年年底，由於「二一二事件」後改變立場的中央委員會委員長黃信國，以及一些溫和派分子離開了農組，農組的指導機關因此在台共的監護下進行改造，簡吉、趙港、張行、陳興德、楊春松等被提名組成中央常務委員會，由楊春松出任主席職務。常務委員會採納趙港草擬的「行動計畫」，具體明示了在政治、經濟和國際的範疇內進行的鬥爭活動❹❸。

對農組來說，一九三〇年是「沉寂」的一年❹❹，但是，實際上他們仍在非法和秘密的進行活動。世界經濟蕭條於一九三〇年開始擴大，這種趨勢也影響到台灣——特別是農業方面，農民糾紛在次數和激烈程度上有增無減。在史達林控制下，所謂「資本主義第三期」的危機在整個世界加速，促進了國際主義者的激烈化程度。這種局勢正好給一九二九下半年進行重組活動的農民組合一個推動農民運動的好時機，這段時期也正是台共恢復元氣的階段。

在這樣的前提下，一九三〇年年底農組的一部分人依據台共的指令，刊行一份〝台灣農民組合當前任務〞❹❺的文件資料，這文件對農民組合提出批評：包括鬥爭中指導力量不足、領導人具有權威性格、工團主義的趨

向、推動土地革命的消極性等等，文件中同時強調重組工會的必要性，以及加速反帝同盟和赤色救援會的成立等意見。

一九三一年年初，農組中央委員會在嘉義竹崎召開秘密擴大會議，這個會議被稱爲「竹崎會議」，由於農組中台共分子的努力，大會採用了「支持台共」的決議。農組自此成爲台共的一個外圍組織㊻。

然而，關於文化協會的解散問題謝雪紅和農組領袖早有歧異，一九三〇年十月松山會議期間，激進年輕黨員的不滿削弱了謝雪紅的領導權威。一九三〇年年底陳德興由上海返台，在上海期間，他與翁澤生的意見已經協調一致，此次返台他携回第三國際有關改革台共黨務的指示，激進分子隨即圍繞在王萬得周圍，並在農組竹崎會議之後組成了改革同盟。落入台共領導的農組——或更正確地說——王萬得的激烈派，在台共黨內鬥爭中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台共在一九三一年五月臨時代表大會中改組並且修正路線後，農組遭受到台共新政治大綱的影響，也決定了一條較從前更爲激進的路線，就是希望有一天能以武裝革命的方式建立蘇維埃政權㊼。

但是同年六月開始，在日本人的壓制下，台共逐漸面臨它最後的時刻。台共、農組以及文協的領袖和會員均嘗試重建台共，然而都無結果，農組和文協的活動也完全癱瘓。緊接着赤色救援會事件後的一九三一年年底大逮捕行動，農民組合、文化協會都跟台共一樣，遭到了同樣的命運。

台灣農民運動自始至終均由農民組織所領導。台灣民衆黨依其指導原理，對勞工運動及農民運動應該同時並重，但實際上民衆黨只在勞工運動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後文將有敍述)，在農民運動上可以說是毫無成就。民衆黨的成員有些是地主，而且要面對農民組合的全島性組織，民衆黨除了在宜蘭、新竹二地成立農民組織之外㊽，其餘各地都無法展開活動。可以說，與文化協會密切聯繫的農民組合，完全獨占了台灣農民運動的領導權，其影響和地位是無可取代的。

第三節 台灣共產黨和工人運動

㈠ 工人運動的分化

日本殖民政策的目的是想使台灣成爲一個供銷的基地，將台灣的農產品供應給日本，而將日本的工業產品銷往台灣。所以台灣的工業部門直到一九三〇年年底，除了製糖工業之外，甚少受到殖民政權的注意和鼓勵。然而，從這個階段開始，由於日本預見戰爭必將發生，台灣的戰爭工業開始發展。在台灣殖民經濟的整體發展中，將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兩相比較，就可以說明台灣工業發展的遲緩情形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台灣工業的發展無足輕重。但是台灣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工業有顯着的成長：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五年工廠和工人的數目有顯着的增加，前者增加了三倍，後者增加了二倍㊿。一九二九年年底，整個公民營的工廠、礦廠和運輸工具公司估計約有七〇五九家，他們僱用的工人數目超過五十萬人[51]。然而，必須說明的是，這些都是屬於少於十個人的小工廠，到了一九三四年年底，員工超過三百人的企業數目並不超過一百家[52]。這些大企業多數屬於日本人所有，其中百分之八十屬於三井、三菱和台灣總督府。但是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是台灣人，他們薪水低於日籍職工的二分之一[53]；尤甚於此的是，日籍職工對他們的台籍同僚，採取一種「領導者」或「監視者」的態度[54]。我們可以因此斷言，台籍僱工和日本企業之間必定會發生衝突，這種衝突不僅在經濟方面，同時也表現在民族主義的情緒上。

在這種背景下，從一九二六年開始爆發了台灣工人運動，以及一些稍遲與其他運動相關的事件。一九二七年開始，由於文協和民衆黨爭奪工人

運動的領導權，台灣工人運動的發展更特殊（見表七）。

表七　工人的衝突和組織

	工人的衝突		工人的組織	
	衝突次數	參與人數	組織數目	會員數目
1926	26	1,280	7	1,730
1927	69	3,312	57	8,175
1928	107	5.445	103	12,008
1929	49	1,900	114	12,993
1930	59	15,706	109	25,190
1931	52	2,256	114	21,295
1932	29	2,002	110	21,203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頁 1220、1224、1225。

由於文化協會的努力，一九二七年台北成立了一個機械工友會，影響力遍及台南、高雄和基隆，隨後陸續在這些地方成立支部[55]。在連溫卿指導下，當高雄機械工人開始籌組工會的時候，由於對在日本企業中有無組織工會的權利引起衝突，隨即爆發了一場罷工行動，這家引起糾紛的日本企業是高雄的「台灣冶金公司」。罷工行動受到全島「連鎖罷工」的支持日見擴大，工人運動也堅定地發展開來[56]。

但是這些衝突事件只能達到某一程度，一方面由於日本人的壓制，另一方面則因爲連溫卿和王敏川之分歧所致。在新竹和台南事件發生期間，這些領導分子陸續被逮捕拘禁，使得工會活動日見衰頹，工會會員也星散各地。儘管如此，部分會員仍舊被一九二八年二月創立的台灣工友總聯盟

所吸引㊿。

台灣民衆黨從一九二七年七月成立開始，即致力於「援助農民運動、勞動運動及社會的團體之發達」㊿。由於農民運動已爲農組所掌握，而工人運動也在文協領導的抗爭活動中失效，因此才在民衆黨的領導下成立了台灣工友總聯盟；聯盟成立當天，已經擁有二十九個組織，六三六七個會員㊿。

因此，台灣工人運動，到台共成立時期已經分裂爲兩個敵對的陣營，此即文化協會領導下的左派團體，以及在「改良主義者」影響下的右派團體㊿。

㈡ 工會統合運動的失敗

台共建黨時曾經提出一項〝勞動運動對策提綱〞，該項對策強調聯合台灣所有工會的必要性。這個看法是由中共代表彭榮提出來的，但是在建黨大會時並沒有被正式接受㊀。不過有關統合工會的指令却傳抵台灣，只是沒有實施的機會。

面對工人運動的分歧以及來至民衆黨的威脅，文協領袖瞭解到統一左翼工會的重要性。一九二八年一月台灣機械工聯合會成立，跨出這條路線的第一步。六月初，文協匆忙地在台北召集二十五位工會代表開會，討論工會聯合的問題。會議期間出現了兩項對立的建議，一項是連溫卿提出的成立「台灣總工會」的計畫，另一項是王敏川準備的「台灣勞動統一運動聯盟」草案。前者建議成立一個左翼工會聯盟，促使左翼工會立即聯合；後者偏愛各個階段性工人運動的聯合，避免在工人間產生不可彌補的分裂㊁。最後，第二項建議佔上風並組成一個籌備委員會。但是，由於這兩個團體的分歧，加上新竹事件和台南墓地事件後領導人紛紛被捕，籌備委員會

的活動沒有獲得任何成果[63]。

實際上，在日共新的指示沒有傳抵台灣之前，台共有關工人運動的政策並未確立，它在上海成立的時候也沒有設置工會運動的負責人。儘管中央委員洪朝宗參加了台灣工人聯合運動的籌備委員會，台共仍舊排斥王敏川和連溫卿二人的構想，再三強調聯合左翼工會的必要性，以強化共黨在其中的影響力[64]。

㈢ 成立赤色總工會的嘗試

當一九二八年年底台共中央機關在台灣成立時，莊春火被任命爲工人運動的領導人。一九二九年年初，一項新的指令〝勞動階級的階級形成與黨的任務〞由日共傳抵謝雪紅手中。這項指令敍述了三個要點[65]：

1. 重要工業中應設立工會組織，特別應注意在煤礦業、運輸業和大工廠中設立組織。
2. 在黨的統治之下成立赤色總工會，以聯合左翼各工會組織。
3. 「右翼」工會激進化的問題。

二一二事件後，蘇新和蕭來福被台共東京特別支部遣回台灣，奉命協助農民組合的重建，雖然謝雪紅只派他們負責台灣北部礦工工會的組織工作，但是由於他們的努力，同年十月成立了一個礦山工會籌備委員會。依照台共中央委員會的指示，籌備委員會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定名爲「礦山工會組織籌備會議」，以這個名義傳佈消息、擴展影響力，於是一些支部組織跟著成立了[66]。

一九三〇年三月，劉守鴻被任命爲黨的南部負責人，他與顏石吉、簡吉在高雄成立一個指導委員會，並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企圖藉此組織工人。一九三〇年十月松山會議後，在莊守的指導下南部組織調整，以

加強黨在工人中的活動[67]。年底，高雄鐵路廠工人周坤棋及三位日本人吉松喜清、宮本新太郎、津野助好，爲了成立鐵路工會特地組成籌備委員會。改革同盟成立後，這個委員會擴大任務，以便組織台灣運輸工會。由於委員會的努力，抗爭衝突常常發生，共黨基層組織也逐漸成立了，特別是鐵路工廠[68]。

然而，儘管成果非凡，但工會始終無法誕生，這是因爲日本人在一九三一年六月的壓制行動，使所有的嘗試全部化爲烏有。

統合左翼各工會是台共當時的任務之一，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松山會議期間成立了工人運動的指導部門，王萬得、蘇新和蕭來福都被任命爲負責人[69]。他們提出的計畫分爲兩個階段：首先，成立一個籌備委員會作爲指導機關，領導成立各個工業部門的工會組織；然後，將這些工會組成「台灣赤色總工會」。這種由上而下的組織方式與謝雪紅的看法有出入，謝認爲台灣各工業部門沒有固定的工會組織，組織工作的方式應該反方向而行，採取由下往上的作法，優先在每一個工業部門中組織工會[70]。謝的想法被王及其親信斥爲「機會主義者」，但兩派都未考慮反對意見的存在而各行其是。改革同盟成立後，前者的計畫被採用爲工人運動的指導方針[71]，全力組織礦業、運輸業和印刷業的工人，鼓勵他們製造比平常更激進的衝突。經由他們的努力，工人運動急速發展，基層組織也在所有的工業部門出現。但是由於黨被摧毀，使得一些運動毫無成功的可能[72]。

至於台灣工友總聯盟，台共尋求「由上層聯合」和「由下層鬥爭」的策略。換句話說，爲了共同的鬥爭行動應組織一個委員會結合成總聯盟，同時派遣黨工進入工友總聯盟內部，爭取工人羣衆。由於黨員數目仍屬有限，且多出任文協和農組職務，因此，要在敵對陣營內建立領導地位實屬幻想。此外，雖然民衆黨和工友總聯盟也強調聯合陣線的重要性，但就整體來說，其結果似乎一無所成。

在民衆黨的領導下工人運動日漸分歧，這種分歧起於蔣渭水和蔡培火兩大派系的對立。前者，在民衆黨中建立領導地位以後，逐漸排斥溫和派，終於使得民衆黨轉向階級鬥爭運動。資產階級保守團體及知識分子唯恐遭日警的彈壓，急忙於一九三〇年八月離開民衆黨[73]，另外組成了一個更溫和的組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它唯一的目的是求得地方自治。至於民衆黨，爲了確保它的大衆路線，變得日益激進；一九三一年二月，民衆黨在第四次大會正式轉變方向，採取階級鬥爭路線，這次方向的轉變不能說沒有受到共黨的影響，然而這種轉變立刻招來殖民地當局解散民衆黨的嚴厲處分[74]。

從台灣工友總聯盟召開第三次大會以來，它所屬的各個工會遭到共黨活動的衝擊，而有日漸激進的趨勢。它原本預期在民衆黨大會後召開自己的第四次大會，準備採取新的激進政策，以促進工人運動的統一以及工農的團結。但由於民衆黨被解散及日本當局壓制力量的強化，使得這次大會根本無法舉行。不久，台灣工友總聯盟也就解體了[75]。

台灣工人運動的的發展比其他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來得遲，這個運動開始卽分裂爲兩個陣營，而且台灣的工業始終停留在低度發展的狀態，工會運動大體上不像農組那麼成功，但是在同樣的大環境下，它們却遭受被壓迫的相同命運。

—— 第八章註解 ——

❶謝春木,《台灣人の要求……》, 頁18。

❷同上, 頁70。

❸ "台灣社會運動團體調查(一)",《台灣民報》189期, 1928年1月1日, 頁9。

❹附錄一。

❺《抗日篇》, 頁67。

❻葉榮鐘等著,《台灣民族運動史》, 頁351。

❼《台灣民報》234期, 1928年11月10日, 頁3。

❽蕭友山,《台灣解放運動的回顧》(台北:三民書局, 1946), 頁28。再版。見於:《台灣問題重要文獻資料集》(復刻編集版), 第三卷。

❾《沿革誌》, 頁245。

❿同上。

⓫同上, 頁260—261。

⓬其中共黨份子有——常務委員:吳拱照;中央委員會委員:張庚申、吳丁炎、張道福、郭常;中央委員會候輔委員:莊守、李明德、王萬得(參閱《沿革誌》, 頁247—248、737—739、796—799、812—813)。

⓭在「上大派」之中, 除了上海的學生之外, 還包括蔡孝乾、翁澤生、洪朝宗, 以及其他一些人。

⓮葉榮鐘等著, 頁351—352。

⓯ "農民問題對策", 見《沿革誌》, 頁1094—1098;及《台灣 II》, 頁161—164。

⓰《台灣民報》286期, 1929年11月10日, 頁2;葉榮鐘等著, 頁352。

⑰但是要在共產黨之外成立一個台灣的大衆黨的想法，於 1928 年 8 月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中遭到譴責，此事在日本引發有關勞動農民黨解散問題的論戰。Cf. Beckmann et Okubo, pp.169—170。

⑱《沿革誌》，頁 262—263。

⑲蕭友山，頁 33；葉榮鐘等著，頁 352。

⑳葉榮鐘等著，頁 353：《台灣新民報》375 期，1931 年 8 月 1 日，頁 2，有關這次論戰的細節，請參閱下列二文：(1)清滴，〝文協解消問題に就て〞。原爲中文，刊於《新台灣大衆時報》(東京：1931 年 4 月)，日文譯本見《沿革誌》，頁 265—267。(2)〝台灣文化協會に就いて〞。原刊《產業勞働時報》(東京：1932 年 7 月)，見：《台灣 I》，頁 46 之 1。

㉑葉榮鐘等著，頁 353；蕭友山，頁 34。

㉒《沿革誌》，頁 271。

㉓《沿革誌》，頁 271—272；葉榮鐘等著，同上。

㉔淺田喬二著，《日本帝國主義下の民族革命運動：台灣、朝鮮、〝滿州〞における抗日農民運動の展開過程》(東京：未來社，1973)，頁 67。

㉕周憲文，第一册，頁 21—24。

㉖淺田喬二，頁 51。

㉗黃煌雄，《被壓迫的：台胞抗日史話》(台北：1977)，頁 121。

㉘陳逢源，《台灣經濟と農業問題》(台北：萬出版社，1944)，頁 38。

㉙〝台灣社會運動團體調查(一)〞，《台灣民報》189 期，1928 年 1 月 1 日，頁 9。另參閱：江賜金，〝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小史〞，《台灣新民報》390 期，1931 年 11 月 14 日，頁 13。

㉚《沿革誌》，頁 1090；《台灣 II》，頁 157。

㉛參閱〝農民問題の重要性〞，見《沿革誌》，頁 623。1928 年 9 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時，也賦與中國農民同樣的地位。參閱：〝Resolution of

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 C. Brand, B. Schwartz, et John K. Fairban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London : G. Allen & Unwin, 1952), pp.156—165.

㉜《沿革誌》，頁632—633。

㉝《沿革誌》，頁1081—1082。

㉞黃煌雄，《被壓迫的……》，頁122—123。

㉟《沿革誌》，頁1091、1093；《台灣II》，頁158、160。

㊱參閱〝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宣言〞，見《沿革誌》，頁1099—1101，及〝組合スローガン〞，同上，頁1101—1102。

㊲《台灣民報》242期，1929年1月8日，頁3。《沿革誌》，頁1084—1085。

㊳《沿革誌》，頁1102。

㊴1927年至1929年之間，爆發了536次事件，1340人被捕（參閱《沿革誌》，頁1021—1022）。關於中壢事件，參閱葉榮鐘等著，頁532—533。

㊵《沿革誌》，頁1104、1121。

㊶同上，頁670。

㊷〝台灣社會運動團體〞，《台灣民報》294期，1930年1月1日，頁8。

㊸〝台灣農民組合行動綱領案〞，見《沿革誌》，頁1109—1112。

㊹〝台灣解放運動各團體的形勢〞，《台灣新民報》345期，1931年1月1日，頁3。另參閱前文表六，「有關地租的衝突」。

㊺參閱〝台灣農民組合當面の任務〞，見《沿革誌》，頁1146—1155。

㊻《沿革誌》，頁1157—1158。黃煌雄，《被壓迫的……》，頁123。

㊼〝台灣農民組合當面の運動方針〞，見《沿革誌》，頁1185—1190。

㊽葉榮鐘等著，頁376。

㊾Samuel P. S. H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Ta-

iwan……″, p.421. 1907年以前，工業生產佔台灣經濟不到15%。1907年開始，在總督府的鼓勵下，製糖工業有了發展，使得工業生產所佔的百分比提高了，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變前，並未超過40%。參閱張漢裕，〝日據時代台灣經濟之演變″，頁95。

㊿由1914年到1925年，工廠的數目由1,309增加爲3,983，工人數目由21,859人增爲48,464人。參閱周憲文，第一册，頁63、67。

(51)其中工場工人83,351人，鑛工19,562人，交通運輸業工人48,863人，日傭工人421,976人。參見《沿革誌》，頁1192—1193、1199。

(52)《抗日篇》，頁73。

(53)根據總督府警務局1929年底的調查，日籍職工平均每日工資男性爲2.10圓，女性爲0.78圓；相對的，台籍工資男性爲1.06圓，女性爲0.53圓。參見《沿革誌》，頁1205、1216。

(54)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台灣の工業》（台北：1940），頁28。

(55)〝黎明期台灣勞動運動″，《台灣民報》152期，1927年4月10日，頁2。另參閱《沿革誌》，頁222。

(56)宮川次郎，《台灣の社會運動》，頁273—287。

(57)黃師樵，〝日據時代台灣工人運動史(二)″，《夏潮》2卷6期(台北)，1977年6月，頁8。

(58)民衆黨建黨大會時通過的〝綱領″及〝政策″，見《台灣民報》166期，1927年7月22日，頁5。

(59)《台灣民報》197期，1928年2月26日，頁3。

(60)台共的〝勞働運動對策提綱″，見《沿革誌》，頁614。

(61)《台共檢舉顚末》，見《台灣II》，頁253。

(62)《沿革誌》，頁1269—1270。另參閱：林先烈（林木順），〝台灣に於ける勞働組合統一運動と左翼當面の任務″，原刊於《馬克思主文》，1929年3

月號，重刊於《沿革誌》，頁 1184—1185。

❻❸《沿革誌》，頁 1270—1271。

❻❹林先烈，同上，頁 1270。

❻❺ 〝勞働階級の階級的結成と黨の當面任務〞，見《台灣II》，頁 166—168。另參閱《沿革誌》，頁 1280—1282。

❻❻《沿革誌》，頁 1290—1291。

❻❼《沿革誌》，頁 672—673、1292—1293。

❻❽《台共秘史》，頁 60—62。《沿革誌》，同上。

❻❾《沿革誌》，頁 673、1294—1295。

❼⓿《沿革誌》，頁 1295。

❼❶同上，頁 678—679。

❼❷《台共秘史》，頁 18。〝台灣共產黨事件〞，《台灣日日新報》號外，1933 年 7 月 24 日，頁 1。

❼❸ Edward I—te Chen, 〝Formosa political Movements……〞, p.496.

❼❹《台灣新民報》352 期，1931 年 2 月 21 日，頁 3。

❼❺《抗日篇》，頁 75。《沿革誌》，頁 1255。



結　論

當中國正處於紛擾和困苦的時代，尚未成爲一個現代國家的時候，台灣在政治上已與中國斷絕了關係。從第一次中日戰爭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甚至直到我們今天爲止，台灣和中國經歷了截然不同的社會進化狀況。當台灣以「殖民地」的身分反抗日本人的時候，中國也正以「半殖民地」的身分在暗中摸索，尋求整體的解放，以建立一個新的政治體系。

當日本資本主義者企圖將台灣置於它的經濟體系下時，迫使台灣現代化，其結果對台灣人而言是沉重的，這種影響不但表現在心理層面，也表現在政治和社會層面。

日本殖民統治的五十年間，台灣人對日本人進行許多不同形式的抵抗活動，初期二十年的武裝抵抗失敗之後，抵抗運動改採一種政治運動的方式出現，並由知識分子來領導。這些知識分子受到民主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並且受到自決思想的鼓舞。這批抵抗運動者均曾提出台灣解放與中國革命之關係的問題。台灣人的抵抗行動應該隷屬於中國革命之下，等待一個強大的中國出現來收復台灣呢？或者日本殖民統治的解放應該採用與半殖民地中國不同的革命策略，以瓦解日本的殖民統治，並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呢？

自從一九一四年同化會成立開始，經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直到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爲止，它勾繪出一條接受日本統治並自我拘限於合法範圍內的政治路線。這條路線是在全島未來自治的展望下，以改革殖民

政策和改善台灣人地位爲目標,是反抗異族殖民統治所遵循的第一條路線。

只有在一九二八年台共成立,這個時候,另一條路才明確地標示出來。從一九二七年的文化協會分裂開始,台灣人的解放運動開始出現階級運動和所謂的民族主義運動對立,並衍生一個新的趨勢,想藉革命行動推翻日本人的統治。共產主義運動就是屬於這第二條路線。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生第一次貨幣緊縮,造成世界經濟危機。台灣一般大衆的貧窮程度加深了,而日本資本主義者卻加強了他們的經濟統制,同時台灣資產階級開始在殖民地工業中投入資本,因此大多數的台灣資產階級,包括地主們都或多或少與日本的利益發生關係。這種妥協造成資產階級在向日本人要求權利的時候態度趨於溫和,這是民族主義運動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共產主義運動所代表的第二條路線,本身即含有造成它失敗命運的因素。其實可以說,台共從成立開始就不是一個能長久生存的組織,這有下面五種主要原因:

(一) 第三國際的指導

一九二七年第三國際決定成立台灣共產黨,它的成立是基於列寧「民族問題與殖民地問題提綱」中的殖民地國家解放策略。雖然同一時期第三國際內部正面臨紛亂的局面,中國的國共聯合陣線的政策遭遇失敗也引發糾紛,而殖民地國家的解放策略在台共存在的幾年間卻沒有改變,儘管黨內曾有鬥爭,領導階層也有所變化。但是即使這種策略不曾變化,在應用時卻改變了內容。一九二八年,史達林在第三國際建立起自己的統制地位,加以托洛斯基被罷黜,國際主義趨勢便消失了。共產主義運動和殖民地共產主義運動更加激烈化,而且從此只用來抵抗帝國主義,以便保衛社會主

義祖國蘇聯的利益。在台灣，這種轉變的結果是謝雪紅路線的消滅，謝採取的是較審愼的政策，因此比較能適應台灣當時的情勢，但是這種政策正好與第三國際正式路線衝突。因此可以說第三國際加諸台共的激進化路線，加速了台共的消滅。

(二) 台共的雙重臣屬性

台共在成立的時候，原則上期望日本和中國共產黨共同給予支持和協助。台共一開始是以日共的一個民族支部面貌出現，日後預定要成爲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但台共事實上也接受了中共的領導。這兩個大的黨組織都不能夠給台共帶來它所指望的有效而具體的援助。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對中國和日本的共黨而言，都是艱苦的歲月。台共的雙重臣屬性不但得不到別人的支持，反而顯得是一種負擔，它的內部也產生了兩極對立的趨勢——倚附中共和倚附日共兩股力量的對立。這種雙重的效忠造成台共發展上的障礙，對原本已十分脆弱的內部凝聚力以及指導力量的穩固性，也是一項沉重的打擊。

(三) 徵募黨員的力量不足

台共是由十幾個分別在中國、日本和莫斯科受共產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所組成，黨的眞正數額從來不多——依據我們的估計，黨員的數目並未超過數百個。黨員數額的稀少是由於受到持續地壓制，使得黨無法正常發展；甚至有一個時期，所謂中央委員會只不過是一個人而已。來自知識階層和小資產階級的黨員，絕大多數都是受革命思想吸引的青年，至於要想在工農階層當中徵募黨員，實際上很困難。

㈣ 不甚有利的條件

由於狹長而封閉的島嶼地形，使得台灣革命鬥爭的規模比在中國大陸的要小得多，因此日本能迅速地撲滅武力反抗行動。日本人建立在各個階層以及全島上的殖民地壓制體系極為有效率，殖民地政府同時也控制了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各個層面的生活，使得社會運動一直停留在萌芽的階段。在當時，無產階級也只是邊際分子，階級鬥爭和團結國際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只是一個外來的學說而已，很難完全適用到台灣社會。

㈤ 成效有限的秘密行動

由於秘密性的限制，台共無法以適當的原有面目出現，也無法公開提出共產主義的政治綱領，它的活動因此被限制在殖民地政權所能容忍的左派組織內，像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以便將它們轉變成台共外圍組織。它事實上成功地將這些運動激進化了，同時也加速了與民族主義陣營分道揚鑣，但是它無法更進一步建立成一個大衆組織。

因此，台共失敗的原因是相當清楚的。它必須面對的困難以及不能克服的困難，都是所有殖民地人民解放運動中為人熟知的問題——他們都是以不成比例的武裝，對抗具有完備組織的殖民地壓迫體系。台灣就像其他的殖民地國家一樣，殖民地的壓迫為反帝國主義的主題以及共同的行動，創造了一個有利的條件，但是高壓而有效率的殖民統治也阻止了反殖民革命的發展。雖然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當時是為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而誕生的，但是它卻提出了重建台灣社會的長遠目標。以知識分子為領導中心的台共，自建黨之初就明確指出台灣應該做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存在於國際社

會，並且在新國際秩序的重建上做出一定的貢獻。他們前瞻性的眼光、艱辛的奮鬥以及慘重的犧牲，無論如何，應該受到後人的肯定與欽佩。雖然在它短促的存在期間，台共在任何一方面都未成功，但是台共政治大綱所揭示的「台灣獨立」、「台灣共和國」的有關民族解放及社會重建的課題，卻保存了下來，成爲以後的人繼續努力奮鬥的目標。



附　　錄



附錄一　一九二八年台共政治大綱

譯自《沿革誌》，頁601－613

一、台灣民族的發展

1.台灣最早的住民是野蠻人，所謂的生蕃。在十六世紀的前半期，西方的先進國家荷蘭開始佔領這個蕃島的南部，西班牙則佔領北部。這就是台灣殖民地歷史的序幕。一六六〇年代，被滿清擊敗的鄭成功率領士兵東渡台灣，把那些爲數甚少的荷蘭人和西班牙人驅出島外。

其後，生畜逐漸受到壓迫，土地漸次被剝奪，終於完全被漢人趕進深山。在這段時期，土地大都爲鄭氏家族及其部屬分割占領。此後，由中國南方移民台灣的漢人增加了許多；所謂台灣民族就是由這些中國南方移民渡台後結合形成的。當時鄭氏家族統治台灣，完全是建立在封建制度的基礎上。

2.隨後，淸廷遣施琅征台，也同樣採用封建制度，派封建領主統治台灣，但是那時的封建制度已有漸漸動搖的跡象。促成此一歷史變化的主要作用與社會動因是：那時台灣人開始和西方各先進國家有了商業貿易關係，島內的商業資本漸次抬頭，使得封建制度一天天走向崩潰的道路。

台灣在十七世紀末期變成中國封建制度的隸屬地。而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台灣與中、英、荷等國商業關係漸趨密切，於是進入封建制度崩潰時期、初步的資本主義經濟變動時期。就在這個時期，爆發了日淸戰爭(甲

午戰爭)；在封建制度下孕育成長的資本主義，必然會帶來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動盪不安，再加上日清戰爭的結果，原來以反抗滿清統治爲目標的民族運動乃面臨突然而來的危機。

因革命情勢大爲高漲而感到恐慌的滿清，在日清戰爭戰敗後，把台灣作爲賠償物割讓給日本。在這種革命背景下一度建立起來的台灣民主國，主要任務在於抵抗日本的侵略。這個革命運動的主要動力來自資本主義化的中地主、商人和激進的武人。他們是以一種全民的羣衆運動以及國民革命的姿態出現。但是，由於台灣資產階級尚未成熟，這個國民革命終於被橫暴的日本帝國主義鎮壓下來。在島內資本主義成長的刺激下，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爲便於壓迫掠奪而採取的新政策下，民主革命中最爲主要的土地問題開始有了實際的大變化。這一點，可以說是這次革命僅有的一項成果。

在上述背景之下，台灣民主國企圖建立民主獨立的國家、開拓資本主義的道路；而在此經濟政治動盪的過程中，由於日清戰爭的結果，台灣終爲日本強奪，而淪爲殖民地。

一方面由於民主革命的未能完成，一方面由於統治台灣的日本帝國主義本身還保留着若干封建制度，加以當時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大體還完全依靠着日本資本主義，所以，當時的台灣仍舊保存着許多封建色彩。

台灣民族就是經過這種歷史階段，以及特殊的經濟發展過程而成形的。

二、現在的政治經濟形勢

1.台灣的經濟情勢

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依據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的急速躍進而發展起來的。換句話說，台灣工業的發展並不是靠台灣本身的力量，而是完全依

賴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的投資經營。

讓我們看一看台灣工業的情形。主要產業部門如鐵路，一八九九年只有六〇・五哩長度的鐵軌，在一九二五年就已經增加到二四四・四哩（內軌道六一三·四哩)。都市方面各種產業部門也發展得非常迅速。例如：一九一二年各種企業的數目共一四七家，資本總額僅一二五、八九一、六五〇圓，到一九二四年各種企業的數目則增加到六三四家，資本總額也躍進到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其中銀行資本的投資額，在一九〇九年只有二五四、七二四、九六一圓，到一九一九年却突然增加到四九八、一四五、二一五圓。我們必須注意的事實是，這一發展有項特徵：大部分金融資本爲日本銀行資本家的投資，其中百分之八十來自三井、三菱、大倉和總督府等極少數的獨占資本。

根據上述重要事實，我們可以看出台灣的經濟情況發展到如何的程度，現在整體的台灣經濟是如何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獨占銀行資本的總支配之下。在台灣，現在已有居於支配地位的高度資本集中，又有台灣本身的落後幼稚資本及存留在農村中不算少數的非資本主義經濟因素。這種高度資本集中的一面，以及落後的幼稚資本和非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另一面，彼此存在着一種根本不能解決的矛盾。這種矛盾，也就是發展台灣革命的主要動因。

2.政治情勢

一八九五年的台灣民主共和國(民主革命的具體表現)，遭受到日本帝國主義武力鎮壓。此一革命在推翻封建制度以前就被日本帝國主義所打倒。所以目前在台灣還殘留着許多封建的遺物。到目前爲止，高壓統治台灣的權力，是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聯合的日本國家權力——台灣總督府。形同專制魔王的台灣總督府給予台灣民衆的自治制度，事實上不過是藉「自治」

之名來欺瞞羣衆的工具罷了。總督府評議會、州郡協議會等有名無實的自治機構雖然遍設全島，但是其選舉法却是十分露骨的，由上級官員所指派的。議會成員以日本官吏和資本家占多數、台灣人能夠參與者只有那些完全被同化了的反動大地主和大資本家而已（以評議會而言，二十七名成員中，日本人資本家占九名、總督府的日本高級官吏占九名、台灣的反動御用紳士占九名)。這就是所謂的自治制度？這不是有名無實、欺瞞羣衆的招牌嗎？由此看來，全民的政治自由完全被日本帝國主義剝奪了，台灣的民衆一點也無法享受。

3. 階級關係

(1)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階級——極少數的銀行資本家巨頭——他們擁有全台灣資本的百分之八十。其中百分之四十二投資於農村工業企業（製糖業等)。這一類帝國主義寄生蟲就是台灣民衆的大敵。

(2)反動的資產階級——屬於這一類者，一方面爲資本家，另一方面爲地主；它主要的基礎爲土地。封建成分相當濃厚的本島資本家，完全被日本金融資本同化的本地資本家，都屬於這一類。他們是資本階級當中最反動的部分。他們對於革命勢力，已經和日本金融資本家及封建階級混爲一體。

(3)進步的資產階級——屬於這一類者，本來大部分是地主；他們的經濟基礎部分建立在土地上，而大體上已成爲資本化的都市工商資產階級。這是一件非常重要、不可忽視的事情。因爲，他們大部分的資本投資於商業、貿易、銀行等小型企業，所以他們的主要經濟基礎若不建築在資本主義的剝削體制之上，則無以維持生命。但日本帝國主義却處處阻撓其自由發展，他們也就經常要設法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獨占資本的控制，企圖發展爲大資本階級。就這一點來講，

他們也遭受着民族的壓迫，尙存有革命的傾向。

(4)小資產階級——屬於這一類者，大多數爲經營小本生意及各種小型企業者。他們的經營地位非常不安定，加上政治上、經濟上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高壓手段，以至日益破產。他們的革命性雖然還頗爲動搖，但比資產階級更強烈一層。其他教員和事務員等知識分子也屬於小資產階級。

(5)大地主——這一類是完全同化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動走狗。這些封建地主根本是建立封建式掠奪關係上的寄生蟲，是最爲反動的分子。

(6)中地主——是由占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二八・八、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八的社會層面所構成。他們當中有一部分是雇用農村工人而自己也參與經營耕地，其中大多數却是租給貧農及自耕農耕作，在封建的掠奪關係下榨取農民。但是他們最近已逐漸傾向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進步的資產階級頗有密切的關係。

(7)自耕農——屬於這一類者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而占耕作地的百分之二十三。最近因爲農村工業的發展、土地的集中及日本帝國主義強制沒收他們的土地，使得他們的經濟地位日趨衰微。他們現在想要維持一家的生計，無論如何必須向地主借貸更多的土地。他們處於日漸破產的恐慌之下，事實上已加速分化成爲農村工人或貧農。

(8)貧農及農村工人——他們的土地大部分被日本資本家及台灣的封建地主所強奪，已是一無所有。這些農村裏最貧苦的農民，却佔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大部分的農村工人係在農村工場工作的工人，一部分却是在農場或流動於農村的游離勞動者。自耕農、農村工人、貧農等早已結合在農民組合的旗幟下，開始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決死的鬥爭。

(9)工人階級——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三十。自從去年發生生產合理化問題及資本主義大恐慌以來，急速地喚起了他們在政治上、組織上的自覺。然而，他們尙未結合成獨立的階級政治勢力，現在還處在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

三、民族獨立運動的形勢

台灣民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有其必然產生的道理。讓我們從歷史事實加以考察。

自從一八九五年國民革命運動所建立的台灣民主國，被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之後，民族革命運動還是繼續不斷的發展。至一九〇七年間，主要革命運動大部分還是原始的、突發的暴動。但是一九一二年及一九一五年兩次連續暴動，參加人數却已達數萬人之多；雖然這些較有組織，可惜尙缺乏組織的統制和政治的領導。從外觀而言，這兩次大暴動，係起因於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但假如深入分析革命經過的內容，則可探出其主因完全在於農民羣衆爲了要求民主地解決土地問題而爆發的。我們另從台灣的歷史事實來看，台灣民族傳統和獨立國家傳統的歷史一向薄弱，這一事實反映在台灣的民族革命運動上，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自從一八九五年的民主革命中途遭受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以來，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完全因爲日本資產階級的經營而發展起來。因此，台灣資產階級的政治結合一向極爲幼稚，最近才有漸次結成一階級的跡象；但是，在這一階級政治結合的過程中，它却極易受日本帝國主義同化；而日本帝國主義的同化政策也顯然很注重對這一階級的吸收。這個事實就是過去台灣民主獨立運動之所以不能發展得強而有力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知，台灣的民族運動之所以停留在僅知要求自治和文化的普及

化等改良運動並非偶然，而是有其歷史原因的。一九一九年，在資產階級的指導下文化協會組成了。一九二三年，該協會提案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是文化協會政治運動的先驅。一九二六年春季，農工等無產階級發起了罷工運動，這一新興階級登上政治舞台後，迫使文化協會的政治運動方針不得不轉變。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台灣的資產階級還是傾向於民族革命，但其革命性頗爲有限。

1. 他們本身還帶有許多封建的榨取關係。
2. 與日本的資產階級相比較，則台灣的資產階級尙極幼稚、薄弱，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缺乏政治性的結合。既使有之，在政治結合的過程中也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同化。
3. 最近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運動已經以銳不可擋的姿態迅速抬頭。這個階級勢力根本上威脅着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且其種種條件都必然的限制着資產階級的革命欲望。此外，台灣的資產階級在達成革命的政治結合以前，文化協會的內部就分裂了。同時，在台灣革命運動中，逐漸產生一種以無產階級以及農民同盟軍爲主力的傾向。

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的分裂，明確地昭示着這一歷史事實。這時由文化協會退出的右派人士結合組成了台灣民衆黨，他們的運動的主要目的和課題就是要求台灣文化的普及與自治。結果，他們仍然還停留在小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範疇裏。尤有甚者，他們在機關誌上更公然聲明反對共產黨，支持南京政府。但就現階段革命而言，他們的活動還可加以利用；只是——如上述的概略說明，其作用已極受限制。另外，我們不難預測，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戰鬥力在不久的將來會日漸擴大抬頭，必然對他們構成威脅。所以，在不久的將來他們必然會如同中國的資產階級，急速地傾向反革命的陣營裏。這一預測旣確實且值得我們的注意，當文協左派占領了文化協會後，即根本改組舊時的組織，從普及文化和要求自治等口號，進

而致力於農工革命運動，與工人、農民革命運動維持密切關係。新文化協會的主要口號是：普及大衆文化、打倒總督府暴政、要求政治自由、反對土地的私有等等。這比舊文化協會更前進，而且已經有了革命的進展。但是，以階級立場來看，當時文化協會主要構成分子及其階級基礎，仍然是屬於工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另外，革命的、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還組織了台灣無產青年會和讀書會等團體。

在革命主力軍的工人和農民裏頭，農民方面的組織已達成了全台的統一，數量計三萬多人之衆。工人階級方面的組織，大小工會已有二十多個，會員約有一萬多人，不過力量較分散。最近，資本的攻勢逐漸猛烈，工人階級爲了對抗資本家，必須把所有工人階級的組織統一起來。這一呼聲，而現在已由機械工聯合會提出，其具體的表現即促進組織台灣總工會。

四、無產階級成長的過程

台灣的勞動者（包括農村工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其中工會組織的成員雖一萬多人，但力量分散；目前，統一的台灣總工會組織正面臨工人階級鬥爭的重要問題。無產階級的戰鬥同盟軍——農民（假如土地問題不能得到解決，他們就會發起革命）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六，其中全農民人口的百分之六九・九爲貧農，而百分之三十・一爲自耕農。目前已有三萬多的羣衆可以組織起來，而且在全台統一的農民組合本部指導之下，準備對日本帝國主義決死戰鬥。

無論是農民運動或是工人運動，現在都接受革命的小資產階級青年學生的指導。然而在革命的知識指導分子當中，有些傾向是很危險的（尤其是農民組合的幼稚病公然拒絕民族革命）。一般來說，左派的錯誤在於一方面傾向消極的否認民族解放運動，而另一方面又主張直接進行社會革命。

其原因在於他們忽視（或不了解）下列兩件事實：

1.台灣是日本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

2.台灣本身還存在着很多封建制度殘遺物。

他們輕易的忽視這些重點，只看到表面現象。也就是把台灣看作日本帝國主義的延長，認爲台灣已經完成了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政治及階級分化。這種膚淺的看法也就是台灣左派不免會犯的一種錯誤。如果從客觀條件加以觀察，則整個運動的指導地位已由資產階級手中漸次地轉移到無產階級。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台灣無產階級還沒有達成政治的結合，而且大衆的經濟鬥爭也僅止於初步組織的階段而已。所以，在這種客觀的情形下，組織整個革命運動的先鋒隊——台灣共產黨，確實是最爲迫切的任務。假如勞動階級的先鋒分子（無產階級的前衛）不能結集起來的話，則在目前的革命條件下，無產階級就絕對無法成爲革命鬥爭的基本階級。

目前，應該組織台灣共產黨，成爲隸屬於日本共產黨的民族支部。特別是台灣過去尙無共產黨運動的經驗，所以，將其組織成日本的一支部格外重要。台灣共產黨的當前急務，卽在於把散佈在台灣各地參與實際運動的共產主義者，迅速地糾集起來，以這些革命的先進知識分子作中心，著手從事組織的準備。在準備會議之後，努力吸收戰鬥的工人和農民爲黨員；然後，才能以工人階級和貧農爲基礎，建立嚴密而堅固的共產黨。

五、革命的展望

現在台灣還殘留着不少封建的遺物。例如經濟方面，大部分農民還遭受封建式榨取關係的掠奪。在政治方面，如同專制魔王的獨裁政治的形態，也是封建殘存的表現。再加上支配台灣的政治權力——日本帝國主義國家機關，雖以金融資本占優勢，但就整體而言，仍然是封建地主和資本家的

混合政權。基於這個事實，台灣的獨立運動就不能僅僅是單純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已，在社會內容裏還要是民主主義的革命。也就是說，獨立運動在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同時，還要努力推翻日本帝國主義。而獨立運動的發展必然要動搖日本帝國主義的根基。依據歷史以及目前的複雜情勢來看，要推翻日本帝國主義非僅是一種觀念上的見解。日本帝國主義的金融資產階級狂熱地要把全台灣工業化起來。不用贅言，因爲工業化而將強化起來的封建關係，我們必須加以阻擋；因此帶給台灣全體民衆的強暴無恥壓迫，我們要加以粉碎。最近日本帝國主義國內的「生產合理化」運動所加諸於民衆的，令羣衆無可忍受的罪狀中，在農村表現得最爲顯明的是：沒收農民的土地，農村破產迫使農民大衆游離失所，瀕臨於餓死邊緣的苦境。這種事實終於逼迫農民展開運動，以決死的革命鬥爭來對抗日本帝國主義。

日本帝國主義無法完全廢除封建的殘物，却要自上而下以強迫的手段來發展資本主義(其中包含着不少非資本主義因素)。這種歷史的事實，隱藏著在台灣不能解決的社會根本矛盾，而這一矛盾就不得不造成革命危機。台灣經濟的封建殘存生產關係並不是由歷史發展的順序變化來的，而是由於金融資產階級的國家強加干涉才存在的。這一事實必然會促使農民大衆動員起來，展開革命鬥爭，反對土地集中工業化，要求自由擁有土地，這是現在台灣全體農民的願望，也就是革命的主要動因。農民革命運動不僅要反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掠奪土地，更進而要從封建地主的壓迫下求取解放，要求沒收土地分配給農民。前者和後者之間有很密切的連帶關係。在這情形之下，台灣農村革命急速地發展起來；但是台灣共產黨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案，不僅要沒收土地分配給農民，最後還要把土地國有化（土地歸屬農村蘇維埃），取消土地所有權，使之臻於土地的社會化。目前「土地歸與農民」的提出，只是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必要而正確的口號。在反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革運動過程中，台灣工人羣衆已經覺悟到結合自己階級的

必要性了。農工階級的勢力一旦發展成爲一股新興的革命力量時，現在具有革命性的自由主義的商工資產階級的將會放棄其革命戰線，投入妥協的隊伍中。由此看來，毫無疑問的一定是由無產階級擔當起台灣民族革命的主力軍和領導階級。實際上，無產階級本身已經漸漸的結合成爲一個革命階級，一個全民運動的基本階級。不過這件事在主觀上還須加倍努力，以促其進展。而且台灣無產階級還必須與他的同盟軍——貧農——嚴密的聯結起來，完成台灣的民主革命——民族獨立運動的歷史使命。台灣的資產階級還很幼稚，革命的作用又頗爲薄弱，所以民族獨立的偉業已經落在無產階級的雙肩上。台灣革命要成功，必須把日本帝國主義根本打倒才有可能，所以台灣民族革命富有社會革命的展望，這是具有雙方面客觀條件爲根據的。首先，以台灣內部的社會條件爲革命的原動力，無疑的要以工人階級爲革命的領導者，如此革命運動就很容易朝向社會革命方面發展。其次，就國際條件而言，中國革命和日本革命都已經明顯地朝向社會革命的道路上發展。如上所述，歷史的和現實的雙重條件，已很明確地肯定台灣民族革命要朝向社會革命的路線發展。所以台灣民族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

六、黨的當前任務

1. 統一全台的大小工會，將從未依地區、產業歸類的台灣工會，依產業類別重新組織，盡全力把所有的工人吸收進工會。
2. 吸收農民的革命勢力，聯合工人階級與農民，使之結成戰鬥的同盟軍。
3. 竭盡全力吸收所有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建立一個以工農民衆爲中心的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工人、農民各階級的聯合體——大衆黨——的組織是不可缺的。現在就必須暫時利用文化協會爲中心，

作爲擴大共產黨活動的舞台，即一方面先克制它的幼稚病，吸收工農先進分子以及青年加入文化協會，另一方面則極力暴露民衆黨的欺瞞政策，將受其領導的羣衆引向左方，漸次以文化協會作爲革命統一戰線的中心，而到一定時機後再改造文化協會，組織大衆黨。

4. 台灣革命運動和日本無產階級的運動，尙無緊密的聯合。我們應努力促使彼此堅固團結起來。

5. 擁護中國革命。這是極爲重要的工作。所以我黨的主要任務是要盡力介紹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各種事件，而在可能的時期動員羣衆，利用示威運動等方法和中國的革命相呼應，共同反抗世界性的帝國主義。

6. 爲反對新帝國主義，我黨必須詳細分析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及與其弱小民族的利害關係，特別是工農羣衆的利害關係，以便對這些問題提出正確的解釋。同時，我黨必須暴露各帝國主義備戰的陰謀，提出世界被壓迫弱小民族及國際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共同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在某些時期必須動員羣衆、運用示威運動等方法進行反對。

7. 擁護蘇維埃——聯合工人的國家，其理由也頗爲重要。台灣共產黨應該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介紹十月革命的勝利歷史、社會主義建設的現狀、工人階級及共產黨之間的密切關係等，使台灣的革命羣衆了解工人的國家，然後以實際行動去擁護蘇維埃聯邦。尤其目前應特別注意的是，世界帝國主義無處不在醞釀着對蘇維埃聯邦進攻的陰謀(有的已經開始進攻了)，並且蓄意破壞中國的國民革命。這種帝國主義的陰謀其實是與新帝國主義的戰爭連在一起的。我們必須藉由國際團結的口號，促使台灣無產階級去深刻認識國際問題。

8. 凡有助於爭取政治自由的一切運動，我黨非努力動員羣衆不可。

台灣共產黨當前的口號是：

1. 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2. 台灣人民獨立萬歲
3. 建立台灣共和國
4. 廢除壓制工農的惡法
5. 勞動七小時——不勞動者不得食
6. 爭取罷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
7. 土地歸與貧農
8. 打倒封建殘餘勢力
9. 制定失業保險法
10. 反對壓制日、鮮無產階級的惡法
11. 擁護蘇維埃聯邦
12. 擁護中國革命
13. 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

上列口號與「工農政府」、「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有極密切的關係。我黨應依客觀條件，於一定時機提出「工農政府」、「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

七、台灣共產黨與民族獨立運動

資產階級及其走狗雖然到處宣傳民族平等或民族自決權，其實不過是徹頭徹尾的弱小民族的口頭禪而已。共產黨必須揭破這個假面具。無論如何，民族獨立的要求只有在廢除階級的要求中才有意義。從歷史發展的情勢來看，民族獨立運動——也就是台灣獨立運動——是絕對不可能藉由和

平手段或由漸進改良的途徑來達成的。特別明顯的是，想要依賴資產階級的領導是全然不可能的。過去與目前全世界革命運動的豐富經驗與教訓都證明，如果沒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和蘇聯的積極援助，如果沒有殖民地工人、農民革命的反抗和共產黨的領導，民族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台灣共產黨是以無產階級爲基礎建立起來的，可以說是屬於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共產黨目前的任務與工作，在於激發階級鬥爭，發展工農的革命勢力。工農羣衆的革命理論就是以階級鬥爭推動工農階級，使之參與革命的陣營，成爲民族革命的主要利器。階級鬥爭不僅和民族革命絲毫沒有矛盾，更有助於民族革命，所以反對階級鬥爭者，也就是反革命者。因爲反對階級鬥爭，就是反對具有革命性的最大多數的工農羣衆之奮起參與革命的行爲。台灣民族革命，如無工農的參加、工人階級的領導，就不可能達成目的。所以反對階級鬥爭就是反革命。

目前台灣資產階級反對階級鬥爭，說階級鬥爭破壞全民運動的共同戰線，對民族革命有很大的矛盾。這根本是欺騙台灣工農羣衆的一種詭計，同時也明顯地表現出台灣資產階級的妥協性。所以台灣共產黨必須根本打倒這種反革命的卑劣理論，徹底實行階級鬥爭，推動工農羣衆參加革命，特別是要由工人階級站在前鋒領導民族革命。另一方面，台灣共產黨必須爲民族獨立而戰鬥，如此，才能成爲革命群衆的指導者，更要注意資產階級（民衆黨）運用各種妥協欺騙的方法攫取革命的領導權。我們不僅認爲台灣資產階級根本不能領導台灣民族革命，更認定其根本沒有足夠革命所需要的軍隊。我們一方面要根本將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卑劣的陰謀加予打破，另一方面還必須和他們產生密切的聯合戰線，使得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的影響。在目前的政治條件下——也就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時期——台灣共產黨必須爲工人階級爭得眞正的指導地位，以免指導權落入資產階級的手中，如此才能眞正推動民族革命向前發展。在殖民

地的環境下，對帝國主義統治感到十分不滿的，不僅是革命的農民大衆，而且在一定的條件下還有頗多的羣衆（小商人、小企業家資產階級、中農等)。因此台灣共產黨必須根據革命的客觀條件，具體地決定利用他們的戰術。

台灣無產階級的解放如果不與民族獨立鬥爭相結合，則階級獨自的鬥爭就得不到發揮。所以共產黨有必要站在各種革命鬥爭的前線領導所有的革命力量。

「共產黨的所有宣傳及煽動工作——不論在議會內或議會外，不問民主主義的憲法是否存在，對於現在資本主義所重複製造出來的事務，或者對於破壞民族平等、侵害少數民族權利等等事實，必須斷然加以暴露。而且還必須做到：第一，經常闡釋，只有以蘇維埃制度結合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發起鬥爭，才能在實際上保障各民族的平等；第二，帝國主義國家下被壓迫民族的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各國共產黨必須直接加以帮助。」 ——第一次大會的提綱

根據政治大綱所指示的原則，我們目前必須迅速召開第一次大會，以便討論、決定各種問題。台灣的革命無產階級與日本共產黨不能不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台灣共產黨必須是極爲正確、極勇敢地發展鬥爭，確定無產階級在民族獨立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掌握這一運動的領導權，使之不致於落在資產階級的手中。我們爲達成革命、建立蘇維埃，就必須結合、啓蒙和訓練人民，並建立共產主義的組織。

附錄二

第三國際東方局〝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1931年3月10日)

譯自《沿革誌》，頁694－701

親愛的同志諸君：

雖然許久未與各位在工作方面有所接觸，不久前所接到的第一次報告也不完全，但是有關台灣的革命事件以及共產主義者活動之概況，卻也能清楚地知道。

根據這個情況，不管日本帝國主義白色恐怖有多專橫，也不管縱使失去了與國際共產黨的連繫，台灣的共產主義者反而英雄式的成爲世界歷史上重要的主義，持續革命的鬥爭，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以及台灣剝削階級，依然繼續著的深刻鬥爭之一事，是吾等深感滿足的地方。

然而，我們發現在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中仍然存在著些許的缺點和弱點。吾等對此點確有指責諸君的必要。自以往吾等所獲得的資料中，並未對所有的問題盡最大努力解決，因而所得到的只不過是初步的回答。如果平常能夠跟諸君保持連絡，進而獲得更多的報告的話，吾等對於諸君的任務甚至諸君不得不思考的一切問題，或許就能獲得更具體的詳細說明。

關於此封信，如果首先要對諸君主要的缺點做指責的話，第一就是消極，積極性不夠充分，對台灣的革命鬥爭不加領導與組織這件事。

如諸君所知，有些地方罷工的機運已成熟，也就是像去年十二月所發生的礦坑工人罷工，原本是應該對工人的鬥爭加以指導的，而我們的同志竟然放棄對其指導，而全權委任黃色工會。其結果，此次罷工終以失敗收場。有些同志鑑於大局，主張若是沒有勝利的希望的話，就非得藉罷工的手段不可。照此路線，同樣的，在農民運動中也彰顯出來。事實上，我們同志在團結的擴大上以及對於不平不滿的農民群衆的統制上，並沒有組織。甚且有的共產黨員也不管是身爲農民委員會的委員，不僅沒有指導個別的農民運動，反而痲痺集體鬥爭的積極性。

我們之所以注意到這些事實的存在，對諸君而言，是要指示其重要性，是爲了要迅速確定的獲得戰勝的果實。諸君這種消極的表現以及被機會主義的毒素所限制住的心態，全是因爲沒有清楚的意識到指導集體的革命鬥爭，擁有組織力量的人只有共產主義者，指導台灣的士人階級和農民對抗日本帝國主義和台灣的搾取階級，能夠獲得最後勝利也只有共產主義者。所以，台灣的共產主義者有可能在消極中開始被分化解放。若非因此，這項任務的解決不會成爲不可能，台灣革命運動也不會延遲吧。特別是現在，上至國際情勢，下至台灣島內的革命運動之條件看來，這種消極性是不會被允許的。就實際而言，現在國際帝國主義一切的矛盾，因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而越來越惡化，一方面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鬥爭，也變得越來越激烈。因此，對新帝國主義之戰的釀成爆發是無可避免之事。

國際資產階級在遭遇此經濟危機時，變得更加殘暴，進行殘酷的鬥爭，圖謀殖民地以及勢力範圍的奪取。照此事實進行，對全世界的政治環境帶來相當大的影響，而在各國勞苦群衆的面前背負了新的重大任務。

在另一方面，國際資產階級爲了要從此經濟危機中逃脫，對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施加壓力，幾千萬的工人群衆被棄置於街頭，因流浪和飢餓而痛苦掙扎。伴隨而來的，失業工人的人數最近空前的增加，勞資雙方之間

的矛盾，在各方面也顯得越來越複雜。

先進各國多是工業發達的國家，因此階級的鬥爭早已形成，而且呈現爲普遍的現象，工人群衆對資本主義的固執搾取正進行著反對鬥爭。

第三，資本主義世界和蘇維埃聯邦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蘇維埃聯邦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迅速化及其勝利是全世界勞苦群衆對其同情的強化，蘇維埃聯邦也強化了對世界革命運動的影響。只不過同時的，爲了要獲得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國際資產階級不允許蘇維埃露西亞和平的存在。特別是，現在蘇維埃露西亞爲了要獲得偉大的成功，而一切的資本主義國家正遭遇著非常的經濟危機，於是在莫斯科宣佈成立工業黨，更明白證實國際資產階級爲了要干涉蘇維埃聯邦而做武裝準備此一事情。這是因爲蘇維埃露西亞依然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同時，露西亞的成功，對現在依然處於經濟危機中國際資產階級而言，給他們的市場帶來很大的威脅。

根據現在的國際情勢看來，在最後非加以批評不可的是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矛盾擴大之一事。

經濟的危機使得資產階級到了對殖民地國家施加越來越猛烈的壓迫和搾取。自然地，也由於此，各殖民地附屬國家的勞苦群衆的反抗和革命運動也更加激烈，已到了反對一切的帝國主義的地步。

因此，最近數年來被壓迫的東方各國，發展了空前未有的革命運動。比如向中國印度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發展，以及黑人國家和東方阿拉伯的反帝國主義革命鬥爭的進行等。其中，中國的革命運動更達到了特別的發展，在農民戰爭中不只高舉蘇維埃的旗幟，爲了無產階級所組織領導的勇敢的中國赤軍是要和帝國主義者、中國資產階級等反革命聯合勢力和殘酷的戰爭持續對抗，要一步一步解放在帝國主義軍閥地主的壓迫下的勞苦群衆。

諸君所處的國家也是殖民地國家，因此，不可自外於現正呈現高潮的革命鬥爭。

日本帝國主義在世界大戰中由於已相當強固了自己的地位，在現今和其他各資本主義國家同樣的遭遇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不用說，日本和其他國家同樣的失業工人增加，伴隨而來的是對其工人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的壓迫更益加激烈。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和非獨立國的勢力範圍的武裝，加之以十倍的壓迫和搾取。

特別是在台灣，利用其統治上的地位，對於工人的生活予以組織性惡化，根據課稅增加搾取，蠻橫地把耕作自己土地的島民趕走，使他們陷入飢餓狀態瀕臨死亡邊緣。

公然地強暴地掠奪台灣農民的物品，對於他們的勞動所生產的物品，也脅迫其賣給日本的資本家，付以連本錢也不足的代價。同時，身爲農民者，也必須向日本資本家納付條件嚴苛的租稅。

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日益強化向台灣的勞苦群衆搾取，是爲了要塡補在經濟危機中所受之損失。另一方面，從台灣獲取的大量資金，是爲了新起的帝國主義大戰做準備，而且是利用台灣做爲軍事根據地。

台灣的勞苦群衆受到日本帝國主義如強盜般的掠奪以及搾取之一事，必然地會引發鬥爭，大革命的即將爆發也自是不用待言的。

從國際的革命環境和台灣的狀況來看，應該對多數的台灣工農群衆加以組織領導，這是對諸君的最低限度的積極行爲之要求。

諸君反對組織群衆，危害了世界的新世界大戰，應該爲反抗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準備，同時，當然得宣傳蘇維埃聯邦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組織台灣勞苦群衆，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擁護中國的蘇維埃運動和印度的革命運動。諸君要團結台灣的勞苦群衆，並爲排除島內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消非鬥爭不可。現在諸君處於非常狀態而且複雜緊張的國際環境下，因此諸君要特別持有最大的耐力限度，非積極地完成眼前的一切任務不可。只有如此，開始加入世界革命運動，也才能和國際無產階級殖民

地的被壓迫群衆的鬥爭結合。蓋因，奪取廣大群衆到自己這一方一事，是諸君的根本任務。把自己的影響，以最大的力量傳播到台灣的勞苦群衆中。更要在組織上鞏固此等影響，配合組織，把勞苦群衆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要根據決定日本帝國主義的勝敗，完成戰爭準備的對策，始能好好領導反帝國主義之戰，也才能改變土地所有制度的根底。這次的革命是無法避免的，只是只有經過如此步驟，才能顛覆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只有經過此次的革命，台灣始能達到完全的政治和經濟的獨立。只有革命始能和日本帝國主義緊密地連繫，把受其保護的土地所有制和一切的封建殘餘完全肅淸。只有革命始能好好地改善台灣工人和農民群衆的生活。在台灣進行反帝國主義、變革土地所有制，只有施行革命，在勞苦群衆的面前，展開社會主義鬥爭，也即是，社會關係最主要的最高形式鬥爭的前途才有可能。

台灣革命的結果會是如何？諸君現時影響組織群衆會達到什麼程度呢？有客觀的可能性嗎？具備有革命條件嗎？是否爭取群衆歸向共產黨呢？只是關於此點，看一看現在台灣的一般勞苦群衆有著如何的不滿，即可充分證明。亦即在各處的農民運動、最近的霧社暴動，尤其更重要的，在各種企業上經濟和政治的罷工要充分加以證明。

如此在存在這些革命條件之上，對於一切的問題，關係著諸君是否能利用良好的環境這點，是相當重要的。

在爭取群衆鬥爭方面，恐怕諸君非採取最大的積極態度不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以非常的強暴手段，諸君要利用此激發群衆的怨恨，擴大勞苦群衆的鬥爭，對此帝國主義的壓迫，非加反對不可。諸君，要利用勞資間、兵士和長官間、農民在土地上的一切衝突，組織群衆，非反對階級敵人不可。在日常的政治、經濟鬥爭上，要爭取勞苦群衆歸向自己，而且非把鬥爭往高層度的形式推進不可。

諸君在農工群衆的鬥爭上，要服從各部分的要求，群衆是吾黨在目前的革命階段上的基礎口號中所非指名不可的。這口號是——

一、帝國主義統治的顚覆、日本帝國主義企業的沒收，台灣政治經濟的完全獨立。

二、一切的土地無條件的加以沒收，歸還給鄉村的貧農、中農使用。

三、誓必消滅搾取階級及一切的封建殘餘。

四、顚覆帝國主義土著地主、資本家的政權，建立農工蘇維埃。

五、取消帝國主義一切的賦稅、一切的苛稅。

六、實行八小時的勞動制、社會保險，極力改良工人階級的生活。

七、階級職業工會的組織及行動完全自由。

八、保護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勞動群衆的祖國——蘇維埃聯邦。

九、結合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和親愛同盟，特別是聯合日本無產階級，反對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十、擁護中國的蘇維埃運動、印度的革命，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國的勞苦群衆的鬥爭。

一切的口號、或者在印刷的煽動和宣傳品中，諸君向群衆解釋此口號，把群衆團結在此口號下，非發展他們的鬥爭不可。

事實是極明顯的。諸君若是不把事實上是少數人的小組織的共產黨加以堅固統一的話，要完成這次困難的建設任務、爭奪群衆往己方靠攏的方法是除此之外無他途。諸君非進行眞正的黨的建設不可。諸君的幹部事實上是不足的。諸君在黨員的吸收上非多加努力不可。首先，產業工人、鄉村的貧農是特別重要的，亦即，在農民運動及工人的罷工中，要使那些最盡力的積極的組織者及其參加者入黨、而且在每一企業中非組織黨支部不可。首先，在大企業中組織黨的支部一事是必要的。這些黨的生產支部成爲諸君的基礎，選拔同志成爲工作指導的基本源泉，同時，非組織鞏固的

地方委員會不可。像這樣，在諸君的國內各地區，就可以成功地領導廣大群衆的鬥爭。諸君要極力地以口號和文字，煽動宣傳一切的主要的政治事件。爲群衆指出具體的明顯的口號，非眞正地把他們團結在革命鬥爭中不可。特別應該注意的事是，要訓練黨的幹部及宣傳工作之一事。

我們的意見是，至少諸君應該發行機關報紙。雖是在困難的條件下，但這報紙也應該每月出版二、三回。必須好像在作黨的群衆日報般，宣傳吾等的基本口號，非成爲勞苦群衆的集成的組織者、領導者不可。保持組織上的秘密、發展黨內的工作，這些皆是不用贅言的。

遵從黨的建議，吾等的任務是發展職工運動，鞏固運動中的領導作用。依據消息，諸君近來，特別是破壞職工會後，削弱了職工運動中自己的地位。希望諸君能夠好好地鞏固既存的赤色職工會，在尙未有組織的企業內，非組織新工會不可。這個工作並非光靠上層機關，而是應由下層在企業中創造才是。非保障職工會眞正成爲群衆的保壘不可。另一方面，諸君應該派遣特別同志，在黃色工會中工作，破壞他們、爭取他們的群衆。吾等對於職工運動的影響和指導，必須組織共產黨團，並予以保障。該黨團必須遵從黨委員會的一切指示，並且非切實施行不可。職工運動的基本方面以及吾等的基本任務是，作爲罷工鬥爭的先驅和組織者及領導者之一事。這任務的完成，全靠吾等的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影響程度及力量而定。職工運動的任務是我們必須指出農村工人的組織之必要。農村工人的鬥爭在諸君的國家內是具有特別意義的，且是具特殊作用的。

最後，依據諸君的資料，至今爲止沒有任何活動，也未組織領導失業工人。這個缺陷非儘快補救不可。也就是，組織特別的失業工人委員會，並依此在失業工人之中開拓進行有系統的工作。吾等在今天並不向諸君一一提出團結失業工人的口號。

以特別通信方式向諸君告知。

諸君在一切群衆工作中，利用一切公開可能的形式之一事，是非常有意義的。各種各樣的晚會、職工學校 (工人長期學校)、女工養成機關 (女工養成的特別班)、俱樂部、讀書室、遊戲運動的組織、飯枱、喫茶店等等，在各種各樣的地點中發展，和群衆接近。像這樣，即使在有警察的恐怖條件下，也可以好好地把爲數衆多的工人群衆聯合，並加以影響。

另外，跟諸君說明一下關於農民運動中的任務。

坦白的說，農民組織，在諸君的國家中已存在許久，並且已擁有相當的革命傳統。這點，對諸君在農民運動中的任務，該是相當容易完成的。諸君必須把農民組合偏布於全國。必須把一切的農民群衆 (貧農、中農) 組織團結不可。在這團體中，把各地的農民組合的零星的鬥爭統一，一切的農民運動的指導、部分的鬥爭要求、賦稅的減少、地租的減低、拒絕納付屬於日本帝國主義耕地的灌漑稅等等，非加以集中不可。諸君要把爲數衆多的勞苦農民群衆往共產黨的周圍團結，把他們的鬥爭和工人階級相結合，在基本的革命口號下，漸次地往高度政治鬥爭水平線上推進。同時，要制定特別的具體口號，派遣同志到部落中，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對鬥爭中，組織吾等的聯繫、堅固吾等的領導。

再進一步說明反帝國主義運動。

在這運動中，漸漸地，廣大的農工群衆、土著部落、城鄉貧民參加。

爲了促進此運動的發展，諸君在反帝國主義大同盟的組織上非努力不可。文化協會在過去反帝國主義鬥爭中，起了相當的革命作用。而且繼續地在台灣領導日本帝國主義的反抗鬥爭。但是在此組織中，工人參加，甚至領導，事實上是小資產階級的組織，並非有保障帝國主義確實的徹底的鬥爭。諸君要不論成敗，遵從一切群衆的組織，首先要借助職工會農民組合之力，組織反帝國主義大同盟之一事爲要。非依據此同盟最近的開會決議案行動不可。若是文化協會未採用反帝同盟的意見，諸君就在其會員之

中進行分化，在諸君的組織下，有著先進的革命情緒的會員，特別是工農分子，非將之轉入反帝大同盟不可。諸君要在一切的企業內及各區、各域、各鄉村之中，根據黨團指示組織幾個反帝同盟支部，黨團非得保障自己的影響和領導不可。

最後，在本信中，吾等希望諸君在農工群衆的組織上要多加注意。吾等非常清楚在台灣過去曾有青年勞苦群衆的革命組織之存在。現在的工作，皆根據此組織所培養出來的。只是現在在台灣，青年團的情形如何？吾等完全不知曉，眞是遺憾。吾等所接獲的資料中一點也未曾言及。若是無此組織，就不要猶豫，非即刻組織不可。若即使存在，但其力量薄弱的話，當然非得盡最大力量幫助其發展不可。

青年團是農工的先進份子，不光是得組織領導青年的政治經濟的鬥爭，同時，也非得清楚黨的後備軍之一事不可。因其在反帝國主義中、破壞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的工作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與此相同的，諸君要組織勞動婦女(首先是女工和貧苦的農婦)，領導她們參與經濟的政治的鬥爭。吾等對諸君所提出的有關各種問題，也期待諸位的意見。

也請諸君對國內的經濟狀況、革命運動，做更評細的說明。

吾等向諸君提出了許多困難複雜的任務。吾等相信諸君已發動一切的力量，積極的活動，提高共產主義先鋒隊的戰鬥力。諸君的勝利就在於完成諸君本身的任務，保障台灣革命運動的順利發展之一事。

向共產主義敬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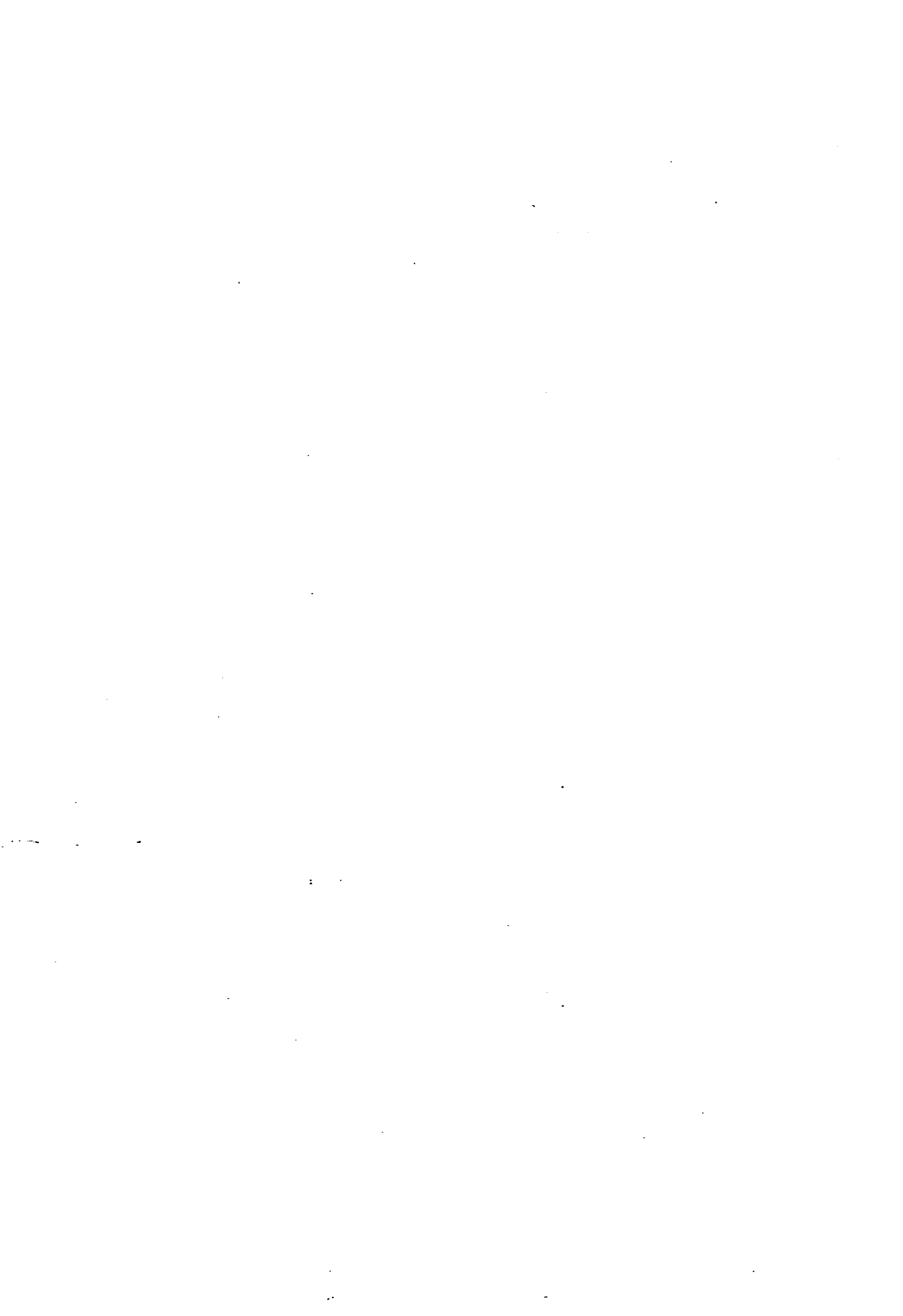
共產國際東方局

附錄三　大事簡表

年	月日	事件
1895年	4月	馬關條約
	5月	台灣民主國成立
		武裝抗日行動展開
1896年	3月30日	台灣總督府成立
		「六三法」公布
1914年	12月	台灣同化會成立
1915年	5月～8月	台南西來庵事件
1919年	3月27日	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在莫斯科召開
1921年	1月	台灣議會設置運動開始請願
	10月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
1926年	6月	台灣農民組合成立
1927年	1月	文化協會左傾、台灣民族運動陣營分裂
	4月	中國大陸國共分裂
	7月10日	台灣民衆黨成立
	7月15日	日本共產黨〝1927年綱領〞通過
	12月4日	農民組合馬克思主義化
	12月	日共決定組織台灣共產主義者

1928年	4月15日	台灣共產黨建黨大會在上海召開
	4月25日	上海台共大檢舉
	7月～9月	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在莫斯科召開
	9月23日	日共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成立
	11月	謝雪紅在島內組成台共黨中央
	12月 30～31日	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台共取得主導權
1929年	2月12日	農民組合幹部大檢舉
	4月16日	日本展開日共大檢舉，台共東京特別支部被破壞
	8月17日	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
	11月	台共確立對農民組合的控制權
1930年	5月	台共與第三國際東方局取得聯繫
	10月 27～29日	台共松山會議
	12月	第三國際介入台共內鬨
1931年	1月27日	台共改革同盟成立
	2月18日	台灣民衆黨左傾被解散
	3月10日	第三國際東方局"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
	5月31日～6月2日	台共臨時大會
	6月～9月	台共大檢舉，黨中央遭破壞
	8月～12月	台灣赤色救援會企圖重建台共
	9月	上海及台灣反帝大同盟遭受檢舉
1931年5月～1932年4月		武裝暴動的嘗試與台共之覆滅

參考文獻



I. 英文及法文參考文獻

(A) 書籍

Barclay, George W.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in Taiwan.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186 p.

Beckmann, G. M. et Okubo, Genji.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22—1945. Stanford, Cal.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453 p.

Bianco, Lucien. 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Paris : Gallimard, 1967. 384 p.

Brandt, Conrad. Schwartz, B. et Fairbank, John 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London : G. Allen & Unwin, 1952. 552 p.

Broue, Pierre (éd. avec une introduction). La question chinoise dans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1926—1927) . 2ème éd. rev. et augm. Paris : Etudes et Documentation Internationales, 1976, 539 p.

Broue, Pierre (éd.). Du premier au deuxième congrès de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Paris : Etudes et Documentation Internationales, 1979. 510 p.

Carrere d'Encausse, Hélène et Schram, Stuart. Le Marxisme et l'Asie, 1853—1964. Paris : A. Colin, 1965. 495 p.

Chen, Jérôme.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419 p.

Chen, Lung-chu et Lasswell, Harold D. 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1967. 428 p.

Chesneaux, Jean. Le mouvement ouvrier chinois de 1919 à 1927. Paris : Mouton, 1962. 650 p.

Chesneaux, Jean. L'Asie orientale au XIXème et XXème siècles.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rires de France, 1973. 383 p.

Chesneaux, Jean. Le mouvement paysan chinois, 1840—1949. Trad. de l'anglais (Peasant Revolt in China, 1840—1949). Paris : Ed. du Seuil, 1976. 189 p.

Chiu, Hungdah (éd.).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 Documents and Analysis. New York/Washington/London :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395 p.

Cogniot, Georges.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Paris : Ed. Sociales, 1969. 156 p.

Collotti Pischel, Enrica. et Robertazzi, Chiara.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et les problèmes coloniaux 1919—1935. Paris/La Haye : Mouton, 1968. 584 p.

Degras, Jane (é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Documents. Réimpression (lère éd. 1956—1965). Plymouth/London : Frank Cass, 1971, 3 vol., 463 p., 584 p., 494 p.

Demeer, Y. et Gamblin, A. Taiwan (Formose) République de Chine.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oll. Que Sais-je?), 1979. 128 p.

Desanti, Dominique.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Paris : Payot, 1970. 394 p.

Eudin, Xenia J. et North, Robert C.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1927. Stanford, Cal.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478 p.

Footman, David(éd.).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London : Chatto & Windus, 1960. 151 p.

Frank, Pierre. Histoire de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1919—1943). Paris : Ed. La Bréche. 1979. 2 vol., 949 p.

Gernet, Jacques. Le monde chinois. Paris : A. Colin, 1972. 765 p.

Gordon, Leonard H. D. (éd.). Taiwan : Studies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 New York/London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124 p.

Guillermaz, Jacques.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t. 1, Des origines à la République soviétique chinoise (1921—1934). Nouvelle éd. rev. et augm. Paris : Payot (coll. "Petite Bibliothèque Payot"), 1975. 268 p.

Guillermaz, Jacques.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t. 2, De Yenan à la conquête du pouvoir(1935—1949). Nouvelle éd. rev. et augm. Paris : Payot(coll. "Petite bibliothèque Payot"), 1975. 207 p.

Guillermaz, Jacques.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au pouvoir, t. 1, De l'avènement du régime au mouvement d'éducation socialiste 1949—1962. Nouvelle éd. rev. et augm. Paris : Payot(coll. "Petite bibliothèque Payot"), 1979. 409 p.

Guillermaz, Jacques.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au pouvoir, t. 2, Du

mouvement d'éducation socialiste à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et à l'ère Hua Kuo-feng 1962—1979. Nouvelle éd. rev. et augm. Paris : Payot (coll. "Petite bibliothèque Payot") , 1979. 378. p.

Haupt, Georges. La Duxième Internationale 1889—1914. Paris/La Haye : Mouton, 1964. 393 p.

Ho, Samuel P. 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461 p.

Ho, Yhi-mi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of Taiwan. Nashville, Tenn. :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66. 172 p.

Hsiao, Tso-liang(comp.). 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0—1934, t. 1, The Chinese Documents. Seattle/ London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803 p.

Imbault-huart, C. L'île Formose :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Réimpression (lère éd. Paris : E. Leroux, 1893). Taipei : Ch'eng-wen ch'u-pan she, 1968. 323 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Communist Who's Who. Taipei : 1970—1971. 2 vol., 454 p., 630 p.

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Le premier congrès des peuples de l'Orient, compte-rendu sténographique. Réimpression(lère éd. 1921). Milano : Feltrinelli, 1967. 229 p.

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Thèses, manifestes et résolutions adoptées par les Ier, IIème, IIIème, IVème congrès de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1919—1923)
Réimpression(lère éd. 1934). Paris : Ed. F. Maspéro, 1969. 216 p.

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Vème congrès de l'Internationale commu-

niste, compte-rendu analytique. Réimpression(lère éd. Paris : Librairie de l'Humanité, 1924). Milano : Feltrinelli, 1967. 480 p.

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Thèses et résolutions du VIème congrès de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Réimpression(lère éd. Paris : Bureau d'Editions, 1928), Milano : Feltrinelli, 1967. 232 p.

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XIth Plenum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ses,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Réimpression (lère éd. London : Modern Books, 1931). Milano : Feltrinelli, 1967. 30 p.

Johnstone, William C. Jr. *The Shanghai Problem*. Stanford, Cal.: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326 p.

Kerr, George H. *Fomosa Betrayed*. London : Eyre & Spottiswoode, 1966. 514 p.

Kerr, George H. *Fomosa, Licensed Revolution and the Home Rule Move-ment 1895—1945*. Honolulu, Hawaii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4. 265 p.

Klein, Donald W. et Clark, Anne B. *Biography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 vol., 1194 p.

Kriegel, Annie. *Le pain et les roses. Jalons pour une histoire des socialismes*.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coll. Hier), 1968. 257.p.

Kriegel, Annie. *Communismes au miroir francais*, Paris : Gallimard, (coll. Bibliothèque des Histoires), 1974. 253 p.

Kriegel, Annie. *Les Internationales ouvrières(1864—1943)*. 4ème éd.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coll. Que Sais-je?), 1975. 128 p.

Kuo, Warren. 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aipei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68—1969. 4 vol., 528 p., 653 p. 706 p., 784 p.

Lacouture, Jean. Hô Chi Minh. Paris : Ed. du Seuil, 1967. 256 p.

Lazitch, Branko et Drachkovitch, Milorad M.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Comintern. Stanford, Cal. :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458 p.

Lockwood, William W.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Ed. augm.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686 p.

Mcvey, Ruth T.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Ithe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510 p.

Mao Tse-tung. Oeuvres choisies. Pékin : Ed. en Langues Etrangères, 1966—1977. 5 vol., 313 p., 392 p., 488 p., 512 p., 568 p.

Mendel, Douglas. The Politics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Berkeley et Los Angeles, Cal.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315 p.

Moriyama, Akio. The Issue of Formos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Process of Attitude Change from 'Independence of Formosa' to 'Liberation of Formosa'. Mitaka, Tokyo :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1975. 57 p.

North, Robert C.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2 ème éd. Stanford, Cal.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310 p.

North, Robert C. et Eudin, Xenia J. M. N. Roy's Mission to China : The Communist-Kuomintang Split of 1927. Berkeley et Los Angeles, Cal.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399 p.

O'Neill, P. G. Japanese Names : A Comprehensive Index by Characters and Readings. New York/Tokyo : John Weatherhill, 1972. 360 p.

Rue, John E. 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 1927—1935. Stanford, Cal. :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388 p.

Scalapino, Robert A. The Japa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0—1966. Berkeley et Los Angeles, Cal.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409 p.

Scalapino, Robert A. (é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Tactics, Goals, and Achievements. 2ème éd.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Hall, 1969. 424 p.

Scalapino, Robert A. et Masumi, Junnosuke. Parties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Japan.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0 p.

Scalapion, Robert A. et Yu, George T. The Chinese Anarchist Movement. Berkeley, Cal. :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81 p.

Sheng, Yueh(Sheng Chung-li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Kansas : Centr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1. 270 p.

Shieh, Milton J. T. The Kuomintang : Selec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1894—1969. New York :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434 p.

Sih, Paul K. T. (éd. avec une introduction). Taiwan in Modern Times. New York :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521 p.

Snow, Edgar. Etoile rouge sur la Chine. Trad. de l'anglais(Red Star over China)(éd. définitive revue et corrigée per l'auteur 1963)par Reclus, Jacques. Paris : Ed. Stock, 1973. 439 p.

Snow, Edgar.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148 p.

Snow,. Helen Foster(pseud. Wales, Nym). The Chinese Communists : Sketches and Autobigraphies of the Old Guard.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ublishing, 1972. 401 p.

Suh Dae-sook(trad. et éd.). Documents of Korean Communism, 1918—1948.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570 p.

Swearingen, Rodger et Langer, Paul. Red Flag in Japan :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n action 1919—1951. New York : Greenwood Press, 1968. 276 p.

Sworakowski, Witold 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its Front Organizations. Stanford, Cal. :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65. 493 p.

Thornton, Richard C.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28—1931. Seattle (Wash.)/London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246 p.

Thornton, Richard C. Chin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1917-1972. Blooming ton/Lond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403 p.

Totten, George Oakley III. The Social Decocratic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 New Haven/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455 p.

Tsurumi, E. Patricia.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334 p.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 Hong Kong : 1969—1970. 2 vol., 897 p.

Yen, Sophia Su-fei. Taiwan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1836—1874. Hamden Conn. : The Shoe String Press, 1965. 404 p.

(B) 論文

Bianco, Lucien. "Les paysans et la Révolution : Chine, 1919—1949", Politique étrangère (2), 1968, pp. 117—141.

Bianco, Lucien. "Peasant and Revolution : The Case of Chin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 (3), avr. 1975, pp. 313—335.

Chang, Han-yu et Myers, Ramon H. "Japanese Coloni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Taiwan, 1895—1906 : A Case of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2 (4), août 1963, pp. 433—449.

Chen, Ching-chih. "The Police and Hokō Systems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1895—1945)", Harvard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Papers on Japan (4), 1967, pp. 147—203.

Chen, Ching-chih. "The Japanese Adaptation of the Pao-chia System in Taiwan, 1895—1945",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 (2), févr. 1975, pp. 391—416.

Chen, Edward I-te. "Formosa Political Movement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914—193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 (3), mai 1972, pp. 477—497.

Chen, Edward I-te.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Korea and Formosa: A comparison of the Systems of Political Control",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0) 1970, pp. 126—158.

Degras, Jane. "United Front Tactics in the Comintern 1921—1928", pp. 9—22. in: Footman, David (éd.).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0. 151 p.

Goldstein, Steven M.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olonial Areas: The View from Yenan, 1937—41", China Quarterly (75), sept. 1978, pp. 594—622.

Guiliermaz, Jacques. "La politique agrair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Revue militaire d'information (318), juil. 1960, pp. 5—24.

Ho, Samuel P. 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Taiwan: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 (2), févr. 1975, pp. 417—439.

Hsiao, Franck S. T. et Sullivan, Lawrence 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tatus of Taiwan, 1928—1943", Pacific Affairs 52 (3), automne 1979, pp. 446—467.

Kublin, Hyman. "The Evolu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 (1), oct. 1959, pp. 67—84.

Kublin, Hyman. "Taiwan's Japanese Interlude, 1895—1945", pp. 317—357, in: Sih, Paul K. T. (éd. avec une introduction). Taiwan in Modern Tim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521

p.

Lamley, Harry J. "The 1895 Taiwan Republic: A Significant Episod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7 (4), août 1968, pp. 739—762.

Lamley, Harry J. "The 1895 Taiwan War of Resistance: Local Chinese Efforts against a Foreign Power", pp. 23—77, in: Gordon, Leonard H.D. (éd.). Taiwan: Studies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 New York/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124 p.

Lamley, Harry J. "A Short-lived Republic and War, 1895: Taiwan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pp. 241—316, in: Sih, Paul K. T. (éd. avec une introduction). Taiwan in Modern Tim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521 p.

+ Meskill, Johanna M. "The Lins of Wufeng: The Rise of a Taiwanese Gentry Family", pp. 6-22, in: Gordon, Leonard H.D. (éd.).Taiwan; Studies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 New York/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124 p.

Moriyama, Akio.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ttitude toward Formosa: from 'Independance of Formosa' to 'Liberation of Formosa'", Tokyo,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12), mai 1974, pp. 125—136.

Myers, Ramon 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pp. 28—73, in: Chiu, Hungdah (éd.).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 Documents and Analysis. New York/Washington/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395 p.

Myers, Ramon H. "Taiwan as an Imperial Colony of Japan: 1895

—1945″,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6 (2), déc. 1973, pp. 425—451.

Myers, Ramon H. et Ching, Adrienn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 (4) août 1964, pp. 555—570.

Scalapino, Robert A. et Schiffrin, Harold. "Early Socialist Current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Sun Yat-sen versus Liang Ch'i-ch'ao″,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8 (3), mai 1959, pp. 321—342.

Wickberg, Edgar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Land Tenure in North Taiwan″, pp. 78—92, in : Gordon, Leonard H.D. (éd.). Taiwan : Studies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 New York/London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124. p.

Wickberg, Edgar. "The Taiwan Peasant Movement, 1923—1932 : Chinese Rural Radicalism Under Japanese Development Program″, Pacific Affairs 48 (4), juin 1975, pp. 558—582.

Woodside, A. B. "T'ang Ching-sung and the Rise of the Taiwan Republic″ ,Harvard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Papers on China(17), déc. 1963, pp. 160—191.

II. 日文參考文獻

(A) 書籍

淺田喬二,《日本帝國主義と舊殖民地地主制——台灣、朝鮮、滿洲における日本人大土地所有の史的分析》。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68。289頁。

淺田喬二,《日本帝國主義下の民族革命運動：台灣、朝鮮、〝滿洲〞における抗日農民運動の展開過程》。東京：未來社，1937。490頁。

東嘉生,《台灣經濟史研究》。台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社，1944。374頁。

陳逢源,《台灣經濟と農業問題》。台北：萬出版社，1944。330頁。

陳崑樹,《台灣統治問題》。台北：寶文堂書店，1931。206頁。

(日本) 外務省條約局法規課,《日本統治下五十年の台灣》。東京：1964。469頁。

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東京：刁江書院，1965。3卷，1032頁、1008頁、1052頁。

井上清,《日本帝國主義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1968。407頁。

泉風浪,《台灣の民族運動》。台中：台灣圖書印刷合資會社，1928。354頁。

江丙坤,《台灣地租改正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4。274頁。
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灣：抵抗と彈壓》。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
443頁。
宮川次郎,《台灣の農民運動》。台北：拓殖通信社支社，1927。324頁。
宮川次郎,《台灣の社會運動》。台北：台灣實業界社營業所,1929。545頁。
宮川次郎,《台灣の政治運動》。台北：台灣實業界社，1931。334頁。
黃昭堂,「台灣民主國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280頁。
(日本)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台灣共產黨檢舉概要》。復刻本(初版,1928)。
頁236—273。收入：山邊健太郎編,「現代史資料」,第22輯,《台灣II》。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742頁。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部會,《中國共產黨史資料集》。東京：勁草書房,
1970—1975。12卷。
王育德,《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歷史》。東京：弘文堂，1964。249頁。
尾崎秀樹,《舊殖民地文學の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71。1349頁。
朴慶植,《日本帝國主義の朝鮮支配》。東京：青木書店，1973。2卷，347
頁、342頁。
蔡培火,《日本本國民に與ふ》。東京：台灣問題研究會，1928。188頁。
謝春木,《台灣人け斯く觀る》。台北：台灣民報社，1930。390頁。
謝春木,《台灣人の要求：民衆黨の發展過程を通じて》。台北：台灣新民
報社，1931。312頁。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增訂版。東京：新泉社，1974。782頁。
蕭友山,《台灣解放運動の回顧》。台北：三民書局，1946。84頁。復刻本,
收入：「台灣問題重要文獻資料集」,第3輯。東京：龍溪書舍，1971。
立花隆,《日本共產黨の研究》。東京：講談社,1978。2卷,483頁、610頁。
台灣憲兵隊,《台灣憲兵隊史》。復刻本(初版，台北：1932)。東京：龍溪

書舍，1978。489 頁。

台灣總督府，《台灣統治概要》。復刻本(初版，1945)。東京：原書房，1973。506 頁。

台灣總督官房文書課，《台灣統治綜覽》。東京：1908。534 頁。

台灣總督官房文書課，《諭告、訓達類纂》。台北：1944。546 頁。

台灣總督官房調査課，《施政四十年の台灣》。台北：1935。290 頁。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鷲巣敦哉主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全書分爲三編及別編，共有六册，編寫於 1933—1942。

第一編《警察機關の構成》，台北：1933。999 頁。

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上卷)》。台北：1938。復刻本，台灣史料保存會，《日本統治下の民族運動(上)：武力抵抗篇》。東京：風林書房，1969。835 頁。

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1939。復刻本，台灣史料保存會，《日本統治下の民族運動(下)：政治運動篇》。東京：風林書房，1969。1381 頁。第二種復刻本出現於 1973 年，由東京龍溪書舍發行，本文參考的就是這種版本。

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下卷)：司法警察及犯罪即決の變遷史，刑事警察制度の變革》。台北：1942。946 頁。

第三編《警務事績編》，台北：1934。1256 頁。

別　編《詔勅、令旨、諭告、訓達類纂》。台北：1941。916 頁。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台灣農民組合ニ關スル概況》。台北：1927。52 頁。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台灣ニ於ケルふ作問題ニ關スル資料》。台北：1930。316 頁。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台灣の工業》。台北：1940。

竹越與三郎，《台灣統治志》。東京：博文館，1905。568 頁。

戴天昭,《台灣國際政治史研究》。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 1971。656 頁。

凃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の台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1975。502 頁。

東鄉實、佐藤四郎,《台灣殖民發達史》。台北：晃文館, 1916。488 頁。

東京警視廳特別高等課內鮮高等係,《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員檢舉顛末》。復刻本(初版, 1929), 頁 83—235, 收入：山邊健太郎編,「現代史資料」, 第 22 輯,《台灣 II》。東京：みすず書房, 1971。742 頁。

鷲巢敦哉,《台灣警察四十年史話》。台北：1938。472 頁。

山邊健太郎編,「現代史資料」, 第 20 輯,《社會主義運動》。東京：みすず書房, 1968。

山邊健太郎編,「現代史資料」, 第 21 輯,《台灣 I》。東京：みすず書房, 1971。523 頁。

山邊健太郎編,「現代史資料」, 第 22 輯,《台灣 II》。東京：みすず書房, 1971。742 頁。

(B) 論文

江賜金, "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小史"。《台灣新民報》, 390 期, 1931 年 11 月 14 日, 頁 13; 391 期, 1931 年 11 月 21 日, 頁 15; 392 期, 1931 年 11 月 28 日, 頁 15; 393 期, 1931 年 12 月 5 日, 頁 15; 394 期, 1931 年 12 月 12 日, 頁 15; 395 期, 1931 年 12 月 10 日, 頁 15; 397 期,

1932年1月9日，頁14；399期，1932年1月23日，頁15。
向山寬夫，〝台灣民族解放運動史：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歷史評論》，26期，1950年11月，頁59—64；27期，1951年1月，頁49—54。
尾崎秀樹，〝決戰下の台灣文學〞。收入：尾崎秀樹，《舊殖民地文學の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71。349頁。
彭華英，〝社會主義の概說〞（I）。《台灣青年》，2卷4期，1921年5月，頁50—57。
佐野學，〝台灣議會の設置を助ける！〞。《台灣》，4卷2期，1923年3月，頁37—40。
〝佐野學予審訊問調書，第八回〞。收入：山邊健太郎編，「現代史資料」，第20輯，《社會主義運動Ⅶ》。東京：みすず書房，1968。
戴國煇，〝霧社蜂起と中國革命：漢族系中國人の內なる少數民族問題〞（上）、（下）。《思想》，596期，1974年2月，頁66—77；597期，1974年3月，頁93—107。
戴國煇〝台灣抗日左派指導者連溫卿とその稿本〞。《史苑》，35卷2期，東京：立教大學，1975年3月，頁57—60。
〝大湖、竹南事件の概要〞。《台灣警察時報》，1934年8月，頁141—152。
〝台灣共產黨事件の全貌〞。《台灣日日新報》，號外，1933年7月24日，頁2。
若林正丈，〝台灣革命とコミンテル：台灣共產黨の結成と再組織をめぐつ〞。《思想》，610期，1975年4月，頁131—152。
山川均，〝植民政策下の台灣〞。收入：山川均，《山川均全集》。東京：勁草書房，1966。第七卷。

III. 漢文參考文獻

(A) 書籍

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書刊社，1971—1974。3卷，1351頁。
張深切,《廣東台灣獨立革命運動史略：在廣東發動的台灣革命運動史略》。
台中：中央書局，1947。186頁。
張深切,《里程碑：黑色的太陽》。台中：聖工書報社，1961。4卷，608頁。
張深切，《我與我的思想》。台中：中央書局，1965。229頁。
張禹，《我們的台灣》。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116頁。收入：《台灣
問題重要文獻資料集》，第二卷。復刻版。東京：龍溪書舍，1971。
陳正祥，《台灣地名辭典》。台北：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1960。349頁。
陳正祥、段紀憲,《台灣之人口》。「台灣研究叢刊」第9種。台北：台灣銀行,
1951。142頁。
陳紹馨,《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578頁。
鄭學稼，《第三國際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77。3卷，1644頁。
蔣先烈遺集刊行委員會(白成枝)編,《蔣渭水遺集》。台北，1950。101頁。
簡炯仁，《台灣民衆黨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台
北：1977。158頁。

周憲文,《日據時代台灣經濟史》。「台灣研究叢刊」第59種。台北：台灣銀行,1958。2卷、163頁、205頁。

莊嘉農,《憤怒的台灣》。香港：智源書局,1949。98頁。收入：《台灣問題重要文獻資料集》,第三卷。復刻版。東京：龍溪書舍,1971。

莊金德、賀嗣章編,《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65。437頁。

鍾肇政、葉石濤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8卷,353頁、422頁、365頁、407頁、330頁、425頁、376頁、340頁。

Davidson, James D.著,蔡啓恒譯,《台灣之過去與現在》(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台灣研究叢刊」第107種。台北：台灣銀行,1971。2卷 487頁。

方豪,《台灣民族運動小史》。台北：正中書局,1951。54頁。

漢人(黃玉齋),《台灣革命史》。再版。上海：大東圖書局,1927。169頁。收入：「台灣問題重要文獻資料集」,第三卷。復刻版。東京：龍溪書舍,1971。

黃靜嘉,《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法制與殖民統治》。台北：1960。270頁。

黃煌雄,《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台北：1976。300頁。

黃煌雄,《被壓迫的：台胞抗日史話》。台北：1977。202頁。

黃師樵,《台灣共產黨秘史》。桃園：1933。70頁。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譯,《日據下之台政》(原名《台灣治績志》)。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6。3卷,1371頁。

高賢治,《台灣三百年史》。台北：衆文圖書公司,1978。468頁。

郭乾輝 (郭華倫),《台共叛亂史》。台北：內政部調查局,1955。94頁。

郭華倫,《中共史論》。增訂版。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1973。

4卷，374頁、374頁、490頁、508頁。
郭廷以，《台灣史事概說》。六版。台北：正中書局，1975。246頁。
李稚甫，《台灣人民革命鬥爭簡史》。廣州：華南人民出版社，1955。196頁。
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第五册，《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504頁。
連横（連雅堂），《台灣通史》。復刊本（初版，分三册發行於1920—1921）。台北：古亭書屋，1973。1154頁。
林梵，《楊逵畫像》。台北：筆架山出版社，1978。295頁。
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葉榮鐘等）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台北：1960。3卷，第一輯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年譜》，87頁；第二輯《林獻堂先生遺著》。50頁、94頁；第三輯《林獻堂先生追思錄》，111頁。
林熊祥等，《台灣文化論集》。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3卷，492頁。
林立，《台灣史話》。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6。257頁。
劉滙湘，《日據時期台灣警察之研究》。台北：台灣省警務處，1952。42頁。
劉大年、丁名楠與余繩武，《台灣歷史概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79頁。收入：「台灣問題重要文獻資料集」，第二輯。復刻版。東京：龍溪書舍，1971。
呂秀蓮，《台灣的過去與未來》。台北：拓荒者出版社，1978。244頁。
毛一波，《台灣文化源流》。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3。77頁。
盛清沂、王詩琅、高樹藩合編，《台灣史》。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1034頁。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San Jose, Cal.： 蓬島文化公司（Paradise Culture Associates），1980。1540頁。

司馬璐,《瞿秋白傳》。香港:自聯出版社,1962。161 頁。
台灣民衆黨宣傳部(蔣渭水)編,《台灣民衆黨特刊》,第一册。台北,1930。162 頁。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北:1946。1384 頁。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志》。台北,1968—1973。10 卷,28 函。
「台灣問題重要文獻資料集」。復刻版。東京:龍溪書舍,1971。3卷。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經濟史》。「台灣研究叢刊」。台北:台灣銀行,1954—1974。初集,1954, 147 頁;二集,1955, 145 頁;三集,1956, 127 頁;四集,1956, 188 頁;五集,1957, 131 頁;六集,1957, 132 頁;七集,1959, 144 頁;八集,1959, 181 頁;九集,1963, 175 頁;十集,1966, 179 頁;十一集,1974, 183 頁。
蔡孝乾,《江西蘇區・紅軍西竄記回憶》。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0。414 頁。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增訂版。香港:中文圖書供應社,1974—1975。3 卷,591 頁、752 頁、740 頁。
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78。211 頁。
王詩琅、吳家憲編譯,《余淸芳抗日革命案全檔》。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4。2 册,452 頁、867 頁。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灣研究叢刊」,第 39 種。台北:台灣銀行,1956。134 頁。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3 版。台北:三民書局,1970。2 卷,440 頁。
楊子烈,《張國壽夫人回憶錄》。香港:自聯出版社,1970。359 頁。
葉榮鐘,《小屋大車集》。台中:中央書局,1967。226 頁。

葉榮鐘等《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叢書編委會，1971。576頁。

(B) 期刊

《台灣青年》，1卷1期～4卷2期，1920年7月—1922年3月。
《台灣》，第三年第一號～第五年第二號(即3卷1期～5卷2期)，1922年4月—1924年4月。
《台灣民報》，1期～305期，1923年4月15日—1930 3月22日。
《台灣新民報》，306期～410期，1930年3月29日—1932年4月9日。
影印複刊版。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1974。

(C) 論文

張其昀，〝弘揚台灣歷史文化〞。《中央日報》，1973年12月26日、27日；4版。
張漢裕，〝日據時代台灣經濟之演變〞。收入：在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經濟史二集》。台北：台灣銀行，1955。頁74—128。

張月澄，〝婦女運動的認識〞。《台灣民報》，145期，1927年2月20日，頁9—11。

陳逢源(芳園)，〝最近之感想：我的中國論〞。《台灣民報》，120期，1926年8月29日，頁8—10。

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台灣民報》，130期，1926年11月7日，頁11—12；131期，1926年11月14日，頁11—12；132期，1926年11月21日，頁10—11；133期，1926年11月28日，頁11—14；135期，1926年12月12日，頁11—12；136期，1926年12月19日，頁11；137期，1926年12月26日，頁11—12；139期，1927年1月9日，頁12—13。

張菼，〝台灣反清民變的不同性質暨其分類〞。《台灣銀行季刊》，27卷3期，1976年9月，頁304—331。

蔣渭水，〝今年之口號：同胞須團結，團結眞有力〞。《台灣民報》，138期，1927年1月2日，頁11—12。

蔣渭水，〝黎明期台灣勞動運動〞。《台灣民報》，152期，1927年4月10日，頁2。

蔣渭水，〝台灣民衆黨的指導原理與工作〞。《台灣民報》，225期，1928年9月9日，頁8；226期，1928年9月16日，頁8。

瞿秋白，〝多餘的話〞。收入：司馬璐，《瞿秋白傳》。香港：自聯出版社，1962。161頁。

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台灣民報》，126期，1926年10月10日，頁10—13；127期，1926年10月17日，頁10—12；128期，1926年10月24日，頁9—13；129期，1926年10月31日，頁9—11。

許乃昌，〝給陳逢源氏的公開狀〞。《台灣民報》，142期，1927年1月30日，

頁 11—12；143 期，1927 年 2 月 6 日，頁 11—14。

黃煌雄，〝文化協會的分裂及其影響〞。頁 68—84。收入：張俊宏主編，《春風叢書》，第一輯。台北：春風出版社，1978。

黃師樵，〝蔣渭水及其政治運動〞。《台北文物》，3 卷 1 期，1954 年 5 月，頁 79—90。

黃師樵，〝台灣農民運動史〞。《夏潮》，1 卷 9 期，1976 年 12 月，頁 10—14；2 卷 1 期，1977 年 1 月，頁 16—20；2 卷 2 期，1977 年 2 月，頁 13—17；2 卷 3 期，1977 年 3 月，頁 11—15。

黃師樵，〝日據時代台灣工人運動史〞。《夏潮》2 卷 5 期，1977 年 5 月，頁 15—19；3 卷 2 期，1977 年 8 月，頁 70—72。

黃得時，〝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觀〞。《台北文物》，3 卷 2 期，1954 年 8 月，頁 13—25；3 卷 3 期，1954 年 12 月，頁 26—33；4 卷 2 期，1955 年 8 月，頁 104—170。

黃得時，〝梁任公遊台考〞。《台灣文獻》，16 卷 3 期，1965 年 9 月，頁 1—68。

黃文雄，〝台北青年會，讀書會、體育會〞。《台北文物》，3 卷 2 期，1954 年 8 月，頁 137—139。

高日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時代背景〞。《台灣文獻》，15 卷 2 期，1964 年 6 月，頁 24—46。

高日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始末〞。《台灣文獻》，16 卷 2 期，1965 年 6 月，頁 60—96。

高日文，〝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之法庭辯論經過〞。《台灣文獻》，17 卷 1 期，1966 年 3 月，頁 81—108；18 卷 1 期，1967 年 3 月，頁 156—176。

〝過去及現在的台灣政治運動〞。《台灣民報》，138 期，1927 年 1 月 2 日，頁 2—4。

郭水潭，〝台灣同化運動史話〞。《台北文物》，4 卷 1 期，1955 年 5 月，頁

105—109。

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台灣民報》，138期，1927年1月2日，頁12—13。

連溫卿，〝台灣文化協會的發軔〞。《台北文物》，2卷3期，1953年11月，頁68—73。

連溫卿，〝台灣文化的特質〞。《台北文物》，3卷2期，1954年8月，頁118—130。

連溫卿，〝再就台灣文化的特質而言〞。《台北文物》，3卷3期，1954年12月，頁97—106。

林慈舟（林呈祿），〝六三問題之運命〞。《台灣青年》，漢文版，1卷5期，1920年12月15日，頁16—29。

羅有桂，〝台灣民族英雄人物：蔡惠如〞。《大學雜誌》，100期，1976年9月，頁25—30、79。

盧修一，〝連雅堂民族思想之研究〞。《台灣文獻》，18卷4期，1967年12月，頁57—100。

毛一波，〝台灣社會的發展〞。《台北文物》，9卷1期，1960年3月，頁69—72。

裴可權，〝台共之叛亂與覆亡〞。《中央日報》，1980年5月10日，頁11；1980年5月17日，頁11。

史可乘，〝人類之家·台灣ESP學會〞。《台北文物》，3卷1期，1954年5月，頁91—93。

史可乘，〝日據時期台灣ESP運動〞。《台灣風物》，17卷4期，1967年8月，頁53—58。

思民，〝謝雪紅、中共與台獨：評述中共對台獨的新策略〞。《中央日報》，國際航空版，1980年9月8日，頁3。

塩見俊二著，周憲文譯〝日據時代台灣警察與經濟〞。頁127—147。收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經濟史初集》。台北：台灣銀行，1954。

水藻，〝我們的一個提議：請合力組織為台灣犧牲的人們之救濟機構〞。《台灣民報》，116期，1926年8月1日，頁12—13。

〝台灣解放運動各團體的現勢〞。《台灣新民報》，345期，1931年1月1日，頁3。

〝台灣婦女解放運動的先聲〞。《台灣民報》，117期，1926年8月8日，頁1。

〝台灣社會運動團體〞。《台灣民報》，294期，1930年1月1日，頁8。

〝台灣社會運動團體調查〞。《台灣民報》，189期，1928年1月1日，頁9；190期，1928年1月8日，頁4；191期，1928年1月15日，頁7；192期，1928年1月22日，頁5；193期，1928年1月29日，頁8；194期，1928年2月5日，頁8。

蔡孝乾，〝駁芳園君的'中國改造論'〞。《台灣民報》，134期，1926年12月5日，頁10—13。

蔡孝乾，〝轉換期的文化運動〞。《台灣民報》，142期，1927年1月30日，頁10—11。

蔡培火，〝我在文化運動所定的目標〞。《台灣民報》，138期，1927年1月2日，頁8—11。

蔡培火，〝日據時期台灣民族運動〞。《台灣文獻》，16卷2期，1965年6月，頁171—186。

蔡文金，〝為謝雪紅同志復仇!〞。《展望》，1期，1958年4月，頁24、26、27。

曹介逸，〝日據時期的台北文藝雜誌〞。《台北文物》，3卷2期，1954年8月，頁38—47。

王一剛（王詩琅），〝思想鼎立時期的雜誌〞。《台北文物》，3卷3期，1954年12月，頁131—133。

王益滔，〝光復前台灣之土地制度與土地政策〞。頁52—86，收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經濟史十集》。台北：台灣銀行，1966。

王世慶，〝介紹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檔案〞。《台灣文獻》，17卷4期，1966年12月，頁157—192。

王詩琅，〝北市書房最後數字〞。頁186。複刊（初刊於《台北文物》，5卷4期，1957年6月）。收入：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78年。

吳濁流，〝台灣連翹〞。《台灣文藝》，10卷39期，1973年4月，頁69—80；10卷40期，1973年7月，頁82—87；10卷41期，1973年10月，頁85—90；10卷42期，1974年1月，頁62—69；10卷43期，1974年4月，頁65—72；10卷44期，1974年7月，頁61—67；10卷45期，1974年10月，頁56—62。

吳瀛濤，〝日據時期出版界概觀〞。《台北文物》，8卷4期，1960年2月，頁43—48。

山邊健太郎著，鄭欽仁譯，〝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在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的台灣與朝鮮之比較〞。《食貨月刊》，2卷1期，1972年4月，頁30—56。

楊肇嘉，〝台灣新民報小史〞。附錄於：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第二册3版。台北：三民書局，1970。頁407—440。

葉榮鐘，〝日據時代台灣的日本警察〞。頁167—175。收入：葉榮鐘，《小屋大車集》。台中：中央書局，1967。

玉鵑，〝婦女運動的促進與婦女部的設立〞。《台灣民報》，138期，1927年1月2日，頁15—17。